越过山 越过重洋

To stay or to go

谢青桐 —— 著

归途最长，归心最苦。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越过重洋越过山

作者:谢青桐

ISBN:978750867210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这是关于移民的故事，
似乎是不那么快乐的人群，
和他们挥之不去的记忆。

前言

母语

纵使科迪勒拉山系绵延壮美，阿尔卑斯雪山宛如童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时，只有感动，没有激动——没有看到黄山和泰山时的激动，因为身心的根系扎于故土而非此地。这种感言绝不矫情，也不虚伪。倚在黄山的苍松下，你闭目冥想的是云海中的诗行，你不会在云海中迷失，你记得山下的方向，哪里有宣州纸，哪里有绩溪砚，新安江的竹筏如何顺流直下，湿润的晨雾里能隐约分辨徽州商人昔日远行的古道。你和你儿时的伙伴坐在山涧的凉亭里，谈妙笔生花，饮毛峰新茶。很多年来，这幅画卷一直被我携带到所有的地方，即使画轴是那样沉重，也被我卷在随身的包里，害怕在任何时刻丢失。

有一次在旧金山市区拦了辆出租车到硅谷去会朋友。刚上车就觉得那司机的英语欧域口音很重，但猜不出是哪里人。偶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脖中挂的银坠上刻着“佛罗伦萨”一词，有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图案。他打开车上的CD（唱片）播放机，一路上，意大利歌剧不绝于耳，一曲接着一曲。他似乎略带歉意地看着我，笑着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听。谈话间，我知道他确实是意大利人，而且来自佛罗伦萨。我们攀谈得极其愉快，当得知我此前曾经拜访过他的家乡时，他非常高兴，询问我对佛罗伦萨的种种印象。到达目的地时，他从车的后备厢里拿出一小瓶葡萄酒送我，并握紧我的手说：“记住，伙计，意大利的葡萄酒比法国的好。”自20多岁移民美国，30年过去了，他仍然将自己视为意大利人而非美国人，他说他睡梦里见到最多的场景总是祖父的葡萄园。

我又想起那位来中国教书的西班牙朋友贡扎勒，他大约15岁时离开西班牙去挪威念高中，然后又到英国伦敦读大学和工作，他成长中最关键的年月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文化中度过的。也许你认为，这个年轻人将会是全球化时代无国界的“新新人类”，可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他是西班牙人。无论身在哪里，他都始终捍卫着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的信念。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经历多少种文化的交相感染，他的性格、信念、风范、气息始终和弗拉明戈舞的热情、欢跃、血性一脉相连。

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以及那些多种文化大融合的多元化地区，依然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圈的居民各自聚居生活的地带，例如中国城、希腊村、德国社区、印度社区、阿拉伯区、泰国街、西班牙镇。在这些社区里，可以买到来自母语国的许多食品和工艺品，一些传统习俗与风尚也在

这里得以沿袭。日本人可以在他们社区附近的日本餐馆里吃到地道的寿司，墙上的富士山图和樱花壁画、侍者穿的和服以及日式的座位包厢，都让你误以为正身处东京的某个餐厅。中国人可以在春节时到唐人街观看腾龙舞狮的喧闹盛景和高悬的红灯笼，中秋临近时月饼的香味也一样飘满了这里。在异乡的天宇下，在西式建筑群组成的都市街区里，那些精心保留的东方节目很像文化孤岛上自娱自乐的仪式，有些寂寥，有些尴尬，但它们存在着，勾起人们对故乡的回忆、对母语的怀念。

每当我看到那样的情景时，总是深深地意识到，其实乡愁是何等的辛酸啊。我也由此断定，一个在母语文化中有过童年和青少年记忆的人，其实是一辈子也融入不了另一种文化的。无论你的外语多么纯熟，都一定难以摆脱不能用母语书写和对话的那种异质感，你的一生都无法彻底完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改造，这是所有第一代移民的悲凉宿命。你可能会接受移民国文化中的某些生活方式、手段，但你的心灵早已从一而终地皈依了你的母语国，或者说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这样表述：“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新国家。所以移民永远都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种移民文学，里面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祖国是关于土地、民族、人民、优秀文化、优良传统、光荣历史的抽象概念，这与政权、统治者、时代都无关。一个流亡者，有可能逃离一个政权，但他一生都注定无法逃离母语和祖国。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流亡法国数年，他的作品里终究是挥之不去的波兰记忆。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注]中，他相信，如果法国有一个少女维罗尼卡，那么他的祖国波兰就一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少女维罗尼卡，一个人的心跳感应着另一个人的心跳。我想，这个“维罗尼卡”其实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他似乎想表达，法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只是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件复制品。是的，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白》中，那个理发师卡洛哪怕是躲在货箱里偷渡也要重回故土，当巴黎生活没有给他提供尊严，当平等的愿望变得渺茫，他重返母语国的过程就是重新找回生命自我的过程。卡洛回去了，基耶斯洛夫斯基至死也没有回去，可他钟爱的那个钢琴诗人肖邦的乐曲与他生死相随，回响在他的作品和人生中。一个是一生用音乐细细温习他的波兰祖国的男人，一个是一生用为数不多却精雕细琢的电影诘问自由与伦理的流亡艺术家，他们消逝在各自的命运里。在吹拂过古老地中海的忧郁晚风中，这两个波兰人的杰作分别以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嵌刻在共同的母语范本中。

一切文化亲情都在你18岁以前与你绑定了。文化亲情与日后的价值观和信仰无关，文化亲情只和母语关联，只和童年、故乡关联。从你在护城河边高大的桑树上采下第一颗桑葚的那天起，从你聆听祖父讲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在天寒微雪的黄昏“旗亭画壁”的故事的那天起，从你在杭州的九溪烟树那片寂静的山林里品饮龙井茶的那天起，母语将永远跟随着你，唤起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意境，提醒你“吾日三省吾身”、“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准则。你光阴的日历将始终在对过年的盼望中翻过。年是什么，是除怪兽的勇士吗？不，是一辈子的梦！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种简单、纯真的季节轮回中，你不会担心因远离文化亲情而失语，你与母语朝夕相伴。

---

1. 《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又译“两生花”。——编者注



chapter 1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来时路上有松菊

从北京到纽约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加缪在47岁时死于车祸，是意外，还是一场由荒诞感引发的蓄谋已久的对肉身的自我裁决，没有人可以妄作判断。但是这个法兰西的存在主义者一生都没有过萨特那种从绝望路途上重获希望的自由与兴奋。

萨特用自由抵抗笼罩世界的浓重的荒诞。加缪的世界里只有西西弗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神却故意不停地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

如果人生注定是这样一场酷刑，那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生意味着不能自由，死意味着不能永恒。在西西弗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推石头的神话里，一切意义都被抽剥了。

究竟是加缪解构了《荷马史诗》，抽剥了生命无限美好的意义，还是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虚情假意呢？

一

这是2014年2月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某报的记者廷木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积雪的松柏，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Ephemeral。这是从希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海中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她的手指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画着什么。廷木迟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其实并不年轻了，只是那件粉色花袄把她包裹得酷似少女。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她用目光迎接廷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她说了一声“你好”，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20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因为20多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那时候还是1992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了，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人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重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滩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他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舒兰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开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觉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

二

1992年夏天，廷木结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廷木被分配到家乡南京，先在工业局当局长秘书。

说是局长秘书，可到局里报到的那天，局长告诉廷木，他必须先到下属的机床厂下基层锻炼一年。大学时代充满幻想的日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归于现实的真相。那年秋天，廷木开始了工厂生涯，在总装车间上三班。

那会儿，廷木并不知道舒兰已经被分配回杭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大学英语教师。有一次廷木去看望绍兴的外婆，从杭州经过，住在杭州的一家旅馆里，一连好几天，终日流连西湖的秀色。

廷木一个人。一个人，在苏堤，在灵隐寺。那时候杭州还很安宁，廷木活得像隐士。中秋的丹桂弥散出大片大片的芳香，廷木呼吸着那种气息，躺在船头，在晌午的秋光里昏昏欲睡。在绍兴乡下，廷木耐心地向外婆学着茴香豆的四种做法。

乡民们都知道廷木是从北大毕业的，投来艳羡的目光。廷木缄默无语，他学会了划一手好乌篷船，练就了结实的肌肉。有一次喝了青梅黄酒，廷木划着船钻进一个桥洞，桥边一个戏班子正忙着为第二天的社戏走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相会，生离死别，廷木也跑上台去吼了几句，然后哭得死去活来。戏班子的演员们诧异地看着廷木，晚上廷木和他们继续狂饮绍兴的女儿红，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廷木在那家机械厂干满一年，调到工业局，后来又跳槽到南京一家报社工作。他希望离自己的中文专业更近一点，但他心里，其实更思念他读书的北京。

那两年，廷木和我成了新闻界的同行。有一段时间一块儿合作编撰迎接香港回归的专题宣传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知道我们原来有共同的祖籍江苏丹徒。我听说过廷木的祖父，乡邻们提起他时都敬佩不已。廷木的爷爷在民国年间是丹徒有名的乡绅财主，知书达礼，为人忠厚，家境富有，却绝非为富不仁之辈。一生救济穷人，善行累累，在镇江创办了火柴厂，赚的钱就开了家诊所，聘请了一个学过医的德国传教士来行医治病。老人青年时代在北平念书，赶上五四运动，后来回到家乡，与故土相守一生。廷木闻此仿佛他乡遇故知，惊喜我对他的家史如此清楚。那以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兄弟相待，无话不说，并相约有朝一日共游家乡的湖光山色。

几年后，廷木考到北京的一所二流大学读硕士。廷木没有再去北大，不愿向别人提起他是从北大毕业的，甚至乘车也不愿经过母校门前。北京物是人非了，楼宇林立，道路飞旋，人流如蚁，车流如蝗。北京的繁花似锦那么快就把他们上学时的痕迹一笔勾销。廷木在这里读书、谋生、与人打交道，尽量不去想他曾引以为豪的大学时光，也不想在南京那几年的潦倒旧事。

那个充斥着朦胧诗、强国梦、同学情的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中关村已永不再来。廷木沉默着，一边在那所二流大学读书，一边在一家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廷木在什刹海的旧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在老北京散步成为廷木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三里屯或者后海喝酒成为廷木生活的另一部分。

他熟悉北京城的一草一木、街道地名，朝阳门内大街有多长，知春里有几个小书店，地坛里的百年松柏和景山的有何区别，全都记下了。晚上，经常摸着黑，沿着什刹海急行军，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胡同深处的小吃。杏仁茶又热又稠，褡裢火烧酥脆鲜香，驴打滚、豌豆黄、豆汁应有尽有，小吃不小，样样本色。现在爱吃洋快餐的孩子们不懂，小吃可比肯德基好吃多了，那是北京的滋味。那些读《哈利·波特》的时尚小孩不读老舍，所以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多美。廷木深爱北京的一切，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一段京胡弦语，一壶茉莉花茶，全都被他悉心收藏了。

三

1992年，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课教师。一个深秋，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他刚从美国来中国，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个向导兼翻译，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就邀请舒兰做他的陪同。舒兰答应了。

几年之后，1995年，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赴美后

不久，舒兰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很多年以后舒兰都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无法释怀的道德污点，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育、做人修养大相径庭。舒兰一遍遍设法原谅自己：因为那时候她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金得以延续。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就睡过去，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了，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个安逸的小镇，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到旧书交换店淘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像带。

舒兰在这个小镇上悠闲地打发着离开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假期。费城的阳光有一种清澈和热烈，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遮住无数曲曲折折的林荫小道。舒兰躺在那些开满晚茶花的草地上尽情地看书，太阳攀上头顶的时候，舒兰就来到小镇的咖啡馆吃午餐，她喜欢一种薄荷味的冰激凌，每次午餐后都要照例来一份。吃到最适意的时辰，她就离开咖啡馆，沿着小路逛这里的各种工艺品商店。有家手工饼干店的店主人已经认识了舒兰，每次舒兰经过时都主动招呼她进来坐坐。渐渐地，这个来自法国的老妇人喜欢上了舒兰，把舒兰当忘年交一样看待。老妇人有些唠叨，可心地慈祥，她不厌其烦地向舒兰讲述着她对巴黎生活的厌倦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她对那个风流成性的丈夫爱恨交加却又忍无可忍，由此她感叹生物基因的不可逆转。老妇人叫玛蒂尔德，她的饼干店也以此命名。舒兰从玛蒂尔德那里不断品尝着她发明创造的饼干新品种，老太太的创造力让人钦佩，她的胆量足以让她把全世界任何几种调料和原料混合在一起开发新饼干，比如她把杧果汁和黑巧克力毫无道理地配成一种叫“黑骑士和牧羊女”的饼干。看着舒兰一脸惊喜和好奇，玛蒂尔德拍拍舒兰的头说：“孩子，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缘由，任何两种东西都可以随便搭配在一起，就像我和我那个啤酒桶一样的风流丈夫。”舒兰一边品尝着这些稀奇的饼干，一边强忍着不笑出来。

那是一段空前快乐的岁月，让舒兰忘记一切烦忧。整整两个月，她寸步不离小镇。她认识了小镇上的很多人，小教堂的牧师、送牛奶的工人、职业经纪人，还有同幢公寓的邻居文森特，那个貌似腼腆的德国青年。每天早晨，那个青年从舒兰的窗前经过去上班，而舒兰还没有起床，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他匆忙赶往小镇火车站的身影，舒兰就知道这时一定是早晨8点。

四

在宾夕法尼亚读硕士时，有一次上课，一位白人教授向舒兰提问，让舒兰介绍家庭成员以及她本人的宗教信仰。舒兰告诉大家，他们没有西方“有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教室里一片沉寂，教授费解地看着舒兰，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舒兰感到一阵受伤，她的诚实让她蒙受误解。舒兰嗫嚅着，想努力地辩解：“可我们有我们的道义、价值和情怀，有我们爱的伦理。”舒兰的声音很小，可教授还是听见了，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可如果你的民族集体犯错的时候，你们选择沉默，还是选择逃避？”舒兰竭力维护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这是我的民族文化中特有的。”这位教授丝毫不愿宽恕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无法理解，一个不信仰上帝的民族是不会懂得敬畏的。”舒兰鼓起了勇气，冷冷地对教授说：“对不起，老师。据我所知，美国的课堂上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私人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况且，你也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力用审判的口吻和我说话。”为了抗议这位教授的偏见，舒兰向学校校长写了一封抗议信，然后愤然退学。

当舒兰返回纽约决定重新选择一所大学就读时，她收到了原先那所大学校长的道歉信，并告诉她，学校已对那位自以为是的教授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舒兰拒绝了校长让她继续就读并提供奖学金的邀请。舒兰徜徉在纽约的街头，呼吸着异国的空气，那时候，她泪流满面。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茫然地漫步，委屈地黯然落泪。纽约的春天浪漫多姿，她想起了北京的春天，还有她的故乡江南的春天。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春天才真正属于自己。

她少年老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超验的上帝和神灵，她的民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的民族一语道破天机：既然宇宙浩如烟海，人如草狗，何必去追究无法穷尽的真理？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不如安时处顺，与天合一，与道合一。既然天道与人道合一，人就是靠得住的，仁与礼就在人的良心深处。当普天下人都还在茹毛饮血的童年时代，她的民族已经是风雅而矜持的长者。

舒兰是这个长者的后裔。如初春的蒲公英，突然脱离母体，飘向遥远的旷野。她落在新大陆的土地上，无知无觉，无声无息，飘零异乡的孤独感让她终日惶恐不安。可舒兰不想回去，因为她自己主动选择割断了各种各样与故乡联系的根须。在陌生的新大陆，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种族、多元化、民主、普选和星期六的野餐都无法让舒兰找寻到任何属于自己的归宿感。为了自我的新生，为了内心的自由，舒兰选择了基督教。这是舒兰20多岁人生中的一个非常事件，舒兰终于下决心把灵魂和爱献给了这个在她青年岁月中收容她的新大陆。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研究基金会资助舒兰去中东做学术考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一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舒兰亲眼见到过一些以色列士兵用糖果和布丁戏弄两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并故意引诱孩子们发怒，被逼急了的孩子们破口辱骂，捡起石子掷向士兵。士兵们用枪瞄准他们，两个孩子顷刻间倒在血泊中。接着孩子的尸体被几个神色慌乱的士兵匆匆处理掉。舒兰站在一棵樱桃树下，目睹着这场杀戮，此时上帝和真主都在场。

在巴勒斯坦的孩子应声倒地的那一刻，舒兰明白了其实上帝的存在与否拯救不了那两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因为如果人类注定是贪婪的、排除异己的，历史的劫难就注定是永无休止的，生命就注定是悲哀无常的。

当舒兰从旅行包里取出相机拍下这幅景象时，一个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飞快夺过舒兰的相机，打开后盖，扯掉胶卷。舒兰从那个以色列士兵娴熟的动作和麻木的脸上，突然看到人类在制造谎言、销毁证据时使用的暴力手段和流氓嘴脸。舒兰接过了士兵归还的相机，转身走了。

五

1999年，舒兰的父亲突发心脏病猝死，最挚爱的亲人猝然离去。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觉得舒兰回来也无济于事，况且父亲病重时她正赴中东考察，夜以继日地准备学位论文。直到一个多月后，她收到母亲的来信，那天舒兰正在报告厅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答辩中突然泣不成声，导师组的教授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她强忍悲痛告诉老师实情。老师们为舒兰父亲的亡灵祈祷，并建议将论文答辩改期，她含泪向老师鞠躬致谢。

记得那天，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舒兰从答辩现场离去，沿着学术报告厅的长廊走了很远，那条长廊没有尽头，她手中所有的答辩提纲全部滑落在地，她缓缓失去了清醒的意识，记忆恍然地搜索着父亲在舟山渔场下放劳作的情景。死亡，即使间隔茫茫海洋，对舒兰来说都是那样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从她童年时代起，女儿和父亲就有一种最快乐的默契，舒兰的独立和优秀抚慰着父亲失意无援的一生，是他万念俱灰的生命泥潭里一朵朝气蓬勃的睡莲。舒兰渐渐长成了少女，当父女俩在西湖边垂钓的一个夏日，父亲看着舒兰若有所思、心高气傲的面庞，心里骄傲地意识到，这孩子如此执着地继承着他的生命。

舒兰想起父亲还没来得及和自己见上一面就从人世消逝。从小到大，除掉父亲在浙江舟山渔场下放、舒兰到北京读大学，然后移居海外，她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还没超过10年。舒兰童年的时候，和母亲到渔场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父亲带舒兰坐船出海，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颠簸，父亲抱紧舒兰，不让舒兰受到惊吓。那天，舒兰和父亲靠得很近，不停抚弄着他的头发，舒兰发现了一缕白发，在海风中飘动。舒兰强忍住泪水，想

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她向父亲递上一个灿烂的笑容，想让父亲宽心，可纵使笑容多么夸张，泪水还是止不住簌然落下。

舒兰提前收拾好行李，在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航班。舒兰要去看母亲，要去看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杭州西南的九溪，在浓密的林海深处，舒兰在墓前坐了整整一天。山涧里流水潺潺，在青石间回旋。舒兰被包围在一片湿润的世界里，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凉。

舒兰继续回到纽约读书，一直读完博士。2001年，她想把母亲接到纽约来散心，多少年来，舒兰没有机会陪伴亲人，总是沉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母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被拒，理由是她在中国已经退休，并且没有了老伴，这意味着失去了家庭和工作对她的一切约束力。舒兰的旧脾气发作了，先写信给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处交涉，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一张公事公办的书面材料。舒兰又亲自去了移民局，抗议她母亲遭受待遇的不公正。一位犹太裔官员告诉舒兰，签证官有权执行美国移民法的一切规定，这是不可更改的。

2006年，舒兰博士毕业，在纽约附近的一所学院任教四年后，决定回国照顾年老孤独的母亲，于是托老同学帮她在北京联系了一份工作，去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2010年夏天，离开美国前夕，舒兰和丈夫罗伯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舒兰回到中国，把母亲从浙江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的新生活。这时候，距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18年，距她当年赴美也已有整整15年了。

在舒兰离去的18年里，永定河的流水年复一年，景山公园的松柏增添了新的年轮，北大校园的石榴花花开花谢。舒兰用敏感的心灵承受着中国的变化，多年漂泊海外，舒兰与祖国的当下完全脱节了。

六

直到2014年的这个初春，在后海酒吧，在寒冬已过但依然冰天雪地的日子，廷木与20多年前在紫竹院公交站台昏厥的女学生不期而遇。

廷木在星空下，端详着舒兰不再年轻的脸。他呼吸着雾霾年代不再清朗的空气，却已经心满意足，他在昌平乡下有房子，北京的郊外毕竟留着田野的芬芳。廷木的好视力能看清十三陵水库里的游艇，还有青山深处的桃林。

廷木对舒兰进行了一番拙劣无比的奉承，夸赞她的眼睛像桃花潭水，然后

又很快为自己愚蠢的谄媚脸红。舒兰没有过多留意他的话，只是若有所思地往前漫步。晚霞如轻薄的纱，遮住舒兰眼角的纹路，留下一个少女般的轮廓。她在一块石阶上坐下，身姿仍然被晚霞伪装成一个少女。那样子吓了廷木一跳：天哪！这简直就是大学时因青春期贫血昏迷的舒兰，毫无二致。

舒兰告诉廷木，他们阔别20多年，她离开中国十几年，其实自己毫无变化，依然是个性情中人，时而执着，时而漫不经心。舒兰在海外漂泊了很多年，先是取得美国绿卡，然后成为基督教徒，可舒兰的习性全是东方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爱吃粽子和莲藕，比如寄情山水。廷木问舒兰加入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是对上帝的信仰还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必备的宗教情感？她笑而不答，答非所问。

此日，已临近黄昏，廷木为舒兰买了羊肉串，舒兰吃得很贪婪，很不好意思地为自己的吃相表示歉意。廷木问她美国能买到羊肉串吗？舒兰回答华人超市里有，可烤不到这么好吃。廷木又为她买了10串，舒兰在这个黄昏感受到久违的幸福。

他们又折回后海，在另一间酒吧里聊到深夜。廷木和舒兰在这一夜里避开了寒风和暴雪，外面鹅毛大雪染白了夜幕，掩埋了城市的道路和立交桥，行人和车辆寸步难行。舒兰回到这个国家，遇上廷木，向他倾诉绵绵的忧伤，舒兰其实知道，廷木理解她心底的世界，能帮她驱逐内心的无依无靠。

深夜，他们发现外面的积雪冻结成冰，要回去举步艰难，整个城市的交通几乎瘫痪。他们决定继续在酒吧坐下去，然后，他们走上小楼的顶层，俯瞰雪后妖娆的北京城。

过了一周，在一个天气渐渐回暖的周末，廷木又打电话约舒兰出来吃饭。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他自己有和睦的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已经13岁的女儿，而舒兰是一个离异的独身女子。但是，廷木告慰和提醒自己，他们只会有好奇的怀念，不会有别样的传奇，因为他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自己。情境已变，流年似水，往事不可以重温，更不能重演，否则注定孽缘，悲情收场。画蛇添足的人是愚不可及的，那段美好姻缘已经在20多年前以最纯洁、最偶然、最短暂的方式演绎完毕，曲终人散。

只是有点儿犯傻，推迟了20多年，他和她一旦重逢，就仿佛要讨还岁月欠下的情债，追索一段错失的儿女情长。命运为两人安排了这场恍若隔世的邀约，北京的初春，商家和时尚青年们正欢欣鼓舞地卷入情人节的狂欢，而他和她，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一次漫长而伤神的怀旧之旅，从未名湖到五道口，从知春里到北太平庄。

好多年不骑自行车了。廷木骑着单车，舒兰坐在后座上，北京的初春冷得清冽，城市的天空是一片灰蓝。他们穿过东四大街、美术馆后街、宽街，又从东棉花胡同绕到国子监。在和平里，廷木找到了一个当年自己曾经吃过烤羊肉串、喝过羊杂汤的地方。他们吃得很陶醉，廷木问舒兰在纽约常到中餐馆吃饭吗？舒兰垂下头，似乎不太愿意提起纽约的生活，只是说："在美国，我很少跟朋友去餐馆，因为我不能接受AA制。"廷木又给她递上一只烤羊腿，目光里有克制的温情，让舒兰觉得尤其亲密，但舒兰立即打岔说："还是这样好，跟中国朋友一起吃饭。中国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这顿饭必须我请，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今天的你。"

廷木和舒兰，越过20多年的时光在北京重逢。20多年间，两个个体天各一方，毫不相干。那个春天的偶遇真的已经从时空中完完全全被抹去了吗？谁会记得那个年代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音符呢？那一袋草莓，还有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这些缱绻的小情感都被时光轧得粉碎，20多年间早已无影无踪。可是令廷木惊讶的是，舒兰从背包里掏出那只20多年前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尼龙包被打成漂亮的结，卷成一小团。她一直把那只尼龙包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那只尼龙包陪着舒兰在美国度过了很多年时光，现在舒兰又把它带回国。廷木淡淡一笑，对舒兰说："现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种尼龙包了。"

黄昏，他们来到德胜门的城楼下面，踩着路边的冻雪，漫步在夕阳余晖里。整个下午，冻雪正在悄然消融，化作充满暖意的水，处处散发着柔软的光辉，有一种春回大地的气象。北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往昔满城都是古朴幽静的林荫街道，而如今繁华的商业中心无处不在，时光飞度二十载。他们重逢的时光轻快而又苦涩，他们只谈生活细节，不谈社会历史，只谈生命的瞬间快乐，不谈人生的终极幸福。

这里人人见怪不怪

从广西龙脊梯田到纽约

纽约是个不适宜生存的地方——

住不起的房子，下不完的雪，动不了的堵车，赶不走的老鼠。但无论它多么可恶，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人不断在其中寻找出路，但注定要在里面永远漂泊。

一

开车载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Kyle（凯尔），是30岁的年轻人，来自中国广西的龙脊梯田。在纽约期间，我多次打电话预订他的车。乘着这辆“短租专车”，我穿越那些迷人的街区，他就一路津津乐道于纽约的伟大与野性。

他来自的地方，有广阔的田园和寂静的山林，但他并不在乎。他还是喜欢纽约，因为他年轻。

Kyle在纽约大学毕业后，娶了个有美国绿卡的湖南人。一直没找到对口工作，他就干了开出租车的活儿。Kyle坦言，纽约就是这么个地方，人不断在其中寻找出路，但注定要在里面永远漂泊。这一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及纽约：不论它多么可恶，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Kyle回忆初来乍到时，他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吐槽纽约是反人类的城市之最。对大多数人来说，纽约是一个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住不起的房子，下不完的雪，动不了的堵车，赶不走的老鼠，清理不了的脏乱。Kyle也一样，只要他开车来纽约，从进城的时候开始，他就忍不住爆粗口，因为纽约看上去太粗俗，他讨厌这里低素质的人、肮脏的环境、高成本低质量的生活。他会被满大街的尿味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刺激得一度抑郁，然后等他渐渐习惯，习惯于被诱惑，才在不经意间发现纽约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纽约让他年轻的血液奔涌加速，让青春发光，也让青春延长；让生命亢奋，更让生命辉煌。在这个地方，奇葩实在太多，他可以做任何疯狂的事情，人们全都习以为常，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在那

从未体验过的冷漠中，他领悟到一种宽容和接纳。没有人会因为他与他们的不同而对他另眼相看，因为这里人人见怪不怪，骨子里透着一种野性的平和。在这座城市，他不断见识与众不同，自己也变得与众不同。这里，便成为年轻人不停做梦的地方，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地方。

纽约包罗万象，纽约极具野性，纽约也充满异质感。Kyle真的喜欢纽约的这种宽容。在纽约他经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国人，因为纽约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是所有文化杂糅在一起。当一个城市的文化多元复杂，人们就需要并且能够在内心感受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Kyle在布鲁克林住地下室的时光，比起在家乡父母羽翼之下的生活更加自由自在。纽约简直就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这里自由艰辛，各种阶层和文明交织、冲突又融合。即使他对纽约一无所知，也会感受到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建筑物背后是纽约近300年的近代发展史，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背后都蕴藏着无数家族和个人的奋斗传奇。这里有世界上最有钱的富豪，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纽交所、时代广场，那些在电视新闻和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地标建筑，会接二连三地呈现，也有流浪的街头艺人，在第五大道、42街、中央车站这些常常在畅销小说里提及的著名地带以各种形式来讨生活。

他身处的地方是世界的首都，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城市里看似不起眼的事件，或许会成为全球头条。在这里，他将认识这个世界上梦想最多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野心的人、最有人生阅历的人。他将看尽人间烟火，看遍世界最繁华的景象。他会见证这个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变革，听到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最优美的音乐，而此时Kyle离世界这么近。

这里充满着机遇和希望，他有机会登上一个别人都不敢设想的舞台，他有运气实现一切他想得到或想不到的梦想。他知道，这个城市会接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肤色、语言、种族、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只要他有梦想并且顽强骄傲，他就是地道的“纽约客”。

纽约把艺术、商业、体育、宗教、新闻、娱乐、金融、人文熔于一炉，将格斗者、福音布道牧师、赞助人、演员、学者、股市黄牛和商贾各色人等推上同一方狭小的舞台。城市的特点是带有一种无法抹杀的陈年久远的气味，所以不管他坐在纽约的什么地方，都会感受到伟大时代和荒诞行状的回声，还有那些奇人怪事和功成名就。

二

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如果你能在这里混下去，你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立足），这是纽约客的座右铭，而

Empire State of Mind（《帝国之心》）是纽约这个独立王国的国歌。闭上眼睛，从布鲁克林大桥走到Harlem[注]，会听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韩语、爱尔兰语、阿拉伯语、英语、福建方言、广东方言，甚至包括Kyle的家乡方言广西话。巴黎有雨果为其作传，伦敦有狄更斯为此歌颂，而纽约的博大却是由菲茨杰拉德、马克·吐温来讲述。穿过第五大道，抬头便仰望到帝国大厦，回首便是华盛顿广场拱门，而眼前卡耐基音乐厅后的葱葱绿色，是纽约之肺中央公园，在两侧守卫它的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大都会博物馆。Kyle年轻时走遍天涯只为了拥抱这个世界，而在纽约，世界拥抱了他。

有人说，纽约其实是两座城市：一座属于白天，井井有条，进取向上；一座属于黑夜，妖孽丛生，欲望在身体里膨胀。纽约人绝不会为节约电费而放弃夜晚的奢华。黄昏中纽约的建筑被铺上了一片金色，属于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开始降临，对于我这个过客来说，这是纽约最美的时刻，灯光、建筑、夕阳和城市独有的韵味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片仙美的佳境，万象更新，令人陶醉。乘坐着Kyle的车，我闲游在这热闹的街头，茫然四顾，流连忘返，一切灿烂如花，万物恍惚迷离……忽然想起，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这样写道："在纽约大都会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踌躇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纽约的雨是流亡者的雨。"青年时代，人有时需要被放逐。置身茫茫人海，只要你愿意，终可以永远潜踪遁迹。

我循着这座城市的脉络四处找寻，曼哈顿中心地带的第五大道无可置疑地是这座城市著名的分界线——第五大道之东是东，第五大道之西是西，自1838年以来就是如此。多少年来，《纽约客》和《纽约时报》是这座城市两张永恒的名片。纽约不仅有着野蛮冷酷的钢筋混凝土，却也是文艺小清新的文化圣地。从格林尼治村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到苏荷区的新天地，从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这里有着文化艺术的历史与先锋。

旅居纽约多年的浙江籍华语文学家木心先生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一书里把美国文明比喻成"山洞文明"：真正的智者都是躲在高楼大厦的"山洞"里，外面是人欲横流的洪水。这个比喻相当贴切。而我体悟，"山洞"应该是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惠特尼美术馆、林肯艺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还有地铁里的艺术家、街区的涂鸦墙、街角咖啡厅里发呆的学生们、华尔街夕阳余晖里蓦然显露的表情，和藏在纽约城角角落落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这才是美国文明的"山洞"，犹如宇宙中引力

强大的黑洞。我知道纽约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纽约远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更让人感到亲近。尽管有时候夹杂着孤独、失落、怅然，或者喜悦、惊奇、慌张，就好比一群形态各异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岛，也许这里面充满了歧视、冷漠、嘲笑、讽刺，但总会留一个缝隙给你这样一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外来人，然后不停地问你to stay or to go(注)。

我一定是离开，和Kyle不同，因为我已老去，舌尖与肠胃都顺应了所眷恋的家乡味道，注定不能与纽约长相守。那是2005年的9月。我离去的那天，纽约终于结束了一个星期的阴雨天气，露出来它本该有的笑容。午饭后从唐人街步行到港口，躺在公园长椅上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远处不时有直升机在高空盘旋，初秋明晃晃的阳光显得天空更加湛蓝高远。不过此时想得更多的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家乡的味道，对我来说，纽约再精彩，也是要回家的。

“抱负”和“野心”，在中文里是两个词，一褒一贬，代表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ambition”。青年时代面对诱惑，通常无法抗拒。人都很难省略这个过程，因为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豪情、飞黄腾达的奢望、君临天下的快感、衣锦还乡的虚荣。尽管哲人一再告诫，不要“反认他乡是故乡”，尽管老人们反复提醒，“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年轻人就是义无反顾，始终执着于那些所谓的梦想、理想、目标、前程、价值，还有面子。等到拥有它们，或者因无法拥有而碰撞得头破血流，就会发现一切原来是多么不堪重负的复杂，多么苍白无聊的虚空，再想返回朴素的原点，已经悔之不及。生命最真实的意义，就在于那个简单的原点，在那个原点，人的心跳不会加剧，欲念不会膨胀，一步步脚踏实地，踩着松软的泥土，走进属于自己的碧空如洗而又风和日丽的春天。朝云暮雨，日出日落，总能说着母语，也总能听到乡音。

三

在世贸大厦旧址一带，我遭遇了漫长的堵车。我坐在Kyle的车上，和他一边喝星巴克咖啡，一边探讨有趣的话题。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曾认为男人过于恋家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中学时最喜爱的一篇文学作品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段情景，作家哈里的处女作面世出版，获得一笔丰厚的稿酬。这笔意外收入将用来做什么呢？哈里与新婚妻子辛西娅各有打算，跟随哈里浪迹欧洲大陆多年的辛西娅厌倦了漂泊，此时她已怀有身孕，她立刻想到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而渴望冒险和奇遇的哈里在得到巨额稿酬之后，首先的反应是：我们可以去非洲了。是回美国平平安安地置家定居，还是到神奇的非洲大陆去周游旅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撕裂了哈里与辛西娅的婚姻。多年以后，当哈里在非洲被河马咬伤，伤口重度感染，在临终时刻向他的第二

任妻子海伦追忆往事，抒发对辛西娅的不能释然的爱情时，一切为时已晚。

那部富有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的小说曾经激励过我的少年时代。海明威让我们猜那个谜：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5895米顶部常年积雪的山峰，在西高峰的近旁，为什么会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呢？“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我努力猜出那个谜底，作为豹子，葬之于雪，当是最高贵的礼遇，那里是豹子向往的生命圣殿。

人生的高贵就一定在雪山上吗？其实，我更认同平凡的人生，人间的高贵就在人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参悟说：“林中多歧路，殊途而同归。”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中写道：“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和死，哪一件事情，不是闲事？”

纽约是包罗万象的，纽约是气象万千的，但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万法皆空的世界，能够留存在我心里的只有禅意笼罩下的善念和纯美，那里有古老的田野、古老的村落、古老的歌谣。

离开纽约的前夜，睡梦里，我脑中浮现出我曾去过的Kyle的故乡，广西龙脊梯田。秋收的时节，金色的稻田被分割成层层叠叠的坡地，如起起伏伏的波涛，千万道优美的曲线与天际相连，连至云端，纵横交错，宛如天梯，一头伸向天堂，一头连着村寨。沉沉烟霭从山峦之中飘起，大山里居住着瑶家儿女，沿袭着祖先的习俗，那种农耕的气息多么令人陶醉啊。年轻人，为什么要轻易远离那片土地呢？朝有日出，暮有明月，春有山花，夏有凉风。饭菜中，有土豆、有野菜、有腊肉、有溪鱼，这样的日子也很好了。

秋天的朝阳充满暖意，早起的我有些疲惫。Kyle一早送我去纽约肯尼迪机场，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Kyle轻轻打开车上的音响，传来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这位早逝歌者的天籁之音，飘荡在全世界一切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用她的自然与柔美，用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最端庄的儒家美学方式，演绎着一个民族古典的情愫和永恒的爱情。她的声音和气息无人可比，她的情歌属于昨日，一去不复返。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Kyle跟随着曲调悠然哼唱。这时，车窗外面，路旁店铺里播放的黑人摇滚音乐如潮水一般涌来，气势吓人，震耳欲聋，一度淹没了他的轻唱。Kyle迅速关闭车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纽约街头常听到的脏话“Holy shit”（去你妈的）。

---

1. 哈林区，美国黑人住宅区。——编者注

2. 美国餐厅服务员在顾客点餐后，一般会问对方这句话，意在询问对方是想在餐厅中吃饭还是要将食物打包带走。这里也可以引申为对于纽约生活“想留下还是离开”的询问。——编者注

不一样的酒香

从太原到纳帕谷

一面是汾河绵延、黄土深厚，一面是山峦层叠、满目金黄，他从未预料过自己的明天会被切换到怎样的场景和命运里。

一转身15年，生老病死无数。

一

加州的这片山谷，漫山遍野都铺满了收获时节的葡萄架，而架子上深红色、橙红色、橘黄色、黄绿色、淡黄色的葡萄叶，像油画般精致错落。清新的田园风光让我们很快忘记一路开车的疲惫，而映入眼帘变化多端的各式酒厂，更不会让我们产生审美疲劳。

我和加州当地的记者朋友丹尼斯开车拐进这个小酒庄。门口的招牌是中英文对照的，中文名叫“杏村”，结合酒庄所在的乡村环境，让人联想起唐代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小酒庄里，主体建筑的外观略显历史的沧桑，古老的砖石外墙上密密地爬满了常青藤。品酒大堂内部却焕然一新，富丽堂皇。主体建筑前面绿草如茵，我和丹尼斯在草坪上的木条桌边品酒就餐，空气中散发出强烈的酒香和中国麻婆豆腐的味道，看来这里是一个雅俗共赏、中西合璧的地方。

酒庄的男主人叫怀敦，看上去很年轻，神清气爽。但深聊之后才知道，他已经43岁，来美国15年了。酒庄主人家的两个孩子在葡萄园里跑来跑去，宽广的空间全是他们玩耍的乐园。傍晚时，怀敦的太太谭英开车回来了。她曾是硅谷的全职技术人员，经营酒庄之后，辞掉了公司的全职工作，但还在公司兼职，每周只去上一天班。从硅谷到他们的酒庄，开车需要两个小时，据说她保持这份一周一天的兼职，只是为了接上现代文明的地气，不想彻底变成一个葡萄园中的农妇。酒庄提供住宿，因为品酒，不能再驾车上路，我和丹尼斯只好在这里住下。

怀敦原是山西太原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专业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合肥的一家设计院担任建筑设计师。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安徽安庆的女孩谭英，她也刚刚从学校毕业，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系任教。

两人一个搞建筑设计，一个研究计算机工程，但都喜欢历史文化，碰到一块儿就讨论交流各自家乡的好山好水、古迹名胜、风土人情，然后到了假期，就相约一同访古探幽，跋山涉水。她带他深入皖南的古老村落，他领她壮游山西的壶口瀑布。这样的两个青年，郎才女貌，志趣相投，算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没过多久，怀敦就把谭英带到太原见父母和两个姐姐，全家一看就中意，又漂亮又大方的南方姑娘，到哪里去找？随后的那个春节，他们按照老家最传统的风俗拜堂结婚。闹婚闹得很猖狂，怀敦家乡的发小伙伴们“胡作非为”，又是灌酒又用毛笔在他们身上涂写，怀敦担心失礼，一再阻止，脸色也一直阴沉着，倒是谭英很随和也很大气，始终面含笑意。她反而劝慰被激怒的怀敦：“一辈子就一次，忍忍就过去了。他们也是为咱们高兴。”

新婚之后，他们原本可以循着常人的轨迹，过着寻常的日子，没有预料到有一天生活会突然变化。2001年，怀敦已经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在行业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被设计院派到美国参加一个东亚仿古建筑设计方面的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期间，认识了斯坦福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一位印度裔教授。在会议安排下榻的酒店里，他们所住的房间紧挨着，两人交流颇多。教授赏识他的才华和见识，主动提出要创造机会，邀请他来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教授言而有信，两个月后给怀敦发去邮件，正式向怀敦确认一个课题计划，通知他来美国访学一年。

二

29岁的怀敦出发了，妻子也一块儿来到美国加州，以配偶身份陪同访学。开始的日子充实而兴奋，一边做课题研究，一边游览美国的大好河山。一年很快过去了，按道理应该如期回国，可谭英聪明过人，到哪儿都容易适应，她在硅谷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网络公司负责网络平台技术。她因此获得了工作签证，怀敦和儿子也随她留下。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妻子随丈夫访学而来到美国；现在，丈夫又因妻子在这里找到工作而在美国留下。

但是，怀敦在美国运气不好，在中国学的建筑设计，文化背景和设计理念与美国的差异太大，怀敦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有一次在旧金山市内参加一个面试，用人单位的人事经理问他：“你参加过哪些重要建筑项目的方案设计？”怀敦说：“我参加的项目都是中国国宝级的建筑遗产，比如我的家乡山西太原的晋祠，有着1500年的历史，它的环境设计和造型风格举世独有，我参与了晋祠保护方案的设计；再比如我在安徽省工作，皖南地区有无数的古村落，我曾加入对那些民居建筑进行

抢救性保护和整体搬移的团队中。”人事经理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并不关心你参加过哪些我听也没听说过的古董项目的保护，我们是设计公司，我想了解的是你会不会设计美国旅游景点的房子。”怀敦据理力争：“在中国，懂保护的人一定懂设计，因为保护体现的是高层次的综合学术能力，设计只是技术层面的工匠劳动。”人事经理再次打断：“问题是，我不需要在加州复建你们的那些古董。”怀敦怒不可遏，站起来指着人事经理骂了脏句话：“F××k，You should first learn how to speak in a polite way.”（我×，你应该先学会说话的礼貌修养。）说完，把应聘表格扔到纸篓里，扬长而去。

因为找不到对口工作，怀敦后来不得不从事导游职业。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团和散客去游览美国加州1号公路上的沿途景物，每周都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来来往往。从红树林国家公园南端的Leggett（莱格特），到洛杉矶的Dana Point（达纳岬），东面倚着加州终年常绿的山峦，向西俯瞰澎湃的太平洋，1号公路串起美国西海岸无数别致的小镇和令人绝倒的风景。但当观光变成职业，而且是自己不情愿从事的职业时，任何美景也索然无味。怀敦干了两年，觉得很累，既没有乐趣，也没有收获他心里所期待的尊严。他不想陪那些暴发户看景和购物，不能接受那些一掷千金却行为粗俗的中国游客炫富，他们的灵魂里除了奢侈品、赌场、富人区的房产，没有任何情趣和追求。

怀敦从旅行社辞职，不再工作了，一心一意宅在家里忙家务。这时候，怀敦和谭英在美国先后生下一儿一女，怀敦专门负责照顾小孩。刚开始不习惯，怀敦出生在中国北方，男权意识强烈，不能接受自己“吃软饭”和“当奶爸”，但时间长了，也就坦然了。谭英总是笑盈盈地安慰他说：“社会分工不同嘛。你是贵族，贵族都不工作，只负责思考人生。”正在淘米做饭的怀敦，抓了把米撒到谭英头发上：“你就讽刺我吧。”

怀敦的父亲病危临终时，怀敦夫妇正好处于等待美国绿卡审批的关键时刻，他们不能轻易回国，这会让他们的绿卡申请前功尽弃。在美国工作生活过的华人都知道，工作签证转绿卡，是一个挑战巨大的节点，需要忍辱负重，需要破釜沉舟，不能随便跳槽，不能随便离开美国。申请者最害怕的，就是这时候中国的家里有特殊状况发生。这是一个残忍的、不可两全的难题，在美国生存打拼多年，就是为了一家人的绿卡，为此，他们耽误了回家时间，也因此没能赶回去见老人最后一面。等拿到绿卡，他带着妻子儿女回山西时，他见到的是汾河边的一座坟茔和怆然屹立的一块墓碑。

母亲从壁柜里取出一瓶陈年汾酒，交给怀敦说：“这酒是你父亲藏了20年的，一直舍不得喝。他临走之前，还念叨，等你回来，就打开和你干掉。”怀敦揣着酒，在父亲的墓前坐了一天一夜。他摆了两只酒杯，一只杯子里的酒洒在坟上，另一只杯中的酒自己喝完。汾河奔淌，中流扬波，

哗哗地注入不远处的黄河。汾河之水，被日出日落倒映出绵绵无边的烟霞，黄土深厚，故土难离。父亲的去世，特别是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为怀敦永生的遗憾和悲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难以愈合，岁月越久，伤口越痛。

很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几乎不断地回国探病或者奔丧。往返两地，飞行频繁，飞机上一路焦虑，担忧着在中国垂危的父母，牵挂着老病的家人，百感交集，心如刀绞。怀敦的母亲、谭英的父亲和母亲，一个个陆续离世。在中国，他们最亲爱的父母都已故去。回想过去，长大、求学、工作、出国，似乎没有给父母多少时间的陪伴，没有多少人伦的报效，甚至没有多少成年后更深的交流，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父母给他们留下的，是童年时的回忆和少年时的背影，是一去不返、无可报答的舐犊之情。

在那以后，怀敦每到新年都要去旧金山的唐人街，买一本中国的老日历，好查询农历。每到清明、冬至、中元节的时候，他就发短信提醒在山西老家的大姐："记得帮我买两瓶最好的酒，供在爹妈坟前，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行。我把钱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了，算我买的。"

三

2009年，在于山西做煤炭生意的二姐的支持帮助下，怀敦一家在加州的纳帕谷（Napa Valley）买了一个很小的酒庄。提到美国葡萄酒，人们首先会想到加利福尼亚州，而提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则首先会想到纳帕谷。纳帕谷里全是葡萄园和酿酒厂，那里的葡萄酒品质不亚于法国酒品。春光明媚之时，酒乡山谷里层层叠叠的葡萄架上开满了一片片明黄色的碎花，等到秋意渐浓的时候，满目是大片的金黄，空气里还有葡萄成熟后的芳香。葡萄园，如梦如幻，一望无际，从晨曦到日暮，各种景致交替呈现。

怀敦忘记了外面的很多事，也很久不回中国了，在这里一心种葡萄，一心酿酒。酒庄的事务井然有序，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和贮存、灌装过程都在酒庄内进行。虽然人到中年，且此前两口子都没有过栽培葡萄的经验和经营酒庄的经历，但他们聪颖好学，一学就会，渐入佳境。

后来，来参观酒庄的中国游客多了，他们开辟出小中餐厅和小旅馆，增加了人手。再之后，怀敦在酒庄里盖了一座小佛堂，里面供奉了佛像。不到20平方米的小佛堂，是他亲自绘图设计的，他自嘲道："我的专业第一次在美国派上了用场。"

怀敦的父母信佛，一直很虔诚。在他小时候，每到暑假，父母就会带着他

去五台山进香，在山上一住好几天。山西五台山香火隆盛，名僧辈出，是有着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文殊信仰的东方圣山。在这里，寺庙鳞次栉比，佛塔摩天，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小时候，他跟随爹妈步行上山，累坏了，走不动了，父母就轮流背他。一路上香火旺盛，香客不断，香烟缭绕，每到一处寺庙，红墙碧瓦，掩映在高大而茂密的松柏丛中。山顶上，是一眼望不到天边的开阔，由近到远，山峦层叠，景色壮美。路过天然森林的边缘，到处结满野果，父亲欣喜地招呼他，一会儿摘下李子让他尝，一会儿采下酸梨给他吃。

回想着那些情景，怀敦就发呆，一发呆就是半天一天。他还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诵读的《论语》里，有一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可是，这个世界其实是迷茫的，人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切换到怎样的场景和命运里。一转身15年，生老病死无数。生命终究是渺小的、苦难的、没有着落的。

在这个自然舒适、气氛温馨的酒庄，我和朋友丹尼斯一边慢慢品酒，一边欣赏着窗外碧草如波的葡萄园，在如洗蓝天的映衬下，葡萄鲜艳欲滴。怀敦悄悄走过来，给我们的酒杯加酒。酒瓶刚打开，浓浓的香气扑鼻冲来，怀敦介绍：“这是8年的赤霞珠。”我说：“这可是酒中极品啊，酒香万里。”

怀敦不以为然，淡淡回应：“这就叫酒香万里啊？我家乡山西才是真正的酒乡呢，汾河的水酿的汾酒和杏花村的香气，能飘到万里之外的地方，我在美国都能闻到，常常闻到，小时候我给父亲的酒杯斟得满满的。”

酒庄的小佛堂里，收音机正播放着诵经、敲打木鱼的声音，在旷远的田园，在起伏的大地，在有鹰飞过的山涧，在时过境迁的异国，梵音飘荡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一阵阵岚烟飘起，聚散无定，没有形状，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

六只咸鸭蛋和命运的玩笑

从淮安到墨尔本

他如今生活在“别问我是谁”的移民世界里，六只咸鸭蛋的命运玩笑，摧毁着他的东方传统价值观，把当年踌躇满志、扬言要做出“中国微软”的青年变成了淡泊无求的男人。

而他生命中真正风华正茂的岁月，则永远留在了故乡。

一

葛少祥是我在墨尔本认识的第一个澳洲华人。每当我路过他的屋前，总是见到他悠然地站在篱笆后面修剪那棵已经果实累累的橘子树，偶尔漫不经心地坐在树下，神情恬淡地拉一曲手风琴。葛少祥近日把房前的篱笆改漆成象牙黄，他每天只漆一到两格，把一个原本简单的装修工程无限期延长，打发着下班之后那些百无聊赖的黄昏。

墨尔本的朋友们都说，那个当年豪情万丈、壮志凌云、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的江苏淮安小子，自从定居澳洲之后，就变得跟当地的树袋熊一样慵懒了，除了在橘子树下漆篱笆，他别无所求。每当朋友们这样取笑他，葛少祥脸上就浮现出一种仓促而淡然的笑意，然后自嘲说：“我在刷篱笆的乐趣中感受地老天荒。”他的自嘲逗得聚会的朋友们开怀大笑，而他总在别人的笑声中默默离去，躲到院子的一角去喝樱桃酒。

从朋友们各自的讲述中，我大致拼凑出了葛少祥昔日生活的图案，但我真正完整听到“咸鸭蛋”的故事，还是在他开车带我去菲利浦岛那天。我们在海边的小餐馆吃午餐，他以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把那些被误传曲解的往事的真实面貌复原给我。

在1999年那个暑假结束后的新学期，当时还是硕士留学生的葛少祥走进澳洲海关的那一刹那，他就被命运的模具铸刻成了一枚充满玩笑意味的纪念币，标志着一段不可抗拒的苦难征程的起始。当他的行李被澳大利亚海关工作人员检查时，行李箱中被发现有六只咸鸭蛋，而葛少祥填写入境卡时没有向海关进行申报。按照澳洲法律，携带禽类食品未申报是极为严重的违法行为，葛少祥将被海关执法官罚款5000澳元。葛少祥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李箱中有这六只咸鸭蛋，很显然，这些家乡的土特产是他临行前母亲偷偷塞在他箱子里的。母亲知道咸鸭蛋是葛少祥的至爱，在儿子出远

门前，她连夜煮好了这些双黄咸鸭蛋。

葛少祥当年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父母倾其一生积蓄所筹，5000澳元相当于他半年的生活费，对于当时的中国工薪阶层家庭而言，那是一个天文数字。葛少祥不忍将此事告诉父母，那样只会让家人为他的经济困境操心，也会让母亲为她无意犯下的过错自责。为了弥补这笔损失并维持在异国的开销，葛少祥开始了最辛苦的打工生涯。他向所有人隐瞒了他遭遇的那场不幸事件，独自承受那六只咸鸭蛋带来的巨大代价。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同学和老师们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起早贪黑地在餐馆和超市打工。洗碗、理货、修草坪、做清洁工，超时违规的打工让他筋疲力尽，彻底影响了学业，短短一学期里，他竟有两门功课未通过考试。他不得不重修那些科目，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学费，在无奈的坚持和无望的挣扎中，他的生活陷入一场恶性循环的噩梦里，当年的高考状元在澳洲功课一败涂地。而因为要重修不及格的课程，他比一块儿进校的同学整整晚了一学期才硕士毕业。

毕业之后，葛少祥给一家农械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定居澳洲，结婚生子。他曾一心想回国工作，孝敬双亲，但妻子执意要留在澳洲。在两个孩子先后出生后，葛少祥决定随遇而安，新的家庭和责任已经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异国。

二

是谁对葛少祥开了那样一个残酷的玩笑？葛少祥绝对无辜，对夹带在行李箱里的那六只鸭蛋一无所知；而他的母亲，从情理上说也无辜得很，一个本分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善良的普通中国妇女，一生遵纪守法，对她儿子要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全然一无所知；向葛少祥罚款的澳洲政府依法办事、秉公执法，更无错可言。澳大利亚是农牧业大国，任何违禁动植物和食品的入境都可能给这个水草丰美的国度酿成不可挽回的生态灾难。

葛少祥永生难忘当年在澳洲海关入境，向那位女官员请求宽恕时那幕焦急无助的情景。当葛少祥意识到，这是母亲无意中给他制造的一个巨大麻烦时，他竭尽全力地用当时还十分生硬笨拙的英语向海关女官员解释他的无辜，可女官员拿出澳洲法律条文回答他，他们执法只看行为和后果，不问原因，5000澳元的罚款一分都不能讨价还价。葛少祥又向执法人员解释这5000澳元对一个来自中国的穷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女官员报以公事公办的答复，“对不起，这是违法者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女执法官的脸上冷漠而毫无表情，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下，葛少祥的东方传统价值情操受到了无情的伤害，母爱反而有罪，执法者的冷漠却合理。一个中国妇女的慈母之心，和法制社会的坚硬无私在澳洲海关发生

了激烈的冲撞，而冲撞的直接受害者是那个慈母的儿子，此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救他，西方法制文明拒绝一切通融，排斥一切人情观念。而更糟的是，在罚完这笔款后，她不幸的儿子还将为挣回这笔生活费而夜以继日地打工。葛少祥很像莫泊桑小说中那个为一串丢失的假项链终生还债的路瓦栽夫人，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被命运尽情捉弄。葛少祥也许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的清白辩解，然而，聘请律师的费用和取证的成本肯定会远远超过那5000澳元。也就是说，那时候，葛少祥必须认命，葛少祥别无选择。

事实上，在葛少祥苦撑生计，辛苦地打工和读书的那些年间，他几乎没有精力去咀嚼降临到他头上的这场灾难，形形色色的肉体劳作和精神重负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日子。在那些年里，昆士兰明媚的天空和绚丽的海景对他而言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一样，直到那些苦难全部结束，他像一个被生活压垮的青年，从幽暗的隧道深处爬出，支撑起疲惫的身心，开始新的生活。葛少祥还能满怀希望地开始新的生活吗？在旁观者看来，他以前经历的只是生活中的一场小磨难，他后来总算苦尽甘来，过上了典型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而对葛少祥来说，那不是人生的小磨难，而是价值情操的一场劫难，让他在精神层面上陷入危机。当他有足够的时间整理往事时，他要面对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困惑，那就是，他那场受难的意义何在？六只咸鸭蛋引发的苦难带来的是崇高感还是荒诞感？如果那场悲剧是崇高的，那为什么它要非常偶然地缘起于六只荒诞不经的咸鸭蛋？如果那段辛酸的往事是荒诞的，那么，他曾经忍受的所有痛苦和他母亲含辛茹苦的爱又有何意义？像大多数追求现代理性的青年一样，葛少祥当年在中国读大学时熟读西方法制文明的书籍，他没有料到自己踏进西方国家门槛的序幕却恰以那样极端的方式拉开。他不得不丧失尊严地承认，认定自己是该受惩罚的，认定母亲是有过错的。葛少祥曾经推崇和维护的理性文明受到了来自他自己的质疑。法制理性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它功勋卓著地维护着社会的公序良俗，但是法制理性又恰恰是以“对人性的绝对不信任”为前提的，当现代社会孜孜以求法制理性时，如果不能把坚硬的法条在活生生的复杂现实中具体使用，法律就可能成为冰冷的程式化的“自动售货机”，而无法成为一种人文的、伦理的理性活动机制。

三

我宁愿只把葛少祥生命中那场辛酸的意外事件看作一场文化的冲突或者误会。那六只咸鸭蛋，用淮安大地的泥土腌制，有葛少祥从童年时代就熟悉的一种味觉。母亲知道远在天涯的孩子将会多么眷念那种味觉。这个没有出过国门的朴素的中国母亲，把刻骨的爱和牵挂之情用东方式的含蓄悄悄藏进儿子的行李箱里。那个澳洲海关的女官员，据说也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那六只非法携带入境咸鸭蛋首先激发起的是她的职业敏感，她要对她

的本职工作和国家安全负责，她必须要惩罚违规者，无论他的过失是故意所为还是无意造成。她也许相信葛少祥的话是真的，葛少祥真的不知道箱子里有鸭蛋，但即使她相信，她也无法理解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那个糊涂的母亲为什么不告知儿子一声，就把六只咸鸭蛋悄悄放在了儿子的行李箱里。

葛少祥从此过起了橘子树下漆栅栏的生活，他那样专心致志、慢条斯理地进行着那项冗长的刷漆工程。六只咸鸭蛋的命运玩笑，把当年踌躇满志，扬言要做出个“中国微软”的青年变成了淡泊无求的男人。就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在规训和引导的理性计划执行中，人往往很轻易地被剥夺了“身份”。葛少祥如今生活在“别问我是谁”的移民世界里，他的记忆中，咸鸭蛋的味道挥之不去，鸭蛋上沾的黄泥中有淮安的土、运河的水，那层透明的青绿色外壳是曾经端午节时挂在脖子上的吉祥图腾，还有那诱人的、流油的蛋黄，是他和中国兄弟们开怀畅饮时的下酒菜。橘子树下，往事一一重现，他把生命中真正风华正茂的岁月永远留在了故乡。

就在一年之前，葛少祥的父母来澳洲探亲。他们原本计划在墨尔本居住半年，但不到两个月，老人就坚决要提前回国。葛少祥的母亲来澳洲最渴望的，是跟小孙子和小孙女培养亲情，可两个孙辈根本就无法跟这个祖母沟通，连语言上都无法正常交流。有一回，当小孙子摔倒在地，老人怜爱地忙着去搀扶他时，却被小孙子反感地用手推开了。小孙子的眼神和举动重重地刺伤了祖母，她可能无法懂得，在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体独立的西方，孩子从小被教育“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搀扶别人甚至被看作一种对别人的侮辱和冒犯。葛少祥的母亲怅然地看着两个“黄皮白芯”的小“香蕉人”，她孤独地意识到，她和孙辈之间除了血缘上的联系，已不再具有其他的关联，她不知道，她当年送儿子出国念书而引发的一系列结果是一种成功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机场，葛少祥帮老人办好登机手续。在过安检口之前，母亲把葛少祥叫到一边，她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很久说了一句：“只要你们一家在这儿过得开心就好，我们老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老人此时和葛少祥一家近在咫尺，却好像已经隔着茫茫沧海迢迢星河。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的身影从葛少祥夫妇的视线中远去淡出，直到消失。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葛少祥驾车凝视前路，眼中泪水模糊成一片，不得不把车停在一边。两个孩子问父亲为什么哭了，葛少祥故作镇定地说：“窗户没摇上，风沙迷了眼睛。”孩子们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车窗外面纯净如洗的蓝天和一尘不染的道路，他们不明白迷住父亲眼睛的风沙在哪里。

山河故人

从长江三峡到爱达荷州

好莱坞电影所宣扬的美国精神，在现实中被替换为功利和势利，一样的挣钱养家，一样的阶层分明，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仁慈的理想，没有动人的牺牲。

他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成为“洋插队”中的一分子，而那个永沉江底的故园，则成了一个远逝的梦。

一

尚鲲居住的社区离美国爱达荷州的首府博伊西并不远，大约20分钟车程。自从2005年，他一直生活在这片遍布棉白杨的河边地带，周围是爱达荷的田园、灰蓝色的天空、一人高的杂草，旷野辽阔而荒寂，仿佛永无穷尽的蜿蜒的公路，昏黄的世界展开到无垠。

这样的景色令尚鲲昏昏欲睡，仿佛总是晕厥过去，沉入慵懒甜美的梦境。到冬天，外面总是刮着大风，风声好大，木头房子好似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

这里是典型的美国——显然不是大都会——小镇。每天傍晚，妻子邱璐站在一片向日葵旁，等待尚鲲下班回家。尚鲲就在附近一家马铃薯栽种顾问公司担任农业机械师。每天他回到家时，总是那身随意的打扮：紧身牛仔裤，衬出中国山民精悍结实的体形，裤腿卷起，露出靴子。

他们房前那条路，沥青的，那么长，延伸到地平线。上空飘着云，迅速变幻着。一路绿油油的土豆田，充满了悠然的田园气息。

尚鲲原是中国重庆巫山人，从小在长江三峡的支流大宁河边长大。在一个叫作“蜂滩”的小村寨长到17岁时，他被父母送到巫山县城读高中，他记得那是1994年初秋，县城的广播里放着《涛声依旧》，是那年最流行的歌。

从中学时候起，尚鲲就知道，一种史无前例的变化正降临到当地人的生活中。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的开工，三峡即将迎来大江截流，在大坝和水库建好之后，他的家乡很快将被淹入水底，而他们全家，和村寨的乡邻们一起，将被移民到海南岛的海口。

1997年，尚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从那年起，三峡大坝开始进行分期蓄水。1997年大江截流后，水位要提高到75米。虽然水位上涨，但暂时还没有影响到他家乡的小村寨，也没有影响到巫山县城。那年8月，他就要乘船离乡，沿长江顺流而下，去长江下游的那所金陵著名学府求学。他迟迟不肯离开，自己把去学校报到的时间往后拖延。那个夏末的雨后，古栈道的小径上出现了好多小动物：几只变色龙，探头探脑地在路边的山林中嬉戏；几只蜗牛在路中间爬行，他蹲下身去，想与它们对话。看着它们那慢悠悠的动作，他真想帮它们一把。“你们要去哪儿？我举手间就可以将你们送到啊。你们也知道美丽的家园即将沉入水底吗？你们也要在忧伤中远离故土吗？”

尚鲲卷着裤脚，徒步涉水，脚底踩着冰凉的鹅卵石，非常惬意。河滩上出现了一大群三峡的孩子，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裤衩，踩着阳光闪烁的鹅卵石跟着小船奔跑着、叫喊着。峡谷边上的浅水中，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鹅卵石，随意捡拾一颗，都鬼斧神工。水清澈见底，静处鱼尾摆动，树影森森。和长江一样，大宁河里，也时有险滩湍流，汹涌急淌。竹篾片编成的纤绳被纤夫们黝黑而健壮的脊背绷紧着、承受着。三峡纤夫，长年负重，生计艰苦，为了不让纤绳和乱石划烂衣裤，他们习惯裸体拉纤，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今。这些纤夫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大多都将失业，因为水会把他们原先工作的地方淹掉。

他们这些三峡人，得知自己的家园将要淹没水底，被安排了近地搬迁或异地搬迁。异地搬迁者将迁徙至上海崇明、海南、江苏等地。一个村、一个家族的人可能会被分散到天南海北，甚至此生见面都遥遥无期。山民们焚香、叩头、祈祷，双手捧起泥土含泪亲吻着，许多人已经迁移到了外地，但无法忍受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思念，特意又赶回来，坚持要等到亲眼看到家乡的房子全部被淹没的那天再走。是啊，他们怎能忘怀故乡呢？在没有战争的年代，这里百花盛开，男耕女织，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贫富无殊，楚歌回荡，居住在这里的先人过着简单古朴的生活。

尚鲲有个弟弟尚鹏，比他小两岁，帮哥哥背着箱子，送他到长江边的码头。1997年，尚鲲踏着不变的步伐上路了，迎着夔门的日出，在大江拐弯的地方，他漂行在曲折悠长的江流峡谷之间，那是中华文明的血管。

二

尚鲲进入南京大学，学物理专业。那些年里，赴美留学急剧升温，仿佛成为莘莘学子最有出息、最有格局的追求。在当时的南京大学校园里，走进图书馆和自修教室，是一片蔚为壮观的学英语景象。学生们甚至放弃了专业课学习，一心背单词，备战托福，迎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申请美国学校和奖学金，并为很可能功亏一篑的赴美签证做准备。“新东方学校”、“疯狂英语”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时，中国青年开始迷恋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费城故事》，一部部作品催人泪下、感召人心，颂扬美国价值，讴歌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尤其是演绎了一出“《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们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部伟大的杰作”，让中国青年们相信，美国是如此尊重一位普通母亲的感受。

在这样的校园氛围里，尚鲲自然而然产生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反正自己的家乡就快没有了，到海南和到美国，又有什么区别呢？他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他能感觉到，父亲的心情其实是复杂的，既为儿子的志向高兴，又对孩子要远走高飞依依不舍。

200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尚鲲，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硕士。在收到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情况下，签证被拒。他一次次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尝试，直到第六次才获签通过。尚鲲每申请一次签证，就要支付上千元人民币的签证费，还有一次次奔波的食宿旅行费用，加上之前每申请一所学校就必须电汇给校方的两三百美金的申请费，依照当时的中国经济水平和物价指数，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农村学子来说无疑是笔巨款，他只能向亲戚借钱。

经历过那个年代“美国梦”的中国青年，都知道当年的签证难。因为那时候中国不很富有，美国必须审核你的财力，必须认定你没有移民倾向，不会滞留美国、不会占用美国的国民福利，或者更直白地说，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为此，尚鲲要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告诉签证官“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拼命证明自己“不会留在美国”、“不会给美国带来负担”，尽管签证官心里很清楚，这可能全都是漂亮的谎言。

随着2003年6月10日大江截流蓄水，一辆又一辆载重卡车将石料运到围堰龙口，水面上升了175米，尚鲲出生和成长的小村寨蜂滩，连同那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巫山老城，永远地沉入水下。然后，一座崭新的巫山新城，朝气蓬勃地屹立在长江边。

尚鲲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苦学三年，学的是农业机械。2004年，尚鲲硕士毕业后，几经周折，几次辗转，从华盛顿州到了邻近的爱达荷州。这里以盛产马铃薯著称，而且马铃薯品质特佳，土豆田一片连着一片，漫无边际。他被熟人介绍到这里的一家马铃薯栽种顾问公司，成为指导农业机械的技术人员。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他结识了从四川乐山留学移居过来的邱璐，并娶了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为妻。邱璐学的是商务管理，曾是爱达荷州州政府工商发展事务方面的雇员，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遭遇政府裁员，她从此失业。后来她不得不在一家马铃薯罐头加工厂工作，一直做

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邱璐四川的老家就在岷江边上，少女时代，如果天气晴好，空气通透的时候，打开窗户能看到远处的乐山大佛。那个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弥勒和尚，成为她最幸福的有关中国的记忆。现在，她和丈夫身处“马铃薯之州”的美国爱达荷，靠山吃山，夫妇俩从事的职业，都与马铃薯有关。每天开车绕来绕去，都绕不开马铃薯田地。邱璐开玩笑地给尚鲲起了个绰号，称他为“马铃薯王子”，尚鲲一听就呵呵大笑：“马铃薯王子就马铃薯王子吧，好歹也是个王子。你就是马铃薯王妃了。”

爱达荷州的景观和他童年故乡悬崖绝壁的峡江地貌不同，这个农业州里，只有巨大的自动洒水机器横跨整个农田，在蓝天白云下缓缓移动，显得异常壮观。连收割的草堆，都被机器压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博伊西往北，上百公里明亮碧绿的农田，看不到一个人在劳作，只是不时看到有小型的私人飞机在高速公路两旁的低空穿行，不知是当地人的娱乐还是作为农业的辅助，这让尚鲲经常感叹，在美国当农民可真轻松啊。

这个荒僻的农业大州，有大量讲西班牙语的非法移民从事种植工作，他们中很多人是偷渡过境来美国避难的。这个州的野生动物品种奇多，经常能在路边看到游动的蛇，或者死去的丛林狼，不免心里发怵。在各种奇异的植物里，最可恶的一种叫“山羊头”（Goat Head），它们无孔不入，路边到处都在蔓延。“山羊头”生命力极强，很难杀绝，上面有尖尖的针头，这些针头是轮胎的头号杀手，车轮不小心压上去就会爆胎。

爱达荷州人烟稀少，人迹萧索，华人就更少，更别指望有什么华人商店、华人餐馆了。端午节的时候，从西雅图过来的、老家是湖北秭归的朋友送他一袋粽子，尚鲲吃得香，也吃得心里越发想家，想起了三峡秭归是屈原的故里，也想起了《楚辞》里“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的句子。他和秭归的朋友边喝酒边讨论，说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这样的新移民，最合适不过了——洋插队。20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曾经在中华大地卷起一阵巨大的波浪，改写了成千上万中国家庭的命运，那个年代把知识青年去农村叫作“插队”。事过境迁，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就有大批学子去国外开始他们的留学、移民和打工生活。对于这些行为，人们贴切地称之为“洋插队”。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21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社会精英、知识精英组成。尚鲲一家，秭归朋友一家，他们都是“洋插队”中的一分子，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

三

尚鲲的父母来美国探亲，只住了两个月，处处不习惯。他们也不想到哪儿旅游，母亲每天守在屋里，给儿子腌制酸豆角，尽可能给他多做点，储存

在大瓶子里，那是尚鲲从小吃惯了的小菜。在三峡大江截流、巫山村寨被淹后，尚鲲的父母曾被政府安置，统一迁移到海南。在海口住了几年，两位老人还是跟随尚鲲的弟弟尚鹏，又重新返回巫山新城。尚鹏在那里做了点儿橙子的生意，把三峡脐橙销售到环渤海的天津和唐山地区。他在新城买了一套很大的商品房，楼上楼下，空间充足。他把老人也接进去住，还留了一间房给远在美国的哥哥嫂子。那样的房子就是普通的小区住宅楼，外观没有什么特色，周边也没有什么风景，不像他们兄弟俩小时候住的房子，虽然是破旧的小泥屋，但是房前有万古大江流，窗外是雪白的橘子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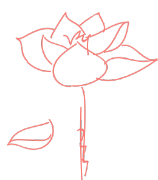
好几年没见到哥哥了，尚鹏有一次打算到美国探亲，于是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在领事馆面谈时，尚鹏遭到拒签。估计由于他是做小生意的，在签证官眼里，这样的职业收入不算很稳定，所以不愿给尚鹏签证。

时光流转，时代向前。这时是2016年，《拯救大兵瑞恩》上映已经过去近20年了。当年被美国价值观感动得涕泪交加的青年，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在美国，生活是现实的，现实得既功利又势利，一样的挣钱养家，一样的阶层分明，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仁慈的理想和动人的牺牲：妻子邱璐从西安交大毕业来美国名校读商务管理硕士，也无奈在金融危机中失业；弟弟计划来探亲，也被怀疑有“移民倾向”而莫名其妙被拒签。你的每一个获得，都是因为你对这个国家有价值，对别人有用处。如果你是弱者，就注定被抛弃被轻视。你必须强大，哪怕逞强也行。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自我感动、自我表扬的美国精神，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少实际关系。你藏在心里的《楚辞》和对故国家乡的情感，如果不对这个社会产生实用价值，你千万不要矫情地抒发，没有人会懂你，也没有人会理你。

尚鲲常常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取得学位后，在美国留下并不特别困难，但对今天那些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来说可不容易。赴美留学的中国青年越来越多，多得像过江之鲫。今天的孩子，取得赴美学生签证已经不再是难题。可留学几年，毕业之后，等待中国留学生的，就是在美国找工作和申请绿卡过程中的苦苦角逐。这是一场学历、名校、专业、天才、能力、机会之间的残酷竞争。

小时候，父亲撑船带他和弟弟拐进大宁河，这个被人们诩为小三峡的地方，峡中既有磅礴的气势，又有玲珑剔透的幽景。那里绿树长青，泉水叮咚，船在溪峡中穿行，犹如行进在远古的画廊之中。远看青山逶迤、翠峰如簇，近观青苔染石、藤蔓绕树。深谷迷雾中，涧水飞流而下，巴山绵竹有灵猴幻影，峡江薄云又恍惚出岫。两岸欢跳的猕猴、鸣唱的飞鸟都和高入云天的岩石一样古老。而今，那都是远逝的梦了，就像永沉江底的故园和情歌。

眼前的现实就是，爱达荷州，尚鲲的家门口，他站在明晃晃得刺眼的向日葵丛中。他总是放眼望去，望门前那条路，永无止境。那条荒凉的路，通往永恒的孤独、母亲的温柔和生命的故乡，那个叫三峡的地方。



chapter 2
原地却是别样风景

上海渡

> 老克勒们讲究着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烂的美国水手腔，并以此分出高低贵贱，他们姿态优雅，举止讲究，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写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年代的爵士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士、欧米茄表，跳那个年代的国标。
>
> 他们生活在光阴的深处，全然不顾世上的戏已经唱到了哪一出。



这个春天湿冷湿冷的，“倒春寒”倒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气候让人觉得江南是令人窒息的，哪里有什么“杏花春雨”？明明就是无止无休的凄风冷雨。墙壁是冷的，树是冷的，河水是冷的，城市也是冷的。上海便是这一群冰冷都市中的一座。

我很少在文字中提起上海，尽管在中国的城市中，除了自己的家乡，我最熟悉的就是北京、上海和广州。不写的原因在于上海是无法把握的，它已经不是张爱玲的那个上海，也不是王安忆的那个上海。张爱玲的那个上海是世故的，世故得让你感到人生是一张无比凉薄的纸；王安忆的那个上海是冷静的，冷静得让你明白世事是一场分外卑微的梦。张爱玲的上海是这座城市风华正茂的往昔，外面的世界百般旖旎，心底的世界却万般苍凉；王安忆的上海是这座城市在红旗下圆滑的蜕变，一座城就像一个人，人生很庸常，人情很凶险。就这样，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女人加在一起，解释清楚了这座精致又通透的时尚之城，还有那些永远年轻又永远苍老着的关于上海的世故人情。

有时在周末，我乘坐D字头列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从江苏来到上海，在淮海中路的Briccocafe（倍可意）喝茶，抽一支烟，沉浸在午后散漫的阳光里，或者在波特曼酒店到梅龙镇广场的那段马路上缓缓漫步，静安寺金碧辉煌，斜阳洒满路面，春晖降临，大地回暖。每当这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幻觉和沉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试图阐明，人性在总体上具有一种向善的本能，因而历史具有一种自动走向完美的趋势。因此我经常安慰自己说，我们感同身受的现实终将会被改变，我的祖国和人民终将会被人类普世价值的阳光照耀。

很多年以前，我的朋友孔老师还在上海德国人的公司工作。有一回我住在

她莘庄的家里，她曾经那样斩钉截铁地痛下结论说：“上海70%的外国人是垃圾。”孔老师性情一向偏激，说话也难免偏激，但你能说她就全然没有道理吗？上海滩商业街的无数盏路灯下，总会有一个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柔情蜜意地搀扶着一个鬓发如霜、皮肤松弛的白人老头。那紧挽的手臂维系着绿卡、美元、奢侈生活和大半生的医疗保障。这是一种活法，和尊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深深地理解一切生命挣扎的痛苦姿容，就像我理解《圣经·旧约》里说的：“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这样的地方，人情冷暖固化为一种规则和技术，道德立场是瘫软的。珊珊从江苏到上海快五年了，处心积虑想嫁一个体面的欧美男人，变换了许多国家的许多男友，至今仍旧独身。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珊珊约我在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酒廊见面。她点了两杯南澳葡萄酒，疲惫的我们歪歪倒倒坐在窗前，桌上烛火摇曳，我们俯瞰浦江两岸的灯火，她突然咬牙切齿地笑道：“这些鬼佬，交交朋友、玩玩乐乐都愿意，一到谈婚论嫁了，比谁都精明。我就是要嫁成功！这就是上海，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后，珊珊用英文骂了一句刻薄的脏话，比苏州河的水还脏。

二

陆家嘴是21世纪新上海的新地标，重重楼宇、摩天大厦和东方明珠交织成一个中国版曼哈顿般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形象工程。春寒的阴雨中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我和晓风等人在浦东这家名为爱晚亭的餐馆临窗座位用餐。透过这座奢华的景观餐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浦江对岸著名的外滩建筑群。晓风是体制内官员，根正苗红，不时情真意切地回忆起共和国的往昔岁月。几年前他还跟英国人合作出版过一本时尚杂志，杂志一度走红于外国人的社交圈。这一刻，晓风多喝了几杯智利干红。人喝多了就难免感慨往事，他一手用筷子夹猪头肉，一手指着外滩的海关钟楼说：“当年上海解放，是我爸爸爬到海关钟楼顶上，把红旗插上钟楼的。是我爸爸他们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上海。”我知道自己不太厚道，一边给晓风斟酒，一边取笑他说：“是啊，当年你老爹把帝国主义赶出上海，现在，你又把帝国主义请回上海合办杂志。”晓风哈哈大笑，他的脸更红了。

是玩笑吗？历史就是玩笑啊，恶毒的玩笑。昨天，霞飞路改成了淮海路，麦琪路改成了乌鲁木齐路，革命的地名覆盖了殖民主义的踪迹；今天，浦江再次融入纽约的元素、巴黎的气质与伦敦的风范，英语再一次成为所谓上等人的官方语言，上海话再一次被悄然排挤出城市的核心。历史就是这样一页页无情地翻过来翻过去，人是裹挟其中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调。

上海其实没变，一切如故。衡山路梧桐树影婆娑，有咖啡的热香，也有抽烟的女子，人人都是过客，不奢望天长地久，都只是惊鸿一瞥笑看人间沧桑的。衡山路最美丽的时光不是午夜，而是傍晚。这时候，街道华灯初上，行人稀少，沿着宽宽的梧桐大道轻盈步行，只见西式的洋房、古典的教堂、街头的公园、私人的小院，还有散落各处的酒吧和咖啡馆，全都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华彩，让你仿佛身处静谧的梦境。

桃江路的红房子是暖意融融的，是化干戈为玉帛的。陕西南路是活色生香的，每一家店铺都有训练有素的势利笑靥。徐家汇的上海老站永远屹立在那儿，调动着食客的热情，还抚慰着游子的落寞。那些典雅的海派洋房，重要的就成了历史文物，不够重要的就改作餐馆。华山路、东平路的名人寓所和花园洋房都开了特色餐厅，屋里有老唱片机、吧台、化妆盒、雪茄房和泛黄的老照片，这些公馆和老房子里处处是谈资，谈的是财富、股市、政治联姻、留洋和私情。上海的私情是要用金钱支撑的，贫贱夫妻百事哀。钱是这个城市万种风情的源泉，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情义，钱用完了，情义也就到了尽头。世纪大道上的白领也好，皇家艾美里的舞女也罢，和上海的关系只能是情人关系，不会是夫妻关系。情人是情义，夫妻是恩爱；情义是用来有福共享的，恩爱是用来有难同当的；情人是以纸醉金迷为底色的，夫妻是以柴米油盐为基础的；情人的收场是“长恨歌”，夫妻的结局是生死别。苏州河是见证，十六铺码头也是见证，见证旧时代的荣辱和新世纪的悲欢，陆家嘴的轮渡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此岸渡到彼岸，也不过就是从浦西渡到浦东，从和平饭店渡到金茂大厦，从旧时代的欲望渡到新社会的欲望，黄浦江水想洗尽铅华，却洗也洗不尽，这就是上海的“渡”。

昆曲和这座城市的气质是暗合的，暗合它的香艳，暗合它的绵软。上海是欧美精致和江南精致的叠加混合，兰心大戏院和逸夫舞台就把这精致一点一点地加工、一夜夜地上演。昆曲是闷骚的，这很像上海，昆曲也是颓废的，这也像上海。我来到兰心大戏院看“上昆”的戏，驱除了冬末的寒意，只觉春风满怀，看杜丽娘在幽暗里呜呜咽咽，另有明晃晃的灯光照耀下醉酒放浪的杨妃。为前来剧场观赏昆曲的欧美朋友们解说剧情是个酷毙了的挑战，陪同我看戏的后生朋友“飞青年”首先是把《牡丹亭》译成“一个中国少女在闷骚的春天”，然后将《贵妃醉酒》译作“酗酒的中国皇妃”。这样的翻译是多么上海、多么“雷人”啊，是在全球化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解读古老的东方文化。昆曲是展示人生的美好，“飞青年”不是说美好是需要“无菌环境”的吗？现在，如果现实中找不到美好赖以生存的“无菌环境”，这方虚拟的舞台就是最合适的无菌室，在舞台上，艺人们可以极尽生命的纯美。

三

浦东是浦西的21世纪升级版，不过这种升级是不得要领的。今日的上海其实是没有灵魂统领的，更像一具肉身和躯体的都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有金融豪赌和商业冒险，还有居于世界前列的文学艺术和新闻报业。今天的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博物馆全不像是从这座城市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花费巨资买来的昂贵珠宝和豪华钻石，生硬地镶嵌在城市的中心广场，来标榜这座城市的人文厚度。

今天陆家嘴的白领金领就是旧时上海滩洋买办的现代翻版。他们过得辛苦又舒适，体面而国际化，浮华而迷乱，在中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欧风美雨一番再海归，供职于陆家嘴的投资银行，在联洋社区买套复式公寓房，开辆霸气的日本车，到汤臣中心打高尔夫球，晚上还经常逛到碧云社区附近的红公鸡酒吧喝两杯，一进门，见到老熟客，寒暄的话就是：“Jackson（杰克逊），好久不见啦。我三天前刚从纽约回来，碧云社区真的非常非常纽约啊，来到此地如同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纽约，兄弟我在美国的时候……”上海白领金领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多么抒情、多么“话剧腔”啊，仿佛纽约真的是他们的故乡。

白领金领们虽然留学欧美，但毕竟生在当代。比起老克勒[注]那一代，他们是粗糙的。老克勒们整天叹息，上海真是江河日下啊，20世纪30年代有周璇、阮玲玉，40年代有白杨和秦怡，50年代有孙道临和上官云珠，80年代有陈冲和张瑜，可现在，上海滩连娱乐明星也没有了。老克勒是边缘化的上海遗老，在百乐门舞厅跳国标舞，他们总爱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还是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这份肆无忌惮蔓延着的怀旧氛围，催生了老克勒回忆中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昏黄的灯光，浓重的阴影，黑暗中闪烁的眼神，老式的座钟，飘逸的旗袍，也将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开来：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裤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一尘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英语，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烂的美国水手腔，并以此分出高低贵贱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讲究，他们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写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年代的爵士音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士、欧米茄表，跳那个年代的国标。这些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他们将此等同于高贵、上流。他们不能忍受时下流行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事物，甚至同样是国标，他们也严格区分不同种类。他们生活在光阴的深处，全然不顾世上的戏已经唱到哪一出了。

老克勒更像是租界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年轻时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

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对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一生的热诚。

老克勒群体更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孤岛，杵在大上海，他们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蛋糕店、国泰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新生代喜欢的是衡山路、新天地、茂名南路、香樟花园、田子坊、金茂大厦87层的九重天、肇家浜路的真汉咖啡剧场、陕西南路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新生代去星巴克和哈根达斯约会，去钱柜唱歌，老克勒又感慨这些新生代上海白领，比起他们那个时候，真是江河日下啊，这些已经读到硕士博士、留学哈佛耶鲁的白领品味大不如前了。

老克勒总是评点来评点去，说这样不好，那样才叫好，那样的人生多好啊，那样的年代多好啊；还是城隍庙弄堂里的阿姨更富有人生智慧，虽然每天只读一点《新民晚报》，可毕竟是识世相、明事理的，她们笑盈盈地对老克勒们说：“别总是觉得从前好，也别老觉得未来就会好。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好啊？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等到了龙华殡仪馆，一了百了了，也就万事都好了啊。”弄堂里的阿姨们一边用豆浆机打着新鲜的豆浆，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独角戏，或者哼着越剧小曲，大口嚼着快过期的苹果，一天比一天伶牙俐齿，又一天比一天手脚麻利。

弄堂里的阿姨道出的是真理啊，别总是赞美从前好，也别老是期盼未来就会好，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好啊？因此，要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不好是正常，好是意外，是中了大奖。你总是好，只能说明你碰到的意外多，说明你运气好。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哲学精神。康德、海德格尔们皓首穷经的烦琐命题，被上海里弄的市井三言两语解读完毕了。冬去春来，斗转星移，日月更替，年华老去。不神秘，不抽象，没有宏大叙事，讲现世，讲实惠，讲快乐，这就是上海，一个精明、世故而苍凉的上海，用万劫不复的人性丈量世间万物的上海，以历久弥坚的悲情穿透天下众生的上海，一个不必通过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在俗世红尘中就完成渡人渡己历程的自我陶醉、自我开脱、自我救赎的上海。

---

1. “老克勒”指旧上海最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群人。“克勒”通常被认为是英文“clerk”(职员）一词的音译。——编者注

大理国

二十年一觉京城遗梦，终于回家了。

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兆康童年记忆中的大理，一向就是这般意境。

后来，兆康在北京生活了22年，先读名牌大学，毕业后成了某报社著名记者，然后又调到某高校成为知名教授。42岁时，突然决定，携妻带子，回到他的云南老家大理。

兆康征得父母同意，让老人们从大理老街的旧居搬走，他为老两口在大理新城买了间带电梯的公寓。然后，兆康把老房子修葺一新，一家客栈就开张了。夫妻开店，翻开人生的新篇章。

大理已经不再是他小时候的大理。满城商气，鳞次栉比的店铺、小资情调的酒吧、没完没了的普洱茶店，大理面临着类似丽江的旅游业过度开发。除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为逃离大城市压力和内陆雾霾而来的新移民。发生在最近几年的移民潮，是大理历史上几次移民潮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来自国内外各地的作家、艺术家、摄影师、探险者、歌手、炒股投资者、环保主义者，还有许多能够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士，在周游世界之后，纷纷选择定居大理。

虽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回到老家的兆康却如鱼得水，在大理生活得非常惬意。兆康夫妇的客栈生意也很不错，六间客房，每天满房，小富即安，怡然自得。除了他熟悉的苍山洱海，他总能发现，这里有一群群有意思的人，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朋友。

终于回家了，20年一觉京城遗梦。现在，兆康独步下关街头，强风阵阵，但“风高而不寒，无沙亦无尘”，吹走20年帝都生活的疲乏，顿觉心旷神怡。走在上关，那是一片开阔的草场，鲜花铺地，姹紫嫣红。而茶马古道的野杜鹃，红粉白黄，漫山遍野。大理气候温暖湿润，最宜于花木生长，爱花养花是当地白族人的生活习俗。经夏不消的苍山雪，是苍山景观中的一绝，雪线以上堆银垒玉，一片素白。洱海月色更令人惊叹，万籁俱寂的夜晚，仰望夜空，玉镜高悬，俯视海面，万斛银辉，一轮明月在湖海之中随波漂荡。

兆康开的客栈是一座传统的白族民居，青瓦白墙，大理石栏。古色古香的

院落内，栽种着茶花、桂花，盛开着十几盆君子兰，花香四溢，恬静幽雅。天井里，石桌石凳，泥壶清茶。夕阳西下，他常和南来北往的住客坐在这里品茶聊天，忧烦尽忘。这就是大理古城独有的氛围，这就是他回来想要重找的生活，一切为了闲适，一切为了欢愉，一切为了避世。

大理城里也会有一些从京城搬来的新移民，原先都是京城知识界、艺术界人士，他们定期举办一些沙龙和文艺论坛，或评议时事，或抒发襟怀。兆康在京城时也算是知名学者，所以回到大理后，也会频繁接到这类活动的邀请，但是，凡是此类活动，他一律谢绝参加，从无例外。他说，回来了就是回来了，回来了就过回来的生活，如果再参加这些活动，与生活在北京有何不同？

我已经好几年未见到兆康了，有时微信闲聊几句，彼此问问近况。记得2007年时，兆康邀我到那家被喻为中国新闻专业最高水平的报社工作，我几乎已经答应下来。那次，我专程赴京与他商谈此事，在东棉花胡同中戏旁边的咖啡馆，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谈古论今，比较中外，思辨激荡，情怀远大。他一边品着红酒，一边低沉慢语："我喜欢北京，这里聚集着中国最强的文脉和气场。"第二天下午，他又约我在复兴门的地铁站口会面，一见面，我就对兆康改口说："真过意不去，我慎思良久，决定不来北京工作了，我只想偏安江南。"我回忆起那一刻，兆康听到我的话后并不过分意外，他面带着一成不变的绅士般的微笑点点头："偏安江南好啊。"

兆康的家乡，原是中国历史上大理国的所在地，也是大理国的都城旧址。大理国，是和中原的宋王朝几乎平行并存的一个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全国尊崇佛教，被称为"妙香古国"。在古老王朝的习俗里，这里讲究"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历代国君大多于暮年选择禅位为僧。根据史载，大理国九位君王禅位出家，避免了为争夺王位而父子相残、兄弟相戮的残酷局面，使多少生灵免于涂炭。这里，自古就有逍遥风气，自古就有清静禅意。

少年时代，我最初知道兆康的故乡大理，是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里那几个传奇的大理国段氏皇帝，他们的风流和忧愁，卓尔不群，遗世独立。还有20世纪50年代那部家喻户晓的国产电影《五朵金花》，唱响了大理三月蝴蝶泉边的优美情歌。

好奇于大理段王爷的故事，我发微信给兆康，求证一段史实。他没有立刻回复，直到很晚，他发送图文信息给我。他告诉我，回复晚了，是因为当时他没带手机，整个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在崇圣寺三塔之下的芳草地，采摘新鲜的蘑菇。他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雪月风花，别无所求。

澎湖远

萍水相逢的人们齐声唱着那首熟悉的歌曲，他们的声音很轻很轻，生怕把外婆和她的外孙吵醒。

那年去台湾澎湖，为的就是那首朗朗上口传颂多年的《外婆的澎湖湾》。

澎湖列岛的海边，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先是一个人，迎着海风，踩着沙滩，踏着海浪，独唱一首歌；然后，有路过的访客驻足倾听，被演唱者感染，加入进去，独唱变成了二重唱；接着，又有第三个人经过，也参与其中，变成三人小合唱。就这样，五个、十个、二十个，一个又一个岛上的居民或外来的访客不断加入，合唱的阵容越来越大，合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嘹亮。

这浪漫而具有艺术感的场面，成为澎湖小岛碧海蓝天之下的常态，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外婆的澎湖湾》。

岛上的许多情景，都与歌谣有关。对于笃行十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些乡土建筑里，处处留存着潘安邦和张雨生的童年足迹。那几排老房子，都用竹子、石灰、黄泥和玄武岩建造，充满时光的斑驳感。晌午时分，整条街巷都低低飘荡着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的歌声：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里是台湾最古老的眷村，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20世纪60年代，为了安排自大陆各地来台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潘安邦和张雨生就出生在这里。而如今的眷村物是人非，只留下带有日式风格的破落老宅，供人们凭吊早年人丁兴旺的热闹景象。

潘安邦从这里走出，带着《外婆的澎湖湾》和《爸爸的草鞋》一路唱到台北，唱成乡土时代最后的民谣，在52岁时因肾癌英年早逝。张雨生也从这里走出，凭借《大海》一曲走红，31岁因车祸溘然长逝。这就是两位澎湖歌手的悲伤宿命。

笃行十村，是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的灵感诞生地。潘安邦的外婆住在澎湖湾边上，潘安邦小时候每天都到外婆家跟外婆聊天，帮外婆干活，挽着外婆的手到海边看夕阳。外婆在菜市场卖菜，潘安邦下课以后就背着书包陪外婆卖菜。外婆对他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总随我卖菜啊！"后来潘安邦成为华人世界最优秀的歌手之一，再回澎湖的时候，依然会跑到菜市

场陪外婆卖菜。

潘安邦和外婆之间的亲情成就了经典的《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无论多么飞黄腾达、名利双收，却总是像思乡成疾的游子一般，挂念着数百里外离岛上一天天老去的外婆。后来外婆不在了，变成了小岛上忧伤的坟茔，但每次演唱这首歌，他都会想起外婆，想起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他曾把自己的亚洲巡演取名为“再献外婆的澎湖湾”，表达对外婆无尽的怀念。别人很难理解这种怀念的深度，只有歌手自己知道。时间越久远，怀念越深重。

我初次听到这首歌谣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念初中。那种质朴的乡情、纯美的人性，让海峡这边成长的我也感同身受。并且歌曲极富动感，让我联想到歌者漫步走在童年的沙滩，一步留下一个脚印的温馨画面，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对乡土家园的追忆。

《外婆的澎湖湾》，我自小挚爱的歌谣，而今变成我随手用手机拍下的风景。歌里的外婆早已作古，唱歌的游子也不幸逝世，留下空旷的海滩与废旧的庭院，令人惆怅不已。我还想起歌手唱过的另一首歌《爸爸的草鞋》，也是一首经典民谣。潘安邦的父亲在17岁时离开温州到了台湾，所以《爸爸的草鞋》唱的应该就是他父亲早年离开温州时的心情。这首歌将历史的哀愁处理得很淡很淡，也隐藏得很深很深，在不谙世事的年纪是听不明白的。我也是在很多年以后亲身踏上这块岛屿时，才终于听懂了，歌里唱的是不堪回首的过往以及不堪重负的乡愁。所以，潘安邦吟唱的，其实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中华。

我离开澎湖的前一天，乘船到吉贝沙尾，一道数千米的金色海岸线，让眼前突然一亮。澎湖的海水正蓝，不是热带岛屿海边那种过分的梦幻蓝，而是真挚纯粹的澎湖蓝。在这里，我居然遇到一位二胡乐手，并且第一次听到有人用二胡演奏《外婆的澎湖湾》。拉二胡的这位音乐人，名叫汉良。

汉良在台湾小城花莲长大，从小就喜欢跟着舅舅学拉二胡。《听松》《空山鸟语》《二泉映月》《病中吟》，他全都会演奏。二胡拉得好，也没耽误功课，他19岁到台北读了宝岛最好的台湾大学，然后到大陆的音乐学院继续深造，读民族乐器的硕士。他尝试着用降B调奏响《外婆的澎湖湾》，用二胡重现歌曲里快乐的时光。在两岸都学过音乐，他发现两岸的民众都会唱这首关于澎湖的歌，足见它跨越时代与地区的魅力。

汉良告诉我，他经常搭船或飞机来到澎湖，在马公岛[注]的民宿里逗留，一住就是好些日子。这里宁静得只有潮汐的声响，让他尽情谛听生命的单纯。他爱这里，因为这里是潘安邦的故乡，回旋着乡土时代古典中华最后

的歌谣。汉良还说，澎湖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他的心灵与血管。他的澎湖，是举在手里不忍吃掉的玫红色的仙人掌冰，是包着游艇哼着歌一路奔向岛屿的特立独行，是穿过300年通梁古榕的阳光洒下来的婆娑树影。

当地的文化观光部门为了吸引游客，还真的复建了歌词里唱到的一堵“矮墙”。在潘安邦外婆家的后院看海，坐在矮墙上远望，太阳在海面洒下幸福的金色光芒，也照射着被海浪雕琢得千姿百态的珊瑚石。远处又有一支临时组建的合唱团，从独自一人到三五成群，队伍越来越壮大。萍水相逢的人们齐声唱着那首熟悉的歌曲，他们的声音很轻很轻，生怕把外婆和她的外孙吵醒。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回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那个下午，在澎湖，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坐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

1. 马公岛：澎湖岛的别称。——编者注

扬州望

> 挑灯坐，坐久忆年时。薄雾笼花娇欲泣，夜深微月下杨枝。催道太眠迟。
>
> 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

这几天，在家里老屋的书架上，翻到一本齐鲁书社版的旧书《南谷类稿》，作者是故去多年的蒋逸雪。

现在用百度和谷歌搜索“蒋逸雪”这个名字，所能获得的信息寥寥可数：撰有《陆忠烈公年谱》《张溥年谱》《刘鹗年谱》《老残游记考证》等有限几篇论文，终其一生只著了一本薄薄的《南谷类稿》，跟当今著作等身的新派学人实在不能相比。

蒋逸雪，是原扬州师范学院的一位古代文学老教授。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父亲还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我还很小，父亲经常带我拜访的熟人中，就有蒋逸雪老人。

记得是在扬州师院东北角邻近瘦西湖的几排院落中，那一带全都是单门独院的住所，周围林荫幽深，花香满径。蒋宅正门口有棵高大的刺槐，树下是半掩的柴扉，屋后栽竹，厅前植桂。夏日，院落前的篱笆墙上爬满了淡雅的牵牛花和南瓜藤，黄蜂飞舞，玉蝶萦绕，一派芳郁的田园景致。地上挖了一个不大的水池，池里漂着睡莲，白白净净地吐着几枚花蕾。

在我开始具有清晰记忆的年纪，蒋逸雪已从扬州师院离休，他是父亲的同事，更是忘年至交。离休后的蒋逸雪一直没有停止过做学问，笔耕不辍。每回我父亲去看他，蒋老先生都要告知他自己新近读书的心得发现。蒋逸雪很老派，穿戴一丝不苟，冬天呢大衣，春秋天中山装，夏天衬衣领扣完全扣上。每次进入他家客堂，透过隔扇窗，见到的都是身形清癯的他端坐在里屋的书桌前伏案读写。我9岁那年，有一回他留我们吃午饭。他微笑着从柜子里端出一盘五颜六色的八宝饭，趁八宝饭还没蒸好，他先向我们展示刚写完的一幅书法，还教我辨认和朗读。我记得那是陆游的诗句，最后几句是“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而那时候，我满心都在焦急地盼望锅里那盘香甜滑黏的八宝饭早点蒸好，早点入口。

蒋逸雪的夫人，我一直称她为蒋奶奶，印象里也是慈眉善目的老人。她自酿槐花蜜，自制杨梅酒，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趣的人。当年，每到暑假快结束、新学年快开始时，蒋奶奶总要送我一只新书包或者新文具盒。那些崭新的文具总是刷新着童年的光阴，带来一段经久的惊喜与快乐。后来我知道，她是蒋逸雪的续弦，曾是蒋老的学生，蒋的前妻较早病故，她一直默默守候为哀悼亡妻独身十载的蒋逸雪，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她顶着当时极大的舆论压力和蒋逸雪结合。

当年的扬州师范学院（现已归并为扬州大学）是华东地区文史研究的学术重地，“文革”之后大学恢复职称制度，蒋逸雪最终只补评到副教授。他唯一的一本专著《南谷类稿》是扬州师院的李坦先生为他出版的。初中时，我和李坦的儿子是同班同学，我们常常在一起复习功课，曾经目睹了那本《南谷类稿》的出版过程，成书出书的艰辛曲折寄寓着李坦对逸雪恩师的情义。

1984年，蒋逸雪临终的日子里，我父亲带我最后一次走进那座院落。那是中秋前后，睡莲即将枯去，桂香里飘逸出来的是灵魂出窍般苦涩的气味。我永远记得，那个午后，天光昏暗，躺在床榻上的蒋逸雪噙着泪水，忍着病痛，紧握我父亲的手，长叹一声：“生老病死，苦啊……”

睡莲如逸雪微光，映照着他凄清的人生。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QQ上遇到了一位老友H，她也曾在扬州师院那几排院落中住过。我问H：“你帮我回忆一个人，好吗？你们家过去住的地方，在七八十年代，曾经住过一位叫蒋逸雪的老教师，还有印象吗？”H随即回答说：“记得啊，一个老学究，和中文系的任中敏一辈的，对古文造诣精深的那一代人。我记得他很注意生活细节，我小时候，他提醒我栏杆不能倚。”

这些天我一直感冒发烧，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读了蒋逸雪的《南谷类稿》，想起从前，想起人间事天上事，想起那些年生长在蒋逸雪院里的睡莲。生命如睡莲开合，曾经绮丽，又终了无踪影。蒋老赠送给我父亲的那幅字，岁月久远墨迹悠淡：

> 挑灯坐，坐久忆年时。薄雾笼花娇欲泣，夜深微月下杨枝。催道太眠迟。
>
> 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



chapter 3
在追逐和流放之间

自由呼吸

从巴黎到深圳

> 我们始终在自身的存在感缺失与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挣扎，而只有不失去记忆，才有可能对个体生命的心灵秩序进行修复，自由和爱的伦理才有可能获得统一和重构。

两年多音信全无，直到这个岁末，因为要去巴黎做学术访问，才设法和林普联系上。约定会合的地方就在最古老的双桥。从圣母院广场出发，跨过塞纳河上的双桥就到了左岸，文气激荡的拉丁区便由此开始。从双桥方向观赏令人肃然起敬的巴黎，四周高耸的塔楼和灰褐色的尖屋顶，构成壮美如瀑的视野，在眼前层叠无尽。迎面走来久违的林普，笑容和当年一样桀骜不驯，和他身后背景中的塞纳河交融成一幅年轻而不羁的图景。

记忆闪回到中国的一座小城——我们的家乡。在江淮新村的那个大院里，我们把童年形形色色的游戏全都做尽了。我俩每人滚一个铁圈，在那些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像野马一样狂奔。有一回，我们两家人在一块儿包饺子，我们恶作剧地将一个大盐块包在饺子里。那只倒霉的饺子恰好被林普的爷爷吃进口，剧烈的咸涩让老人十分难受，咳嗽不已。我们各自的父亲对我们进行了记忆中史无前例的严惩。我们被罚跪三个小时，先是呜呜咽咽地哭了很久，当我们都哭累了的时候，林普突然很郑重地对我说："本来只想开个玩笑，可没想到伤害的是爷爷。爷爷是受过很多苦的人，现在又被他的孙子捉弄了一回。"林普那年12岁，我记得他一手拭着未干的泪迹，一手揉着跪得肿痛的膝盖，口中却表述着深重的忏悔。

我和林普从小学同窗到高中。在那些年里，他对音乐的热爱伴随着年纪一同增长。他在家中的阳台上拉小提琴，在学校的音乐教室里练习钢琴。高二的时候，林普写出了他的第一首乐曲，他用四个乐章讲述了他爷爷和父亲在"文革"中的命运。那乐曲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对大师作品的简单模仿，但他旺盛的创造力和充沛的才情还是势不可当地生长出来。

林普万万没有料到，那曲被他用小提琴演奏了无数遍的《梁祝》乐曲并不仅仅演绎着那段古代传奇的悲怆，也预示着他自己爱情的命运。在省城师范大学读书的第一年里，他陷入了和同系女孩小芸的热恋。那场恋爱跨越了20世纪90年代的滔天洪水，跨越了江南青灰色的藤蔓和高大的香樟树。那些日子里，林普在给我的信里断言，爱的伦理和自由伦理在他的生命里

并存，为此，他成了幸福的人。琴瑟和谐的协奏曲回响在校园一年之后，林普得知小芸的父亲正是当年在“文革”中迫害他爷爷和父亲的人。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对他爷爷的刑讯逼供中使他的病体衰微，并导致他父亲两次踏上劳改苦役的旅程。深爱着林普的小芸痛不欲生地问：“这是上一代人的事，我们可以不管这些吗？”林普怆然：“我们可以原谅一切，可是我们能抹掉记忆吗？”小芸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林普惨淡一笑：“抽象的历史本身不会作恶，是千千万万的个体在作恶。”林普和小芸说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坐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他写下了两封信，一封留给小芸，另一封是交给学校的退学申请。

林普中止了学业，从此成了深圳的一名打工者，他在深圳的宾馆和酒店里为客人演奏钢琴或小提琴谋生。许多年以前，我去深圳看望他，踏着大梅沙金色的海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改写生活，你不觉得孤注一掷吗？”迎着南中国海的季风，林普眼中饱含凄凉：“因为我无法面对，音乐、校园、爱情，还有记忆、历史的血腥。”从大梅沙回市区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电影酒吧里观看了一部法国电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之蓝》。陈旧的放映厅、阔大的银幕墙、浓香的咖啡，我们沉浸在不经意的聊天中。女主人公朱莉在车祸中失去了丈夫和女儿，侥幸活下来的她自杀被救，可又意外发现丈夫生前有个情人。他音乐作品的灵感正是来自那个情人，而这个女人已经怀有丈夫的孩子。在法兰西国旗上蓝色代表着“自由”，朱莉离群索居，想尽一切办法抹杀记忆，为的是获得心灵的自由，但她没有成功。直到最后她去见那个女人，把丈夫所有的遗产都交给未出世的孩子，并且完成丈夫生前未完成的乐章时，她才重新找回了自由。林普竟然迷上了这部电影，第二天又拉着我连看两遍。他说他太能理解这部电影了，他也选择了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他也苦苦地思索着自由与爱的命题。

三年后，我和林普在北京重逢。他仍然靠演奏为生，每月能挣很多钱。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悄然掩盖了景山的银杏枯叶和什刹海的冰湖，我们在平安大街上的小酒馆里吃饭，林普告诉我，是那部大师的影片让他决定返回一座有记忆的城市。个体生命永远在自身的存在感缺失与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挣扎，人只有不失去记忆，才有可能对个体生命的心灵秩序进行修复，自由和爱的伦理才有可能获得统一和重构。那天，林普喝了很多二锅头，叙起了我们从小开始的情谊，他引用杜甫的诗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一边熟稔地吐着烟圈，一边感叹，唐诗里的送别和重逢写尽了人生最质朴最动人的哀情，今天我们为还能拥有着这份桃花潭水般的情谊而欣慰。

林普去法国的前夕已是1999年春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将要去巴黎念书，完成他未竟的学业。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对他的影响始料未

及。20多年前，那位电影艺术家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他的祖国波兰流亡到法国，他在对人性伦理和脆弱生命的痛苦反思中完成了对法兰西国旗上三种颜色的影像诠释，《蓝白红三部曲》使他最终成为后现代主义时代凤毛麟角的电影大师。那部电影把林普带到了那个弥漫着激进主义和浪漫气息的国度。虽然他现在还只是塞纳河边靠卖艺挣生活费的留学生，但那些未完成的乐章演化出的芬芳旋律总有一天会在蒙马特尔高地和香榭丽舍大街上飘荡。那旋律，来自中国，来自童年，来自生命和历史的记忆。

整个巴黎之行，林普一路陪着我寻古觅踪，探访那些深邃又雅致的小街。他安排我住在拉丁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旅馆，离著名的索邦大学很近。法国的许多大学都坐落在这一片天地，这里也是知识分子聚集、各种沙龙活动密集的地方。沿着弧形的小路闲逛，两边尽是书店和咖啡店，夹杂着一些文艺复兴前后建造的古老教堂。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烤面包、烤肉的香味。

我离开巴黎前夜，林普请我享用在法国期间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带我去喝咖啡。那是一家有50年历史的咖啡馆，据说不仅地址和招牌没变，连服务员都没变。果然，吧台里还真坐着一位银发老太太，正专心致志地磨咖啡。咖啡馆里堆满了各种古董书籍，坐在这里有一种被图书包围的幸福感。巴黎人一年四季都戴围巾，林普已经染上了这种习惯，即使在室内，也戴着一条淡蓝色的丝绸围巾。他告诉我，他打算永远在法国留下，他爱巴黎的矜贵，巴黎是一个你再老都可以在此热恋也可以在此叛逆的自由都市。然后，他和我叙旧，恍若隔世地说中国的往事，说家乡的北护城河边那几棵桑树，说小时候采摘桑叶养蚕的事。

此时，正是异国的圣诞之夜，窗外，华灯和树影笼罩。我将把他的乡愁带到他遥远的家乡，我们童年滚铁圈的青石板小路上，并道一声：兄弟珍重。

如果没有离去，就谈不上归来

从弗莱堡到广州

走过千山万水，越过重洋跨过山，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到东方佛学如同移栽的树木，在枝枝蔓蔓的铺展中，延伸出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迷恋与背叛。

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离去，就谈不上归来。

一

2003年冬天，我来到德国弗莱堡。会议的间隙，和在这儿读博士的老同学孙诚巍相约见面，见面的地方就在马丁城门塔楼旁的小酒吧。

在弗莱堡这座城市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会聚到古老的学府求知求学。弗莱堡至今使用有轨电车，慢慢悠悠，不慌不忙，乘坐老旧的交通工具，从一地到另一地，不知不觉就巡游了整个弗莱堡古城。上午的阳光是那么暖和，照在大街上，房屋整齐得像积木搭起来的，五颜六色，极具几何对称的平衡感。建筑上的线条也和街区一样，井然有序，甚至强烈得有些坚硬。

弗莱堡全城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路面，平平整整，一丝不苟。路边水渠里的水，是黑森林流出来的洁净的泉水。在有泉水流经的小酒吧，我和孙诚巍见面了。诚巍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研究欧洲古典哲学，半年前辞去教职，来德国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

和从前一样，诚巍侃侃而谈，阐述他的研究体会，梳理西方知识信仰所经历的从坚信到怀疑，再到分析解释的过程。又从理性主义说到非理性主义，再到胡塞尔，这中间夹着个伟大的康德。他滔滔不绝，相当亢奋，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思辨和逻辑严密无漏，满口都是抽象的概念，比如本体、主体、本质、存在、现实……说着说着，不时饮一大口慕尼黑啤酒，或者呷一点加冰的威士忌。屋外一片寒冷，天空间或飘起雪花，小酒吧里温暖如春，暖气片和壁炉同时供暖，热得我们都只穿衬衣。

聊到下午两点，我们乘出租车去黑森林。从莱茵河平原望过去，漫山遍野树木密布。德国人对森林情有独钟，人们之所以称这里为“黑森林”，是因

为山上林区内的森林密布，远远望去显得黑压压的一片。冬天的黑森林，树林里显得更为幽暗。走进林中，地面铺满了厚厚的腐木，踩上去软软的颇有弹性，四处弥散着松树特有的清香味。

德国的冬天，天黑得很早，下午四点半天开始变黑，这时我和诚巍都感觉到了饥饿。他要带我到附近一处以生产钟表著称的小镇，去吃黑森林蛋糕。据说蛋糕融合了樱桃的酸、奶油的甜、果酒的醇香。我们边行走边找他说的蛋糕屋，走了好久，也还在树林和幽谷里穿行。山涧里，冷杉密布，奔流的瀑布之水清澈透明，带着山林间的寒气，一路流向欧洲大地。

路远天黑，渐渐走出了树林，依稀看见小镇上的点点灯光。我们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旋律——中文歌曲《山茶花》，是邓丽君唱的一首情歌。然后，循着歌声，我们找到了一家中式小餐馆。由此，绝对可以相信，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邓丽君的歌声。饥肠辘辘的我们，坐下点了好几个菜，大吃一顿。我打量了一下餐馆内部的环境，这家中餐馆不大，是广东的华人移民开的。四周墙上挂了几幅中国山水画，柜台上方悬着两只造型别致的红灯笼。灰色录音机里，反复播放着邓丽君的名曲。诚巍听得很投入，这次他终于不谈那些枯燥的哲学话题了，他评价邓丽君深情的歌声：她为流散四海的炎黄后代营造了共同的故乡回忆，她为现代化与后殖民双重挤压语境里的中华民族留存了最后的歌谣；她给人们带来了爱情、人性和诗意；她的歌唱，实践了中国儒家文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

孙诚巍是一位有趣的人，也是一位自相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崇尚紧张的理性的哲学，一方面又心仪放松的感性的美学。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是同窗。美学课没有人去听，课堂上就只坐着我和诚巍两位忠实的学生，把任课老师感动得老泪纵横，期末成绩给了我们俩100分。孙诚巍是河南洛阳人，他说普通话的时候发音好听，带着河南话的中正音韵。他父亲是洛阳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好几年的时间，孙诚巍的父亲被河南省政府借调到登封嵩山，参与中岳庙的修复工作。诚巍在登封的初中借读，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宿舍，父亲教他练书法，用小楷抄老子的《道德经》。嵩山起伏，烟霞壮观，绵延成优美阔大的画卷，这中岳的神采、中原的气象，熏陶着少年诚巍干净的心灵，让他厚重，让他敏锐，让他长情。洛阳或者登封，对他没有什么差别，他只知道，黄河千百里，故乡在中原。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这个相貌堂堂、豪放粗犷的中原汉子却酷爱绵软的粤语歌曲。在江南安静的大学校园里，21岁的孙诚巍经常戴着耳机，专心致志地聆听粤语歌曲。他曾告诉我他的听歌心得，他认为，知识界应该重新评价岭南粤语流行文化。粤语接近古音，粤语歌多用古乐伴奏，二胡、琴筝、箫笛、笙埙、琵琶、钟鼓无所不用。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粤剧小曲，

从最初酒肆歌楼的卖唱，到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发展成熟的粤语流行歌曲，风卷华语世界，进入全盛时期，以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明的地域性延续中华文脉，对抗英国殖民文化。

二

德国黑森林那晚，从回荡着邓丽君歌声的那家小餐馆出来，我们索性就住在了小镇上的一家木屋旅馆里。夜晚气温更低，冷得头皮疼痛，我和诚巍走出小旅馆，踏着干硬的积雪，四处转悠。遇到一群德国青年，升起一团篝火，围着燃烧的火焰喝巴伐利亚黑啤。大家拍起手，唱着德语歌，掌声歌声都在清冽的空气中回荡。树上的猫头鹰一定已经沉睡，不会被惊醒。

那一夜，我们却几乎没睡。我们坐在旅馆的露台上，拉紧羽绒服，用帽子裹着头，喝着啤酒。这小镇深处，置身于阿尔卑斯山山峰和湖泊的包围之中，如入冰雪覆盖的瑰丽童话。暮色中的大地格外肃穆，发着白光的枝梢显得冷艳，隐隐约约可以见到小教堂的穹顶和塔尖。此等安详的夜，才算不辜负冬天的休眠时光。

10年过去了，已经是2013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孙诚巍打来的。他先向我问候中秋，然后告诉我，他已经正式回中国工作了，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一个月之后，深秋时节，我们在上海重逢。距上一次在弗莱堡的那次会面，已经整整过去10年。我们约好在复旦大学旁边的鹿鸣书店会合。上海的深秋，飘着迟桂花的馥郁和甜蜜。五角场夜色阑珊，月光如水，让这个归乡的游子感到无比舒适。

10年之间，除了在弗莱堡完成学业，他还做了博士后课题，然后在柏林任教两年。孙诚巍在这个清凉的夏天选择离开柏林，走得匆匆，忘了把公寓的钥匙还给房东，只好用联邦快递寄回柏林。我和他这一回聚首，整个晚上也听不到他再谈欧洲古典哲学了。心心念念，满腔热情，全是东方的佛教、古文、宋明理学、和田玉、昆曲和粤语歌曲。此时的孙诚巍，已经失去了对欧洲哲学的兴趣。他在广州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方向，居然变成了东方哲学和美学。

老同学经历的转变，对西方的兴趣转向了对东方的亲近，走了千山万水，越过重洋跨过山，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现在又走回来。

诚巍在研究东方佛学。说真的，这原本只是他研读欧洲哲学时比较研究的需要，但是，把佛教经典和佛学论著读到一定深度之后，有一天就会豁然开朗、豁然贯通。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觉得，后世对世界的种种

哲思和诠释，在东方佛陀时代及各种佛教经典里早就有了。比如，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那里皓首穷经地追索对“现象”与“本体”的认识，包括“世界的有限无限”、“灵魂自由”等命题，而这些在一两千年以前东方佛学的经典中，早就被说得透彻至极了。在“本体”与“现象”这一对概念中，东晋后秦高僧鸠摩罗什指出“现象”不等于“本体”，东晋佛教学者竺道生接着说“本体”就是“诸法实相”，更发展成为“佛性大我”。也就是说，在鸠摩罗什揭示了“现象”并不等于“本体”之后，竺道生接着进一步说明了“本体”究竟是什么。

这一年，2014年的初春，将近40岁的钻石王老五孙诚巍，带着他在德国认识的广州女友陶陶，回到他的河南老家洛阳成婚。陶陶也是一名“海归”，在德国时学习音乐，如今在广州从事粤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

诚巍陪着陶陶参观龙门石窟，整整看了一天。他一个石窟一个石窟地讲解，如数家珍，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熟悉的，因为诚巍的父亲是河南的文物专家。伊河蜿蜒地流淌，涓涓作响，淙淙起浪。河水笼罩在春天的雾霭中，时隐时现。对岸的香山上，是白居易的墓园，好一片暧暧林荫、葱郁遮天的景象。从香山再远眺彼岸的龙门，石窟寺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赫然在目。诚巍站在陶陶身边，手指前方。那巨大的佛像面相丰满圆润，眉若新月，双目宁静含蓄，嘴角内陷，略作微笑。

德国那10年，弗莱堡和柏林，像一场梦，亦真亦幻。一生何求呢？时代的洪流和外来的知识一旦干扰心性，就会人生轨迹全变，生活板块重组。如同移栽的树木，忘记了原先的泥土，也忘记了祖先的模样。枝枝蔓蔓地复杂开去，伸展出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迷恋与背叛。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离去，就谈不上归来，而离去后的归来，往往是曾经沧海、化繁为简的觉悟，抑或境随心转、层楼更上的超然。毕竟，弗莱堡的那段岁月是享受的，是放眼看世界的，更是不可省略的青春。

萤火虫去哪儿了

从加州到江南

一个梦幻到不可思议的念头：逐萤火虫而居。

一

兰州大学是个出人物的地方。从这所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以聪明洒脱、个性跳跃、奇思怪想和特立独行著称。我的朋友林川、谷艳夫妇就是这样的奇特人物。

20世纪80年代末，林川和谷艳从江苏的同一所重点中学考进兰州大学。那是一个可以任性的年代，可以不考虑未来就业的实际需要，只凭个人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和填报志愿。林川喜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读了哲学专业，谷艳迷恋俄罗斯文学，就读了俄语专业。那个年代，每到开学和放假，江苏到甘肃兰州的绿皮慢火车要走两天两夜，很帅的“哲学男”一路照顾很美的“俄语女”，两个学生日久生情、彼此相恋。

90年代初，大学一毕业，林川和谷艳就结婚生子。孩子取名“土豆”，寓意是，在西北兰州的读书岁月，在那片贫瘠而艰苦的土地上，不容易吃到可口的伙食，尤其是蔬菜紧缺，他们经常煮一锅土豆充饥，日复一日，度过了大学四年。最浪漫的事就是，白天经常逃课约会，晚上到学校附近的树林里去寻找萤火虫。一只只闪耀着点点亮光的萤火虫，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掠过头顶，划过夜幕。

大学毕业后，夫妇俩都没有正式工作几天。林川先在江苏某地的政府机关工作，因忍受不了衙门习气，不到一年就辞了职。谷艳因为学的是俄语专业，先被分配到一家有前苏联背景的企业工作，但没过两年，那家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她也主动离职。

早在90年代中期，夫妇俩就都过起了闲云野鹤的体制外生活。林川每天到证券市场炒股票，谷艳给父母的私营小公司做财务会计。在江苏这座小城，他们一边照顾着年幼的土豆，一边享受着安闲的生活。林川在股票操盘方面悟性极高，上手很快，不久就成为证券市场大户室的牛人。他还利用自己哲学专业的特长，钻研《周易》和算命，通过阴阳辩证和排卦占卜来预测股市、运作股票，据说常常赢得满满的业绩。

偶尔，不满于庸常俗务的林川也会吐一点儿“文青”的酸水，感慨“骚年”已逝，“80年代好啊，有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像飞一样”。

土豆很小的时候，只要外出走在马路上，林川总是将他高高举过头顶。林川想把土豆举得比汽车还高，这样小孩就不会直接呼吸到汽车排出的尾气。林川对长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和水土质量越来越担忧，大约就在那时候，他想到移民新西兰，到一片纯净无污染的大陆上生活。他的理想，是让土豆将来在新西兰水草丰美的牧场上放羊，夜晚有明灭可见的萤火虫，成群成群地聚集。

林川坚持要去新西兰，其中特别梦幻的一个原因是新西兰保存着全世界最良好的萤火虫生态。萤火虫对生活环境非常敏感，萤火虫的分布情况也是当地自然环境是否优良的风向标。中国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杀虫剂，严重破坏了水土空气等自然生态，不再适合萤火虫生存，所以在中国已经很难看到萤火虫夜间飞舞的壮观景象了。

二

2002年秋天，林川、谷艳夫妇开始递交新西兰技术移民的申请，但一年后新西兰移民政策突然收紧，他们的申请被拒。第二年，他们又改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两国的申请也都先后失败。

土豆一天天长大，他面临的不仅仅是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一样，他首先面对的是挑战巨大的教育问题。土豆的聪明才智尽人皆知，但他就是不愿适应中国的应试教育。他因为迷恋打游戏，对电脑编程充满兴趣，也极具天赋。小区邻居们遇到电脑软件方面的故障，大人对付不了的，还是初中生的土豆全能摸索解决。他着迷于《黑客帝国》《侏罗纪公园》和《星球大战》这类科幻电影，他从星际天文、古生物时代和海底探奇这些幻想世界中思考神秘的时空黑洞。但是，土豆在学校的成绩确实很差，从小学时的全班倒数，发展成为初中时的全年级倒数。对于林川、谷艳夫妇来说，那是他们最没有面子、最苦闷的几年，因为学校老师几乎每天打电话，数落土豆的作业之差、考分之低、排名之后，并且断言这个孩子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在学校老师的责怪、抱怨和白眼之下生活，土豆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和信心。而对于学校压力和世俗评价，林川、谷艳夫妇起先是无可奈何，然后越来越接近崩溃。

那些年里，林川、谷艳夫妇给土豆转了三次学。从公办到民办再到国际学校，孩子的成绩还是不见转机。曾经有一回“月考”，在遭遇班主任老师的一次严厉训斥之后，满腔委屈的林川、谷艳以孩子生病为借口，索性让孩子逃学一周，把土豆带到海南三亚，放飞心情。阳光如烈焰照射，他们飙

着快车，在海风椰林里自由飞驰。

2009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林川约我到一家茶楼谈事。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打算让土豆辍学，不想再读下去，但如果这样，小孩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移居海外。他们打算全家移民到欧洲小国马耳他。林川确定，只需要在那个地中海小国买一处房产，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然后可以享受当地公民福利，孩子上学全部免费。林川这些年在股票和期货市场做得很好，经济能力很强，异国买房不是问题。

可是不到一个月，林川又把移民的目标转向地中海东部的另一个小国家塞浦路斯。我和他们夫妇一道吃饭，席间，林川从双肩背包里拿出一份英文资料请我看：在当地购买一定数额的基金产品，就可以获得塞浦路斯的欧盟护照。我向林川夫妇表示了反对意见——塞浦路斯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和土耳其语，又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背景，我认为那个国家完全不适合中国人生活。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放弃了这个过于大胆又十分古怪的念头。

又有亲友建议他们，要不要通过特殊担保渠道尝试一下移居日本？既然他们必须“逐萤火虫而居”，东亚岛国日本的萤火虫也分布广泛、资源密集。林川不愿意，他认为像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单一民族”地区不适合移居，最好还是迁居到一个种族混居的“大熔炉”、“大水池”里，那样的移民国家文化多元、社会包容。

三

后来，林川一直找寻各种移民路径。2012年，南方某知名报纸上一个关于美国EB5移民(注)的广告吸引了林川。投入50万美金，参与美国一个商业开发项目的众人集资，首先可以获得美国过渡绿卡，如果两年后投资成功，就能获得美国正式绿卡；但如果投资失败，则血本无归。林川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涉足中国股市，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风云变幻，流着兰州大学狂野的血，剑走偏锋的他已经被培育出了愿赌服输的强大“风投”心理。不管是投机，还是赌博，为了儿子，他甘冒风险，他豁出去了。

林川一家这次的运气出奇地好。不到三个月，手续办妥，他们顺利拿到了美国过渡绿卡。全家果断迁徙，奔向他们想象中的萤火虫纷飞的北美大陆。虽然他们在美国举目无亲，虽然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要居住到美国的哪个州，下飞机之后干什么，但总之，他们整理了十几个皮箱和行囊，带着电饭锅、烧水壶和小蒸笼，踏上了悲壮的离乡之路。

在旧金山下了飞机，他们租了辆汽车，漫无目的，一边驾车一边游玩。第

三天，开到一座大学城，看见那里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城市充满活力，到处书香宜人，于是他们就喜欢上那座城镇，决定在那里定居。然后他们通过华人中介租房子，给孩子找到一所公立高中就读，一家三口中，林川基本不会英语，谷艳的口语不算很好，但勉强能与人交流。英语能力最强的偏偏是土豆。土豆在中国时，英语考试成绩并不好，但大量观看美国原版电影的经历，让他能说一口发音很正的美式英语。所以在美国生活，林川和谷艳反而更加依赖土豆。

林川发手机短信告诉我们，第一次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他竟然泪流满面。他想起小时候地理课上，地理老师给他们讲美国的高速公路如何繁荣发达，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身处其中，置身于美国的高速车流之中。他热泪流淌，模糊了视线，这一刻，他愿认他乡是故乡。

也会“犯贱”思乡，想听家乡方言。我们这些在中国的朋友，就到菜市场上把大嫂大妈的叫卖喧嚷录音下来，通过微信语音发给他听。45岁生日那天，林川在Face- book（脸书）上写道：“忙完这一切，转眼间鬓已成霜。”

2015年夏天，我来美国加州，办完事后，顺道去看林川和谷艳。他们一切顺利，已经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美国正式绿卡。夫妇俩安排我住在他们新买的房子里。这里果然符合他们对环境的挑剔要求，有整齐的林间小径、鸦雀无声的绿地、芳香四溢的花园、漂亮的住宅，更重要的是，夜晚到处都有萤火虫飞来飞去，如美丽的精灵，和天上的星星一道眨眼。院子很大，但没有什么园艺，只是种了一些中国人爱吃的蔬菜，比如菊花脑、香菜、茼蒿、苋菜、蚕豆等。不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这个菜园子里，蔬菜种植出来的味道已经不是在中国时的原生味道了。

土豆已经长成大孩子，一表人才，自信开朗。此时的土豆，有了英文名Potato（土豆），已经今非昔比，成为全美公立中学机器人创意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也刚刚被加州大学某分校海洋生物专业录取为大一新生。

平时，他们的生活是简单的。土豆负责上学，谷艳负责家务，林川负责挣钱。林川每天在家里办公，他的书房里同时打开着好几台电脑，用于运作股票，他白天炒美国股，晚上炒中国股。他成为名副其实的私募基金经理，向小规模投资者出售股票。他还结合《易经》和算命的技法来判断股市走势，似乎做得顺风顺水。

加州的夏天一片凉爽，天宇澄净，阳光明透。我指着远方清晰的山峦，对林川和谷艳说：“你们有没有开车穿越过落基山脉？”

谷艳接过我的话说：“我们不喜欢美国的山，这里的山势过于张扬放肆。

我们更喜欢中国浙江和安徽的山，那种水墨青山，很柔和，很滋润，也很写意。”

然后林川插话：“是的。这里的山上没有中国南方的茶园，也没有绿茵茵的竹子，我们很怀念那些中国的风物。要是把茶园和竹林移到这里的山上，该有多好。只是不可能啊，北美大陆的气候环境不对。”是呀，当初他们想方设法移民过来时，并没有考虑到，水汽氤氲的茶园和雾气迷蒙的竹海是东亚大陆特有的景观。

我们不禁哑然失笑，不知说什么好，然后谷艳感叹：“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很蛮荒，地貌又原始又极端，仿佛是在外星球。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其实都不是最适合人居的，还是亚欧大陆占据着最好的风水，并且文明成熟。”

“那你们怎么办？再折腾搬回去吗？”我有点错愕。

“等孩子读完书，我们有这个打算，搬回去。”林川不像是在开玩笑。

“可是，又回到了原先的问题，中国没有你们想要的大片萤火虫的生态环境啊！”我抱着疑问，看着他们。

夜幕降临，突然有一只萤火虫翩跹飞来，停在我们面前，悬在半空，熄灭一下，又明亮起来，很顽皮的样子。

---

1. 美国EB5（Employment Based Fifth Preference)移民是美国移民法中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移民签证类别，申请人在美国投资一定数量的金额、雇请雇员，即可获得申请资格，是申请审核时间最短、资格限制最少的绿卡通道。——编者注

那些被点亮的年代

从韦斯特波特到盐城

告别韦斯特波特的时候，她用中国人的习惯，捧起那里的一把土，向大西洋作揖。

她告诉当地朋友，作揖是汉民族传统的一种礼节，拱手为礼，表达的是最郑重的敬意。

她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小镇。

一

一个女子拥有美貌，到底会帮了她，还是坑了她，汤霞最有发言权。20世纪80年代后期，汤霞在高中时代就天生丽质、惊艳四方，成为那所重点中学男生们普遍单恋的对象。男生们为了讨好她，纷纷买来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琼瑶言情小说送她。翻看太多的琼瑶小说让汤霞学习分心，优异的成绩急转直下，原本有可能读北大、清华的汤霞，后来只考上一所省属师范院校。

这是汤霞一生永远的疼痛。后来，同学们拿她打趣说："你看，谁让你那么漂亮，男生全送你琼瑶小说，葬送了你的北大清华梦。"汤霞就自我调侃说："是啊，是啊，自古红颜多薄命。"

1988年，汤霞考进大学，在她家乡的那所师范院校读英语专业，追求她的男生依然排成长队。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把收发室老头转给她的一堆情书，看也不看地扔进垃圾箱，有时候气呼呼地嘀咕几句："烦不烦啊？已经影响人家高考了，现在还要影响我读大学。本姑娘还要接着考研呢，要当驻联合国大使呢，谁再干扰我的前途，谁不得好死。"

学校有位师兄，是那个年代罕见的"高富帅"，对她穷追不舍，肝肠寸断，有一天瓢泼大雨，他足足在雨中淋了两小时，捧着大把鲜花守候她从女生宿舍出来。汤霞铁石心肠，就是不出来，第二天那男生大病一场，躺在学校医院的输液床上，40度高烧中悲愤地吐出一句："你好狠心。"

很多年以后，我们几个朋友向汤霞求证这件事，汤霞哭笑不得，痛骂我们："你们怎么全那么八卦？"

大学毕业后的汤霞没有做成驻联合国大使，而是留校担任英语系的老师。四年后，她因为教学成绩突出、专业优秀，被派到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一所社区学院做交流教师，在那里任教两年。

赴美前的半年中，汤霞终于接受了一位忧郁诗人旷日持久的追求。诗人曾是她大学里无数追求者中的一位，小伙子出身贫苦的市民家庭，但外表出奇地标致和儒雅，而且学业出类拔萃，才华全校公认，毕业后分在政府机关工作。那个年代，诗人是容易让人产生幻想和好感的群体，而假如这位诗人的气质再忧郁点儿，就更加动人心神。更何况，他还会在请汤霞喝咖啡的时候，和她谈玛雅文明的神秘消逝，谈晚唐李商隐诗歌的超现实主义之美，也谈西方普世价值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忧郁的小伙子赠诗给她："你双脚所到之处，大地必将鲜花盛开。"诗句写在蚕丝编织的手帕上。后来又写了首叫"槐花蜜"的诗，其中有一句"槐花袅袅，五月流蜜，沥尽甘甜，滋汝生命"。现在看来，小伙子这首诗写得很"二"：他很大男子主义地把自己和汤霞的关系比作槐花与蜜的关系。但智商情商一向很高的汤霞，居然就被这么一首不三不四的情诗打动了心扉，貌似强大的她顿时不堪一击，坠落情网。多年以后，汤霞把此事解释为荷尔蒙的一时紊乱，但是当时，在汤霞的世界里，槐花盛开，春满人间。她把赴美前的所有时光，都用在和那个忧郁青年的缠绵热恋之中。临行前，二人为了表明绝不变心的信念，顶着汤霞父母的拼死反对和苦心相劝，毅然宣布订婚，决定之仓促，犹如今天的"闪婚"。

二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6岁的汤霞来到美国东海岸，开启了她崭新的生命历程。韦斯特波特是一个富人社区，在纽约和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之间。这里居住着银行家、商人、律师、外科医生、大学教授、职业经理人等一批纽约地区的杰出社会精英。汤霞是第一位来这里交流工作的中国教师，她娴熟的英语，美丽的外表，得体的举止，开朗的性情，让当地人一改对当时中国人的印象——原来中国的年轻女性并不像美国报刊上报道的那样保守、愚昧、缺乏独立精神，而是这样有思想、有见地、有性格的。汤霞自我揶揄说："虽然没做成驻联合国大使，但达到的效果不亚于大使嘛。"

在韦斯特波特，汤霞被安排住在当地著名的脑外科医生莫泰和退休大学教授凯罗夫妇家里，一住就是两年。莫泰和凯罗夫妇都已60多岁，子女都在佛罗里达州工作，偌大的住宅和花园里，只有夫妇两人。后院有很大的网球场和游泳池，还有舒适的人造温泉。汤霞来了之后，老夫妇还专门为她在一块空地上添置了乒乓球桌。汤霞仿佛成了他们的又一个女儿，他们待

她情真意切、无微不至。每天一早，老夫妇俩轮流开车送她到社区学院上课，晚上再去接，不厌其烦；为她做八分熟的牛排，给她煎双面熟的鸡蛋；可爱的莫泰老头开着那辆红色宝马敞篷车，带她在大西洋海岸兜风，老太太凯罗和她分享《纽约客》杂志里的最新故事。他们三人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样，一道用餐，一道外出旅行，一道去超市购物。老夫妇经常给汤霞买衣服和书，买女孩子都会喜欢的各种小礼物。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一个中国青年教师，一个美国外科医生，一个退休的美国大学教授，都是看上去平易近人，骨子里极有主见的人。

时间久了，熟悉了各自脾气，渐渐都不再加以掩饰。汤霞任性，莫泰老头顽皮，凯罗自我感觉优越，小冲突在所难免。汤霞不吃中餐就难受，有时在莫泰家的厨房烹饪，油烟有点大，凯罗不能接受。西方老太太的表达方式常常很夸张：“太野蛮了，浓烟滚滚啊，把墙都熏黑了。难道这就是闻名天下的中国美食吗？”汤霞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攻击中国文化。有意思的是，每次汤霞做饭时，凯罗在一旁上纲上线、声讨谴责，而当香气诱人的中国菜端上餐桌时，凯罗老太太比谁都吃得香吃得多，大惊小怪地叫喊：“Delicious, wonderful！”（好吃，太棒了！）

凯罗是自小在纽约长大的犹太人，从普通平民一路奋斗，快到50岁才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后被聘教授。她慷慨率真，富有同情心，她秉承着新英兰地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她很不随和，凡事挑剔，而且充满着美国上层精英和新英格兰地区知识分子的双重优越感。老太太这些很矛盾的性格特质令汤霞很不舒服。一早汤霞起床走进餐厅，老太太在看当天的《纽约时报》，刚道了早安，就突然语调上扬对汤霞说：“你看，今天的报纸上在说中国的农民工进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可是大问题。”汤霞脸上不好看，把面包摔在一边，牛奶也不喝了，就步行到公共汽车站台，自己乘车去学校。

事后，汤霞让莫泰转告凯罗：“我希望她说话时能在意我的感受，尊重我和我的国家。评价时事时，不要用那种傲慢和指责的口吻。我从中国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莫泰代老太太向汤霞赔不是。当天晚上，夫妇俩带汤霞外出去吃冰激凌，算是缓和关系不计前嫌，汤霞啼笑皆非，心想自己又不是小孩，用冰激凌一哄就没事了。也许，这就是美国人的天真和简单。

韦斯特波特，这座位于大西洋西岸精致而富庶的小城镇，聚集着高素质的社会群体。这里海风阵阵，浪涛拍打着海岸，金色的沙滩绵软而细腻。海鸥盘桓在上空，在云彩的下面忽起忽落。一座充满历史感的炮台，镇守在岸边，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用来抗击英国殖民者的武器装备。小镇中心地带，坐落着干净整洁的火车站，每天不断有火车往纽黑文方向和纽约方向对开。汤霞经常在这里搭乘火车，去纽约大街上观光，去看大都会博物馆

的新展览，或者去林肯艺术中心听音乐会。

三

经常陪她同去纽约的两个男性朋友，一个叫克利斯，另一个叫切布，他们是一对同性伴侣，分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文学院和杜克大学商学院，这都是享誉世界的顶尖名校。30多岁的克利斯充满朝气，40多岁的切布稳重成熟，两人都非常睿智，有纽约民主党知识分子的开明思想和包容精神，他们博览群书，通晓各个领域的自然和社会知识，仿佛是两部完整的百科全书。这对同性情侣和汤霞非常投缘，他们热忱地引导她探寻纽约曼哈顿每一条用数字编号的Street（大街）和Avenue（大道），走遍各个街区的地铁站、画廊、书店和酒吧。在纽约中央公园，她跟那些狂放不羁的白人男子踢起街头足球，狂飙突击的气概，巾帼不让须眉。克利斯和切布欣赏汤霞的豪爽和激情，甚至纳闷地问她："你这种性格，不算是典型的中国性格吧？"汤霞就莞尔一笑反问："那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性格算是典型的中国性格？"

有时，克利斯和切布也带上汤霞开着游艇出海、到朋友的农场骑马，或者驾驶直升机到波士顿走亲访友，那些时候，汤霞感觉自己是一个很亮很亮的电灯泡。好在他们都很随和，也都是思想开明的人，所以相处和谐，十分得体。有一次汤霞直言不讳地问他们："我是不是有点儿多余啊？"克利斯调皮地给她做了个鬼脸，用中文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是我们的老师。"汤霞释然了。

暑假期间，汤霞随莫泰、凯罗夫妇，一道去了趟墨西哥。墨西哥沙漠的独特魅力和加勒比海岸的浪漫风情让她无比陶醉。公路上，大片大片的荒芜，稀少的车辆，印欧混血的当地人，正是她喜欢的纯粹。静静矗立的玛雅金字塔群也一如期待，遗迹没有人工修葺的痕迹，而是风化的、破损的、坍塌的原样。这让她尤其思念万里之外的那个和她谈论玛雅文明的诗人男友，心想，如果诗人在这儿和她同行，该有多好，他是那么酷爱神奇的玛雅文明。

在美国，只要她看到新婚的夫妇披着婚纱，步入教堂举行婚礼，她就畅想着有一天，她也能挽着诗人，披着雪白的婚纱，踏进婚礼的殿堂。他们一开始用纸张写信，通过邮局以古老的方式传递。后来开始有了互联网电子邮箱，他们改用E-mail寄托相思。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生活在由她们主观想象和自我建造的世界里，汤霞也不例外，她并不知道，她只相处了不到半年的诗人男友，在她的心目中，只是凭着她自己的价值观和意愿假想出来的一个幻影。在美国，汤霞每到一处，都惦记着诗人，给他买一件T恤，买一套明信片，买一支钢笔，两年下来，给诗人购买的东西，三

只皮箱都装不下。而在遥远的中国家乡，诗人男友为了在单位早日得到提拔，当上小科长，答应了一个媒人的好心牵线，他和一位政府副秘书长的女儿恋爱并且进展飞速。

凡是把诗、文化、道德和普世价值放在嘴边念叨的人，你一定要警觉他，这可能是他生存的保护色、捕猎的伪装或者追名逐利的招牌，这个道理后来被无数朋友的不幸遭遇反复证明，屡次应验。但在当年，不谙世事、心思单纯的汤霞无法认识到这个深度。一个真正有诗意、有文化、有道德、尊重普世价值的人，一定是平和的、朴实的，是有平常心、同情心的，绝不会有丝毫花枝招展的浮夸表演，也不需要任何信誓旦旦的自我标榜。

为了远方这个浑身散发着诗情画意的小伙子，汤霞放弃了一个重要的人生机会。在莫泰、凯罗夫妇的一再鼓励下，她申请了耶鲁大学的法学硕士。她本是无心插柳，没想到几个月后就收到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整个韦斯特波特的朋友为她骄傲，为她喝彩，当地的社会主流人士专门在韦斯特波特最奢华的临海餐厅为她举行了欢快的庆祝仪式。庆贺聚餐的现场，韦斯特波特一对从事国际贸易的富商夫妇，也是真心厚爱汤霞的长辈，主动提出要做汤霞的经济赞助人，承担她在耶鲁法学院读硕士乃至未来读博士期间的所有费用。当时的中国青年不像今天这样，有宽裕的家境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很少能依靠自己的家庭财力来完成学业。此外，法学院的学生是几乎不可能拿到太多奖学金的。所以，汤霞能够幸运地得到朋友的慷慨赞助，完全是上天对她最热诚的恩宠。

但是，汤霞拒绝了经济赞助，也放弃了耶鲁大学的学习机会。庆祝晚宴上，她果断地宣布："两年已经结束，我要实现我的承诺。第一，我要回去结婚，我深爱的男友一直在家乡等着我；第二，我是学校公派出来的，我必须回去，这是诚信；第三，我谢谢朋友们的好意，但接受朋友的经济资助，会给我带来压力，更会改变我和朋友的平等关系。"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但是他们不得不深深敬佩这个有独立精神、情感很真、骨头很硬的东方女孩。

告别韦斯特波特的时候，她用中国人的习惯，捧起那里的一把土，向大西洋作揖。她告诉当地朋友，作揖是汉民族传统的一种礼节，拱手为礼，表达的是最郑重的敬意。她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小镇。海风吹动着头发，吹动着她身上的黄丝巾，黄丝巾和故乡丰收的田野有着一模一样的色彩。她心潮涌动，突然意识到，两年时光，28岁的自己在这里长大了。她骨子里的东西其实很中国很传统，比如懂感恩，比如重情义。父母在，不远游；情郎在，亦不远游。

四

汤霞回到了她阔别两年的中国，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诗人男友。那男友的气质已经和诗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只是一个满脸酒色财气的机关小公务员，充满升职的欲望和纠结的心机。男友告诉她已经发生的变化，他很快就要和那位副秘书长的女儿结婚了。他还说："本来我想在信里告诉你，可你毕竟一个人在异国，怕你受不了，因为你太单纯。"

汤霞噙着泪，但脸上是有笑意的，她语调很轻："谢谢你，还能这样为我着想。但是你还是应该早点告诉我，让我的幻想不至于拖延得这么久。"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分手了，没有晴天霹雳，没有欲罢不能，更没有控诉诗人男友的攀附权贵和见利忘义。汤霞从那所大学辞了职，她要离开这座伤心之城，永远忘记这个点燃过她的爱情又埋葬了她的纯真的人。

那个诗人男友，后来平步青云，被调到省城，走上平坦的仕途，在越飞越高的翱翔的喜悦中，"凤凰男"不断期待着新的大好前程，一往无前。在他变得越来越忙碌和显赫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再有闲情写诗，更不会轻易回忆青年时代遇到的那个叫作汤霞的少女。

当初大学里淋着大雨在女生宿舍前苦等两小时的"高富帅"，听说汤霞生活的变化，专程来找她。此时的"高富帅"已经继承父业，成为浙江某服装集团的老总，年少得志，身家过亿。"高富帅"诚恳地请求她能接受他常年如一的仰慕，并主动向她求婚。汤霞婉言谢绝说："真的谢谢你，但我们不合适。这个时候，我更想独处。"

汤霞后来嫁给了一个从事对外贸易的同龄人，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他们一道在青岛开公司经商，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过得很平淡也很舒心。记得在她结婚前，我们还开玩笑地问她："这次不会再弄错吧，不会再被文化人的假象迷惑吧？"她俏皮地说："肯定不会啦。岁月给了我一双雪亮的眼睛，让我学会一眼就能辨认出这人是真有文化，还是有知识无文化、有智商无情怀。"说罢，我们都捧腹大笑。汤霞就是这样的性格，她不记伤痛，不聚集负能量，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她深深地懂得，江河之水总是要向前奔流的。

2008年的春天。美国韦斯特波特的莫泰、凯罗夫妇来到中国，选择在汤霞当年所任教的师范院校义务任教半年。汤霞和先生的公司当时还开在青岛，知道他们要来，汤霞特意带上孩子赶回家乡，专门陪伴了他们整整半年时间。那半年里，莫泰在学校的医学院讲授外科手术，凯罗在学校的外语学院讲解英美文学。我和汤霞轮流陪伴老夫妇，陪他们聊天、喝咖啡、做足疗、在附近旅行。莫泰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想要在江苏这座小城的东郊，在一个生态小岛上，创建一个重症儿童的临终关怀基地。他的这个慈善计划其实已经得到了韦斯特波特名流们的支持并很快可以获得捐助。汤

霞为此到处奔走，在家乡的熟人社会，帮莫泰做了各方面的沟通和争取，但因为当地政策上的种种限制以及特定国情下的观念差异，莫泰的这个美好心愿最终未能实现。

莫泰从小在新泽西州的犹太人街区长大。他8岁和12岁时，两个弟弟先后死于重病，那种丧失亲人的悲痛和恐惧其实追随了他一生。而莫泰在欧洲大陆的家族长辈中，也曾有人获益于中国人的仗义相救。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1938年至1940年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冒着风险向当时在奥地利的大批犹太人发放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帮助他们逃离纳粹魔掌。莫泰的小叔叔就曾是一位幸运的受益者。这一切，都是他想在中国建立临终关怀营地的原因和动力所在。汤霞领悟到，这是看上去大大咧咧的莫泰老头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为莫泰创办营地到处奔波的那些日子里，汤霞曾对我说："人忙了一辈子最后会发现，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只有这种人道主义的爱，才是解决困苦的唯一办法，其余的，美貌、才华、财富、权力和名望，都不起作用。"

五

2016年初夏，我在美国东海岸停留几日，重访了韦斯特波特的老朋友们。时光无情，岁月沧桑，茂密的森林还在，潺潺的溪水还在，寂静的火车站还在，但一切已物是人非。莫泰老人已在几年前病逝，成为遗孀的凯罗独自一人寡居，留给她的是一栋空荡荡的豪宅和一片巨大的花园，她自己料理家务，打扫很大的房子和花园，尽量用各种社交活动把生活填满。这时，美国同性婚姻法案已经通过，克利斯和切布已经成为合法伴侣。只是，克利斯已年近50，切布也过了60岁，岁月的痕迹都越发明显，仿佛树木的年轮，镌刻着生命的印记。在凯罗家的露台上，我们几人一道共进晚餐。凉风习习，薄雾轻散，周围古木参天，仰头望不见树梢，林间飘动着一阵阵清新的枝叶气味。露台的壁灯下，有飞虫来来回回，闪过我们的视线。大家谈论的话题，又一次集中在汤霞身上，仿佛她是韦斯特波特小镇上最难忘、最温暖的记忆。

凯罗深情地回忆着汤霞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情景，每天开车接送她时自己爽朗的笑声，还有莫泰对她亲人般的关爱。回想着，老太太不禁潸然泪下。克利斯和切布唏嘘之余，突然问我："你觉得，汤霞现在会不会后悔，当年放弃到耶鲁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摇头说："不会的。汤霞不是纠结的人，她很明白，往事不可追，江河之水总是要向前奔流的。"

此时，45岁的汤霞正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江苏盐城。这些年里，由于工作的需要，她随丈夫从青岛辗转到西安，然后又搬到盐城射阳。他们现在在射阳有个小厂，为海外国家加工供应鱼类饲料，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只

是，这几年外贸形势不是很好，订单逐年减少，企业多少是有些危机的。所以，她开始接受当地外国语学校的聘请，到那里教授一些英语课程。和当年一样，她的英语还是烂熟于心，而她自然不做作的性格、与人为善的心态、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韦斯特波特的朋友里，仍然和汤霞保持联系的已经不多。那是一个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区，很多旧友已经老去，有的已经进了养老院甚至不在人世。

克利斯和切布给汤霞写信，关心地询问她，会不会让女儿来美国接受教育，完成她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梦想？他们乐意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汤霞似乎不愿刻意而为之，她不想让女儿像自己当年那样与众不同，不想让女儿在众星捧月的感觉里膨胀虚荣而丢失平常心，她只想让女儿做个普通人，因为很多年以后她发现，人生终究是平淡的，越平淡的人生其实越高贵。汤霞这样说：“男神女神，都是年轻不懂事时的荒唐封号。不管你曾是怎样的牛人，上过怎样的牛校，彼时的因缘不等于此时的光景，人不能执着于过往，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毕竟，江河之水总是奔流而去。”

汤霞的家临海不远，在阁楼上可以看见丹顶鹤从芦苇丛里飞出来，抬头四处张望，然后又超然腾空，在水上旋起轻盈的舞姿。每到夏季这个时候，那些丹顶鹤就会纷纷飞往东北的哈尔滨。等到冬季来临，鹤群又从冰冻严寒的北方飞回盐城沿海的滩涂和湿地过冬。在汤霞的屋前，迎着她的视线，那些丹顶鹤翅膀微张着，姿态优雅，遗世独立于寒霜之中，又张开双翼越过沼泽，涉过浅水，像一幅很淡很淡的水墨画。汤霞就在这里，过着宁静的生活，相夫教女，永不倦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带着女儿到海边的滩涂上捡小贝类，回去给家人煮蛤蜊豆腐汤，这道菜已经成为汤霞的拿手杰作，也宽慰着丈夫舌尖上的味蕾。

这些年，微信群拉扯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小学同学都在张罗着各种热闹非凡的聚会，很多人联系汤霞，决意邀请她前往。汤霞心静如水，不参加任何一场同学聚会。就在这个月，大学同学盛大聚首，同学们轮番说服她，还有人特意要开车到盐城来请她。大学时代的班长发微信给她：“你是当年的校花，是我们的女神啊，没有你的同学聚会是不完整的。大家好想见到你，请务必前来参加，不要让老同学们扫兴。”

四周一片静谧，汤霞若有所思。片刻之后，汤霞向班长回复道：“告诉同学们，那些妩媚的年代已经永远过去，让我们彼此在心里珍藏青春的容颜。毕竟，江河之水总是向前奔流。”

兄弟我们在旧金山时

从旧金山到北京

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时，他突然意识到，留学美国的那三年，是他魂不附体的三年。

而这一刻，仿佛失魂落魄的肉身再度还魂，身上重新被灌注了元气。

一

全球交融，时代向前。赴美留学的中国青年越来越多，多得像过江之鲫，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更是中国学生留美的聚集地。

旧金山湾区圣何塞州立大学附近一处公寓区的5号公寓里，中国留学生特别集中，三层小楼里，住着20多名前来读硕士、博士、本科或者预科的中国学生。

于逍读商务管理，硕士二年级。他的父母都是北京政府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于逍是本科毕业后来的美国，他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他将来能在美国找份好工作，过一种人际关系简单的生活，无须逢迎无须钻营，也不用为房价发愁。

天淳是西安人，在加州念船舶制造专业，也是硕士第二年，父亲是国企技术员，母亲是银行小职员，都是标准的工薪阶层。当初天淳来美国读大学本科时，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两套房产，换成美元，存在账户上，刚好足够儿子在美国完成四年大学和两年硕士教育的全部学费以及生活费。卖掉房子后，天淳的父亲向单位借了一间3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和天淳的母亲凑合着住。天淳的母亲伤感地说：“忙了多少年，我们又回到了刚结婚时的居住条件。”天淳的父亲安慰她说：“为了咱儿子，过几年紧日子吧。等他在美国毕业了，工作了，买了带很大院子的房子，我们就重见天日了。”

阿茂、小白和陶媛，两男一女，他们在中国的父母，有的是做跨国贸易的，有的是开办化工厂的。三人原先都是在国内学不下去，高中成绩一塌糊涂，父母通过留学中介把他们送到加州读语言学校或者预科，然后磕磕绊绊通过语言考试，勉勉强强被美国大学录取，如今本科在读。远在异国求学，他们仿佛不是以读书为主要任务的学生，更像是共同享受生活的同盟。他们给自己的小团伙取了个时尚的名字，叫“三文鱼刺身”。

“三文鱼刺身”这几位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他们刷信用卡就像开自来水龙头那样轻松随便。他们在太平洋的东岸刷卡花钱，他们的爹妈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为他们及时还款。他们花多少，父母就还多少。“三文鱼刺身”争当“吃货”，每年11月到次年6月，是旧金山盛产海鲜的时节。“三文鱼刺身”就轮流请客做东，吃遍湾区最奢华的海鲜餐馆，尝遍渔人码头各式各样的蛤蜊浓汤。有时到了周末，他们飞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尽情体验这座浪漫之都的奇趣冒险与活色生香，琳琅满目的老虎机不断激发他们沸腾的欲望。

很多时候，于逍独自伫立在雾气湿冷的海边，穿着一件时尚的连帽卫衣，对着汹涌而来的东太平洋洋流，仰望着升上天幕的惨白月牙，他把一瓶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他把空酒瓶用力扔进海里，让潮水卷走。

于逍学的是商务，感兴趣的却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英文奇好，不仅口语熟练，而且阅读神速，两天不到就读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三天不到就读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没事就泡在学校图书馆，专心研读那些枯燥的政治学论著。

于逍偶尔也参加北京留学生群体的聚餐，去过几次，就觉得索然无味。那些聚会场合，不是“官二代”显贵，就是“富二代”炫富。他和这些圈子保持距离，独来独往。

天淳每天两点一线，除了在学校看书上课，就是在住所埋头苦读，拼命学习，丝毫不敢倦怠。天淳是别无选择的，他必须竭尽全力，取得优异的学分，争取毕业后找到工作，拿到工作签证，留在美国。远方有卖掉房子、省吃俭用、望子成龙的双亲，期盼着听到他的佳音。他既不能像“三文鱼刺身”一样终日挥霍玩乐，也不可以像于逍一样衣食无忧、从容不迫地思考抽象的国际政治命题和人生哲理。天淳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偶尔去一趟教堂，坐一会儿，祷告之余，听牧师读一段诗篇。

于逍邀请天淳到附近的希腊餐馆吃饭，请了好几次，天淳都一概拒绝了。天淳心里知道，他没有和同学人情交往的资本，吃别人一顿，就要还人家一顿，他每个月向来都是捉襟见肘，紧张拮据。

在同学的推荐下，天淳找到一个打工的机会，在学校附近一家墨西哥餐厅的厨房做帮工，每周两次，每次的工作内容单调，就是用小刀削胡萝卜，翻来覆去地做机械劳动。那家“老墨”餐厅有规定，切菜这道工序不能当着客人的面进行。天淳只能被关在狭小闷热的厨房里完成工作。他常常削完几百个胡萝卜后，手指肿胀，腰酸背痛，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学校上课。

“三文鱼刺身”三人，一人买了一辆豪车，阿茂买了辆凯迪拉克SRX越野，

小白买了辆4系敞篷宝马，陶媛购置了一辆粉红色雷克萨斯LFA。三辆豪车停在公寓区，光芒四射，引人注目，让公寓的管理员们目瞪口呆。不要说美国的学生不可能拥有这些豪车，就连很多在“硅谷”奋斗很多年的白领也买不起或者舍不得买。“三文鱼刺身”约好旷课逃学，开着新买的车，沿着加州1号公路飙车。三辆崭新的高端豪车，像电子游戏屏上的赛车一样，在太平洋曲折的海岸线上狂野地疾驰，你追我赶，超速前进。

二

天淳开的是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发动时经常能听到震动的噪音。一个中午，天淳开车回到公寓，因为急于回房间发邮件，停车时有点急促。他打开车门时，车门不小心碰了一下正好停在旁边的小白的敞篷宝马，但没有留下任何划痕。

尽管天淳向车主小白连声道歉，但“三文鱼刺身”立即围拢过来，把天淳逼到墙角，先是呵斥加怒骂，满口英文脏词，然后把瓶子里喝剩一半的可乐浇到天淳头发上。此时，于道刚好下楼，走到公寓门口。看到这一幕，于道上前制止，他仗义帮助弱者，用自己魁梧的身体挡住文弱的天淳，使他免受进一步伤害。肥胖的阿茂和粗壮的小白突然从两边袭击过来，对准于道的头部进攻，于道被打得头晕目眩，摔倒在地。

天淳打电话叫来警察。白人警察讯问时，“三文鱼刺身”联手抵赖，相互串通编造供词，坚决不承认打人的事实。警察离开时，公事公办地向于道、天淳说明办案程序——因为“三文鱼刺身”一致否认打人事实，加上现场找不到任何伤害性证据，警察不能对“三文鱼刺身”采取惩罚。如果他们不服气，可以找律师走司法渠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于道和天淳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大叔开着警车离去，“三文鱼刺身”相互扮着鬼脸，趾高气扬地从他们身边绕过，拖着加州阳光照射下的胜利身影，大摇大摆走进公寓。

第二天，于道和天淳一块儿去拜访律师，这是一位资深的白人律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名声响亮，对法典倒背如流。律师听罢他们的陈述，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事发现场没有监控摄像头，他们也提供不出被打伤的医学证明，又没有除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名在场目击者，这场诉讼就如大海捞针一般胜算渺茫。而且就算找到线索，在美国打官司可不是一般的麻烦，程序烦琐，花费巨大，周期漫长，没有一年半载，根本不可能有结果。于道向律师支付了200美金的咨询费，和天淳悻悻离开了律师事务所。

那天，天淳破例请于道吃饭，是Ocean Beach（大洋海滩）那里一家名为悬崖小屋（Cliff House）的餐厅。餐厅坐落在悬崖峭壁上，环境幽静，光线明朗，透过落地窗可以欣赏窗外无垠的大海和过往船只飘逸的风帆。于

道为帮天淳省钱，只点了一份意大利面。饭桌上，天淳首先向于道致谢，感激于道仗义，为他打抱不平受了连累，白白挨了好几拳。于道咽不下这口气，想找律师打官司，天淳劝慰于道："算了吧。我们都临近毕业论文答辩和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人生大事要紧，何必为这帮为富不仁的无赖伤神又误事，忍一忍吧。"

于道听完点点头："这些我都知道，我们只有自认倒霉。西方的法律细到极致，但细致的另一面，是教条和僵硬，是冷酷和无情。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证据，也就难以告赢他们。西方法治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原本是和宗教精神相辅相成的，发挥对社会的关爱。可是走到今天，因为摆脱了与宗教精神的联系，变成僵化的法条，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天淳听于道这般认真地分析，就笑他太过书生气。人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哪来这么多事理的分析，人文关怀从来都是一种奢侈的想象。

晚饭之后，于道和天淳散步在海边。同为中国的"80后"，两人都只有26岁，两个英俊的青年，沿着海湾走了很远很远。旧金山湾区的海景优美无双，湛蓝的大海展示着它的辽阔，奇松怪石点缀海岸。海滩蜿蜒，伸向金门大桥的方向，俨然一幅色调浓郁的油画。不过这里的海却是如此冰冷，即使是盛夏也没法下水游泳，也要身穿厚厚的外套迎着海风行走。

天淳对于道坦言："自从我父母卖了房子送我出来读书的那一天起，我的人生就不再能随心所欲。我只能乐观地相信，加州有自然美景、文化自由、繁荣富裕、多元化和新时代的文明，我要亲手创造生活，让自己成功。不过现在华人留学生越来越多，华人毕业后找工作越来越难，留下也越来越难，听说马上连工作签证也要开始实施抽签制度了。"

在呼啸的海风中，于道费了很大劲才点燃一支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对天淳说："我不想给自己任何压力。当初来美国就不是我自愿的，是我爸妈的意愿。他们一辈子在官场入戏太深，活得累，过得不能自主，就指望着把孩子送出来，别再像他们那样委屈自己。大人们总是这样，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把自己一生的遗憾和不如意，在孩子身上扭亏为盈。很少有人冷静地想过，应该顺其自然，应该力所能及，应该顺势而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挣扎和奋斗都一样艰辛，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都有他们想象不到的缺陷。美国不是慈善机构，它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现实。美国暂时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交了钱。"

天淳很执着："我不想考虑太多。我父母不容易，节衣缩食，好几年没有添一件像样的衣服了。他们天天盼着我学业有成，在美国找到工作，早日拿到绿卡，把他们接到美国，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摘豆角。"

于道苦涩一笑，疑惑地说："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摘豆角，这事在哪儿做

不行？在西安找个一楼带院子的住宅也行，在北京门头沟的四合院里也行。”

三

时光悄无声息，在人生和世界的激流中，日光倾泻而下，时光钟摆上的印记在身后层层腐朽。而中国留学生继续像潮水一般，一波一波，以川流不息之势，涌入美国，涌入加州。

两年后，“三文鱼刺身”死党中的阿茂因酗酒闹事被拘禁六个月后驱逐出境；女生陶媛因多门学科考试不合格被勒令退学，不得不返回中国；小白虽然勉强毕业，但难以找到工作。此时，他父亲在国内的化工厂因经营不善和债务危机而宣告破产。家族产业崩溃，父亲从亿万富翁跌至一贫如洗，连家里的住房都因拖欠贷款遭到银行没收。小白贸然“黑”在美国，打黑工为生，从此成为非法移民。

天淳毕业后，必须在过渡签证失效前火速找到正规工作，如果不能立即找到有资格发给他工作签证的工作便会被遣返回国。这是一场学历、名校、专业、天才、能力、机会之间的残酷竞争。天淳历经艰辛，周折无数，最终辗转来到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凭实力得到了一家船舶制造公司的科研职位，由于前前后后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造船方面的论文，学术成就突出，很快取得美国绿卡。随后，天淳为父母申请了亲属移民。父母随儿子一道，移居在佛州杰克逊维尔市郊一处能听见海浪的街区。天淳娶了一位越南华人的后裔为妻，她从小在美国长大，中文不算很好，但能简单交流。

天淳感恩生活，也满足现状，在他的观念里，美国至少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信仰支撑他度过了曾经的难关。

他们所居住的街区居民以黑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少数白人，但见不到一个华人，也找不到一家华人餐馆。两位老人不懂英语，不会开车，加上那里犯罪率高，不断发生持枪打劫事件，天淳从不让父母单独外出。天淳有空休假的时候，开车两个小时，带他们到杰克逊维尔与迈阿密中间一个小镇上的小教堂。每到礼拜日，那里聚集的华人众多，华人之间可以说说话聊聊天。就在那所教堂，在华人同胞的宣教下，天淳的父母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想以曾经向往的方式消磨时光：于孤寂宁静之中，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摘豆角。

遵照父母的心愿，天淳果然买了很大的房子，后院面积宽敞，种着十多种华人喜爱吃的蔬菜：韭菜、茼蒿、香菜、扁豆、刀豆、葫芦。还特意开辟了一方小水池，培植莲藕。夏天的院里，扁豆花争奇斗艳，即使在夜色里

依然缤纷。白的紫的扁豆挂满枝架，一家人坐在豆角架下，数着星星，看着流萤，孤独，自由。一念之间，岁月流转，遍经冷暖。

于道在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就选择回国，不愿在美国多停留一晚。回国那天，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时，他突然意识到，留学美国的那三年，是他魂不附体的三年。现在回到北京，仿佛失魂落魄的肉身再度还魂，身上重新被灌注了元气。于道倒过了时差，在车公庄的家附近漫步，那些熟悉的梧桐树，熟悉的烤羊肉串摊，熟悉的二锅头商标，激荡起他心底的烟火气，令他倏然想起古老的中国诗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于道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栋商务楼里租了几间办公室，创办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把中国江南一带的纺织面料出口欧美，供应给海外家具商，用于沙发面料制造。这样，他经常有到江南一带出差的机会。有一次他赴江南出席一场商贸洽谈，携未婚妻经过嘉兴，在所住的希尔顿酒店的大堂总台结账时，突然遇到一位面熟的胖子，居然就是当年5号公寓里“三文鱼刺身”的成员之一阿茂。

阿茂热情地向他挥手，主动寒暄，于道也落落大方，礼貌握手回应。阿茂忽然有点儿生硬地说：“兄弟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真的过意不去。那次打了你，还向警察撒谎。”短暂的尴尬之后，于道拍拍阿茂的肩膀说：“还提那事？其实我要感谢你，你那一拳，打碎了我的美国梦，打破了我的执着。让我懂得，其实在哪里都没有公平，都要忍辱负重。”一边说着话，于道让未婚妻先在总台结账。阿茂提出要为于道付掉酒店的房钱：“我来为你们付吧。请一定给我这个机会，我一直觉得心里亏欠你。”于道连忙摇手：“不行不行，住店的钱必须我自己付。这世界，谁也不欠谁。”

阿茂把于道和未婚妻送到酒店门口，目送两人离去。这回轮到于道飙车了，他驾驶一辆林肯商务车，上车后突然启动引擎，迅速冲出酒店的停车场。他疾驶在江南十月的万里晴空之下，在一大片如积雪一般纯美的白云下面，秋高气爽，天宇澄净。江南的蚕桑，郁郁葱葱，绿得耀眼，可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车窗外，陌上，烟凉，荼□了几季时光。

当美国已成往事，那些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就在念念不忘的过程中，被忘记了。瞥见于道眼角有泪光闪过，未婚妻好奇地问：“你刚刚受什么刺激了？开这么快？想起美国往事了？那胖子当年为什么打你？”于道减缓车速，默默无语，不作回答，只是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把音量调得很大。汽车音响里全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

于道一句一顿地说道：“岁月是公平的，从不会多给任何人一秒，也不会少给任何人一秒，人人各得其所。时间一直奔流，一直奔流，不会停下来等我们觉悟。”



chapter 4
落在土地上

巴黎笔记

是敬畏之心帮助它度过了蒙昧、暴政、黑死病、战争和杀戮，穿越颓废、放纵、贪婪和骄奢的沼泽；是敬畏之心引领它驾驶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利益这两列危险的火车，不敢轻易偏离轨道，或者已经数次偏离轨道，却又重新迷途知返。

1 塞纳河：流动的筵席

海明威在半个世纪前吟咏：“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巴黎将永远跟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

晨光清朗，天宇澄澈。当我拾级登上百米高的凯旋门顶端极目四眺，整个巴黎古城尽收眼底：以凯旋门为中心的十多条街道把巴黎市区切得像一个错落有致、色调明快的巨大蛋糕。远处高坡上纯白色穹顶的圣心大教堂鹤立鸡群，近在咫尺、无处不见的埃菲尔铁塔高耸云天，香榭丽舍大街花团锦簇、气象阔大。

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博物馆和超级艺术殿堂，巴黎凝聚了人类创世以来时间和空间的美的精华。

冬天的塞纳河沉默流淌，两岸华贵的建筑群沿河堤绵延，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巴黎圣母院和亚历山大三世桥连成一片。我置身于斜阳下醉人的塞纳河之上，视线随着船舷移动，一座座形状各异的桥梁不时地从我头顶越过。市区段的塞纳河上共有36座式样各异、年龄不一的桥梁，为塞纳河平添了道道绮丽景致。如果说1578年动工的新桥最负盛名，那么，由俄国沙皇帮助建于1900年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可谓塞纳河上的“桥中皇后”，桥上及桥头一组组青铜雕像恢宏华丽、厚重典雅。用石砖、钢铁建造的桥梁记录了战争的演变、王朝的兴衰、历史的变革和民众的哀荣。

在塞纳河沿岸的街头，我真正领教了巴黎男女优雅的着装，从追赶时尚的少女到拄着拐杖的七旬老人，对衣着的讲究和仪表的注重毫无二致，他们身着的服装就像时装店里模特身上所穿的那样，毫无雷同，优雅、个性，多数时候相当得体，偶尔也略有夸张。精心的设计和搭配仿佛把所有巴黎人都装扮成了风度翩翩的绅士和淑女。在寒流掠过的日子里，老太太们照样穿着花格呢裙、外罩一件绛紫风衣，牵着心爱的宠物狗，穿行在都市人流中。

冬日的巴黎天亮得很晚，可每天早晨温暖的晨曦总会托出一个新鲜的城市。而当夜色早早降临，巴黎那些目不暇接的剧目却并不因此落幕，流光溢彩的夜晚比白天更加美轮美奂，尤其我去巴黎时正值12月，巴黎人沉浸在迎接圣诞的狂喜中。在圣诞树的灯火映衬下，整个城市像巨大的流蜜的花园，我向陪同者惊叹，这里难道还是人间吗？

2 巴黎：左岸与右岸

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没有像右岸的商业区那样到处耸立着流光溢彩的圣诞树，这里是另外一种喧腾的景象，终日活跃着一群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建筑师、杂志撰稿人，他们构成了巴黎的知识分子圈，是他们在谱写着塞纳河左岸的历史。巴黎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所、画廊、美术馆集中在这个区域。这里每天都在举行着大大小小的沙龙、研讨会和演讲，各种学术活动遍地都是，人们习以为常，毫无优越感和神秘感。小丘广场有世界闻名的露天画廊，每天有不少画家在这里即兴作画出售。在市中心的沙特莱广场和圣·日耳曼德伯广场等地，青年学生和市民经常自带乐器举行音乐会。广场画家、街头艺人终年在这片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圣地上作画和演奏，没有人认为街头卖艺是低微的行当，人们相信，新一代的毕加索、凡高、塞尚将出自这些艺人中间，他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总会有几幅传世佳作在未来世纪被卢浮宫奉若神明般珍藏。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拥有这样多的露天咖啡馆，诗人和画家在轻啜咖啡中寻找创作灵感，青年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虽然今天的法国年轻人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空谈“主义”和“思潮”，但他们一样会纠缠于“历史河流的终结航向”、“个体自由与社会意志”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一样会在沙龙聚会和酒吧里乐此不疲地咀嚼着哲学和女人的话题。

在法国，“知识分子”、“塞纳河左岸”、“左翼”这几个语汇之间总被画上奇妙的等号。数百年间，法兰西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澎湃的激情和乌托邦冲动。20世纪，是法国现代主义哲学取代德国古典理性哲学的时代，在柏格森、萨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大师级人物风起云涌之后，法兰西知识分子为他们所获得的全新的知识特权而骄傲，无不陶醉于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中。他们自信，他们构建的知识财富使法兰西民族高擎着人类理想的火炬，照亮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此，当提及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时，他们无怨无悔。青年建筑师皮埃尔·德威对我说：“现在历史学家们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可为什么要做‘事后诸葛亮’呢？由于法国人的民族天性，我们难逃此劫，这是历史的宿命。”从事教育出版工作的女编辑薇罗尼卡·迪伦说：“起码今天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经受了共和的彻底洗礼，我们再也看不到旧王朝的阴影。”曾经桀骜不驯的法兰西民族进入现代以后变得克制了，他们不再轻

易地把思想的火星随意燃成燎原大火，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动荡，但是对社会文化保持着清醒的批判和监察已作为一种习俗被新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所传承。

200多年前，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曾经是不计其数“道德不纯洁者”人头落地的地方，今天，漫步此间，这里成了华灯高照的圣诞集市和香风艳影的情侣大道，尽管充满“左翼”风向的“工潮”不断，但无伤和平大雅的盛世风情。法国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着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良善的社会如何在秩序与反秩序之间平衡、进步。这表面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实际却是一个格外现实的社会学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今天法国式福利社会体制的1968年的“红五月”注是对是错呢？我发现，法国人一旦遇到这种思辨性问题的时候，思维就比不上严谨的德国人灵敏，他们会报以一种感性的微笑，然后说：“走，我们看冬季时装表演去。”

塞纳河右岸以其金钱、贸易、权力和权贵，形成了巴黎的贸易、金融和消费中心。那里是成功者的乐园，是繁华、奢侈、成熟、优雅的象征。生性浪漫、情感奔放、喜爱沉思的法国人当然从不拒绝一切精致的生活享乐。这是塞纳河的右岸，声色犬马、光怪陆离，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埋葬最后一滴眼泪决心要与社会挑战的地方是这里，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之骄子向恶俗名流最终妥协的地方也是这里。右岸是目不暇接的花都美景，一派华美的人间喜剧：昂贵的香水店、豪华的百货公司、奢侈的时装陈列、美女云集的红磨坊表演；左岸是一群心怀忧患或者愤世嫉俗的文人书生不停地评头论足，他们企图要驾驭法兰西和巴黎的精神轨道、摆正历史和人性的天平。

欧洲人说，法国的历史就是靠塞纳河的左右两翼平衡的，于是才有了欲望的欢乐，也有了精神的情操。

3 法兰西：拒绝全球化

走过巴黎古老的街区，好几次穿越这座保存完好的城市，我吃惊地发现，法兰西民族把极其敏感的文化自尊表现在所有的社会交往、商业贸易和日常生活中。

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法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全球化”这个甜蜜的利益陷阱背后的“美国中心意识”和“英语殖民主义”。也是法国学者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就是把全世界变成以英语文化为中心的精神殖民地。”

为此，法国向全世界证明了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决心。从戴高乐机场的指示

牌到香榭丽舍大道的路牌，从大小美术馆的游客指南到公共厕所的标记都只使用本国语言。这一做法已被欧盟中的大多数成员国接受并效仿。法国的电影院里，无论是商业院线还是艺术院线，放映的大多是法语本土电影。那些在其他国家风光无限的所谓“好莱坞大片”，在这里只被视为普通外国电影对待，汤姆·克鲁斯的《最后的武士》的招贴画被淹没在法语电影的海报中。在巴黎拉丁区，著名的《电影手册》杂志周期性地发起“反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抗议活动。他们通过各种讲坛和刊物骄傲地向世人强调，法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电影艺术的故乡，他们自信每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令奥斯卡金像奖望尘莫及。他们当年发起的“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运动是法兰西心灵深处青春的呼喊。那种呼喊曾让“二战”以后整个世界青年人的内心为之震颤。

法国从官方到民间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纯度的珍视不能不令世界敬佩。即使在繁华的商业街区，法国文化部门也严格规定了商业霓虹灯和广告牌的尺寸，壮观、典雅、华贵的巴黎古城景观没有因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而改变。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巴黎圣母院，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乔治·桑笔下巴黎的明媚神采，也可以循着塞纳河的流光追溯兰波、马拉美、波德莱尔的诗句中往昔的影踪。巴黎的美与丑，都被这个盛产文学大师国度的作家、诗人写尽了。

在世界的许多国家，许多人被全球化热潮冲昏了头脑。法国人用自己的准则给了世界一种善意的告诫，要去尊重自己的文化、语言、习俗、价值和传统伦理。欧盟大市场的形成、边境的开放和欧元的统一发行只在经济意义上加强了欧洲各国的协作和联合，而在文化意义上各国却是彼此独立、崇尚个性的。全球化也是这样，不能以取消民族文化的存在为代价，不能陷入后殖民文化的尴尬境地。

高度的文化自尊心也会引发过激的文化优越情绪，难免带来种种微妙的文化冲突。所有美国人在巴黎的旅行时都会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文化摩擦，在他们的眼中，法国人是傲慢的，傲慢得近乎势利。在时装店里，面对美国客人，法国人漫不经心，经常不愿用英文迎合，他们会斜着眼睛打量美国顾客付账，见客人一转身，就讥笑他们只会穿休闲的娃娃衫。美国人用信仰和法国人的骄傲对抗，美国人的优越感尽管不是来自悠久的文化，但他们相信自己过着一种正直虔诚的生活，相信自己永远目光无邪、心怀抱负。他们也常常不能理解法国人，那些坐在露天咖啡座上高谈阔论的法国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是多么不切实际，在美国，这个年纪的人正处于为成功、财富和机遇奋斗的黄金光景。法国人常常笑谈，是否他们会从美国追索回那座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偶尔，他们也会怀念起两个民族历史上如胶似漆的岁月，想起18世纪的贵族青年拉法耶特怀着人权和民主的理想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他曾和华盛顿总统情同父子，为新大陆的自由南征北战。

4 欧洲：文明的敬畏之心

在法国，我温习了一段过往历史。1945年，当纳粹德国撤退巴黎之时，希特勒曾下令炸毁塞纳河上的所有桥梁。但是德军总司令违抗了军令，面对着与巴黎城市浑然一体的这些桥梁建筑史上的辉煌杰作，他的仇恨之心颤栗了。

几天后，在德国的海德堡，我又听说了类似的故事。当年盟军攻克德国时，莱茵河流域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炮火的轰炸。而海德堡却幸免于难，原因是那里有“出此校门，便无学问”的海德堡大学，那是诞生过无数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学府，甚至盟军中的一些高级将帅也毕业于这个学校。

今天，几十座造型各异、金碧辉煌的桥梁安然无损地横跨在河面上，它们成为巴黎光荣的脊梁。而德国耐卡河畔，海德堡沐浴在宁静、典雅的光辉中，继续为人类贡献着学问和理想。试想，在那个人们从毁灭中寻找快感的疯狂的年代里，一旦理智彻底崩溃，无论是巴黎，还是海德堡，都会一夜之间变为废墟一片。在炮火纷飞、残酷厮杀的年月，是什么拯救了这两座城市？是什么力量使城垣在敌人的枪炮下幸免于难？是对文明的敬畏之心。我愿意相信，敬畏之心并不一定依赖于伦理、道德或宗教力量，也可能依赖于自然力，是作恶、犯罪、屠戮过程中残留的人性底线或者迸发的瞬间良心悔悟。

由于对文明的深深敬畏，欧洲一座座古城全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从大都市恢宏的教堂到乡村小镇古老的中世纪城堡，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年复一年地维修。我经过佛罗伦萨时，正值“大卫”雕像维修，雄健的大卫就像被打上了石膏的伤兵。而到了威尼斯和罗马，古建筑上搭着的脚手架更是随处可见。由于对文明的敬畏，所有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服从古老文明的既定秩序。古城区不允许轻易出现新建筑，一座新建筑的出现要经过从政府到专家的反复权衡，历经数年，最终经严格的立法程序通过。站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俯视佛罗伦萨，最具高度的地标始终是指向苍穹的教堂尖顶以及壮美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任何新建的商业、生活和娱乐设施都不敢轻易超越它们的高度。

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敬畏之心都是必需的，我们应该永远呼吁对文明的敬畏之心。从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到二次大战，是敬畏之心帮助欧洲各民族度过了蒙昧、暴政、黑死病、战争和杀戮，穿越颓废、放纵、贪婪和骄奢的沼泽，是敬畏之心引领着欧洲文明驾驶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利益这两列危险的火车，不敢轻易偏离轨道；或者已经数次偏离轨道，却又重新迷途知返。

1. 这里指1968年5~6月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为抗议政府逮捕反对越战人士，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巴黎陷入瘫痪。——编者注

我在这片自由而幸福的大地上失重了

当“享受生活”这个嘹亮的口号被竭力倡导、被炒作复制时，我似乎更怀念那个在苦难、匮乏中共担命运、相濡以沫的年代。



做一回墨尔本人吧，澳大利亚朋友一次次地发出诚恳的邀约，邀请我用心灵接纳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就像这座城市愿意毫无偏见地接纳我一样。

每当澳大利亚人问起我是否喜欢墨尔本，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说：“有点喜欢，但我更喜欢巴黎的深度和纽约的进取心。”好在这种直接坦率没有伤害这些厚道豁达的澳洲人，他们照样抱以友好而质朴的态度回应。此外，我对澳洲的另一点挑剔，是这个在南半球的国家跟我所来自的国家竟然季节相反，春秋倒置。这使我产生了被时间彻底隔离的异质感，当中国的江南春回大地之时，墨尔本瑟瑟的秋风正在一点点染黄、染红那些无边的树林。春秋错乱的恍惚让我觉得故乡和亲切的老友们仿佛存在于一个万分遥远的时空。

就这样，一遍遍熟识着墨尔本，只把他乡当故乡。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留着有轨电车的城市，电车轨道的弧线伸向城市的不同街区，古老的电车像童话里移动的房屋，穿过恢宏典雅的教堂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驱散一拨拨鸽群，但丝毫不会惊动路边咖啡店中喝咖啡的悠闲无忧的人们。电车震荡着路基，震荡着墨尔本宁静的晌午，那安详缓慢的声响提醒我，其实，墨尔本的那份精致气质是属于欧洲的。

乘坐轻轨，小火车驶过一个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小镇，车厢内，坐着不同种族和语言背景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似曾相识的纽约地铁中。这时的墨尔本又极具国际都市的特征，欧洲白人、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共同乘坐着这趟下班的列车，不同种族的居民之间彼此友好地微笑，礼貌地让座。这美妙和谐的情景，就是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所谓“多元文化”的和平景象吗？记得不久前我参加墨尔本图书馆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有一个澳洲青年教师表明他的个人观点：“多元文化是脆弱的，因为多元文化就是没有文化。”这是一种少数派观点，不被多数人认同，大多数人总是被一种主流舆论主宰着。是呀，青年教师说得不错呀。多元文化固然美好，但会不会只是一种乌托邦梦想呢？比如在此刻，

我们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安静地坐在车厢里，可我们有多少能够共通的感动和欢笑？“共同记忆”是人与人深度沟通的前提，“爱”、“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根本上代替不了“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我与另一个人、另一些人共有的对民族、文化、往昔时代、故乡、童年、青春的记忆，而我此时就无法与车厢里的人们共享这种记忆。这时候，我发觉自己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不在这里。我生活在别处。

朋友驾车带我沿海行驶，绵延数百公里的公路紧紧贴着海岸，那不是一种开车的感觉，那是一种在天堂飞行的幻觉，左边是海，右边是山，眼前是更替的画面，被奇异的峭壁、险峻的山崖充满，纯净的碧海连着清澈的蓝天，造型精巧的房子和幽静的小镇就镶嵌在碧海蓝天之上，镶嵌在绿树浓茵深处。躺在青草地上，仰望云卷云舒，呼吸着无处不在的自由气息，也体会着，自由降临的日子，也就是自己完全失重的时刻。墨尔本的蓝天下没有与我共品清明雨前茶的老友了，没有人与我共有用粮票换冰棍的童年记忆，没有那些在历史的云烟中挥之不去的往事与故人；墨尔本的海滩上，有的是与我喝着摩卡咖啡，用英语谈论英国女王九十寿辰的新朋友，我应付着那些我并不感兴趣的话题，我解释着对他们而言极富神秘色彩的东方事件。水草丰美之处，慵懒的牛羊爬满山坡，安度幸福岁月。葡萄园的芬芳渗透了丰收的大地，大地上有金发碧眼的小女孩欢乐无忧的笑声，但大地上没有了邻家小弟诵读诗书的稚嫩童音。我在这片自由而幸福的大地上失重了。

二

我的一位新朋友，墨尔本年轻的出版社编辑莱昂休总是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坦然地接受AA制，为什么吃饭时喜欢抢着付钱，我告诉他，“因为儒家文化崇尚对他人的牺牲，崇尚义高于利”。莱昂休又会问我，为什么登上澳洲最高的山峰时，没有听到中国人发出西方人常有的那种惊叹和大呼小叫，我告诉他：“如果你攀登中国的黄山，看到那种山河气势，你就会发现，这座山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荒山秃岭。”于是，华人朋友们取笑我，说我在国内时总是批评东方文化的弱点和负面，到了国外，就竭力向西人炫示中国文化的优越。他们笑称这是本能的“民族本位主义”在异国觉醒，而我在试图用一种文化强势感证明什么呢？

Enjoy Life，享受生活，一个在澳大利亚人口语中使用得最频繁的句子之一。亚拉河边的咖啡座是墨尔本城市中最迷人的风情，我随着墨尔本朋友们享受着那种“在别处”的“生活”。跟墨尔本的新朋故交在这儿闲聊别有趣味：纽约街头的咖啡座上，人们那样亢奋地谈论政治，好像所有的纽约人都是忧国忧民的政治精英；巴黎街头的咖啡座上，法国年轻人们爱谈哲学

或者抱怨政府；墨尔本人绝对不谈政治，不谈社会，也不像自命不凡的法国人那样研究高深的哲学问题，澳大利亚人只谈红酒、网球、棒球、高尔夫、沙滩日光浴、冲浪、博彩业和赛马。你可以觉得他们胸无大志，过分沉迷于对生活的享受。他们绝不会关注澳大利亚卷入伊拉克战争的外交困境，他们只管在花园里多种奇花异草，开车时小心点别撞着冒失的袋鼠。享受生活，在全球化物流贸易时代，就是把当代多边贸易中一切能够获取的商品和服务极尽所能地为我所用。好多墨尔本人沐浴时，浴缸一侧的台板上，会点燃各种芳香怡人的果味蜡烛，浴池里会撒满当日从花园里采摘的带着露珠的玫瑰花瓣和薰衣草，然后打开八音盒，传来夏日森林夜晚实录的自然之声。身体泡在浴池的泡沫里，抽着雪茄烟，闻着花香和蜡烛香，闭目倾听八音盒里的虫鸣或鸟叫，他们享受着这种极致的生活。他们看球赛时，观众席上每隔数排就放着一张摆满丰盛的海鲜和美酒的长条桌，可以边看边饮边吃。在这种氛围里，对澳式运动没有多大热情的我，被当地人强行拉进网球中心观看我并不了解的比赛，硬着头皮到英联邦运动会现场看毫不理解规则的曲棍球，享受着这种甜美的、轻快的、失重的生活。

然而当下，“享受生活”的概念却正被偷换成“享受感官”，这是人类物欲横流时代的座右铭。在今天的西方，“享受生活”的信条就这样悄然无声地取代了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救赎。当“享受生活”这个嘹亮的口号响彻全球化时代的五洲四海，被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竭力倡导，被电视传媒里恶俗的娱乐节目拼命炒作复制时，我似乎更怀念那个在苦难、匮乏中共担命运、相濡以沫的年代，那个年代里我们为希望而生，为理想而生，为复兴而生，为爱而生，为诗而生。那个年代里，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我们自身的体温和血液的热度，让民族昔日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分享着百废待兴的家园重建的喜悦。那个年代里，没有琳琅满目、商品极大丰富的超级市场，没有天价的楼盘和奢华的跑车，但那个年代里，我们真正地享受着生活，享受着真正的生活。

生活在别处

> 我时常想，若是居住在这样的小镇该有多好，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
>
> 可事实上，习惯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在那样寂寞、单调的小镇上，是停留不了多久的。

1 上帝之城

上海朋友对我说："我希望上帝能为我创造一座城市，宁静优美得像乡村小镇，我就居住在这座没有纷扰的小镇上。然后向西一小时车程有森林，向东一小时车程有大海，向北两百公里有大都市，向南两百公里有无垠的牧场或者高山。"

我告诉这位朋友，这座宁静优美的城市不需要上帝再造了，因为它早已经存在了，那就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喜欢居住在堪培拉，这个国家已经够地广人稀的了，还住在这样一个乡村化城市，岂不是要把人憋坏。这座小城里，没有宽阔的大街，没有喧腾的闹市，没有刺激的娱乐，甚至没有像样的百货商店，年轻人忍受不了生活的单调和枯燥，大多搬到悉尼、墨尔本去了。留在这座城市的居民多数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雇员以及相关的服务人员，总人口加起来还不到30万。一到节假日，多数居民全都跑到悉尼和墨尔本购物、度假去了。所以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堪培拉就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五天工作日在堪培拉上班，到周末就开车回悉尼的家。据说还有人每天上下班驾驶直升机往返于悉尼和堪培拉之间。这样一来，堪培拉除了具有国家政治中心的功能，似乎了无生趣。

但我就疯狂地喜欢着这座小城，因为它被森林、牧场、大海、雪山环绕。猛一看，一些散漫分布的建筑十分突兀地出现在一碧万顷的原野上，但当你身临其间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些政府建筑，连同国会大厦、国家图书馆、国立大学、国家艺术馆全是那样和谐地镶嵌于幽静的林荫。穿城而过，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住宅小区，一片片姹紫嫣红的花园，一条条铺满鲜花的小径，那些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英格兰风格的房屋，像用积木搭成的一座座森林小屋。这样的风景不管看上多久，我的视觉都永远不会疲劳。除了怡人的景致，这里还有全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居民。在澳洲，

为政府部门工作通常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许多官员都毕业于欧美或者澳洲本土名校。跟堪培拉人打交道，会觉得人人都知书达礼、具有品味。有这样的风景，有这样的居民，我能不喜爱堪培拉吗？

我住在这座城市的时间不算长，但从我住下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下过四处探索的脚步，好奇心驱使我不断行走在这座绿色的首都，从小镇般的首都市区出发，以中心为圆点，向东到贝特曼海湾（Batemans Bay）看碧海蓝天；向西驶进遍野的葡萄园，或者到樱桃园采摘春天新鲜的果实；往北，是南半球最大的都市悉尼，达令港月色皓洁，能听到不远处歌剧院里传出的女歌手华丽的演唱；往南，驱车穿过辽阔的牧场，牛羊爬满山坡，柯玛雪山上终年有美丽的积雪。

这里的风景如画，这里的故事温馨，讲述的都是乡村般首都中的人和事，无论是议会议员，还是小学校的园丁，都常常在一个酒吧相聚，逾越职业背景和社会身份的差异，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钓鱼和葡萄酒的话题，直到夜深人静，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2 袋鼠，快跑

澳大利亚人有一个交通常识：傍晚前后在道路上开车，车速不宜太快，必须高度留神道路两旁的情况，因为会有袋鼠突然从路边的树丛中跳出来横穿马路或者公路。堪培拉是个乡村般的城市，树林茂密，莺飞草长，袋鼠的出没自然也比澳洲别的城市频繁得多。在堪培拉，袋鼠成为交通安全最大的隐患，这种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已经成为公路上的杀手，给开车人和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在堪培拉，一只成年红袋鼠的体重通常有90公斤，能跳两米多高，堪培拉的道路上，经常横躺着袋鼠死尸，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斜阳下，一副凄惨的景象。袋鼠白天躲在树林里休息，专爱在太阳西下以后出来活动，尤其在冬季或干旱季节，袋鼠经常在黄昏或夜间跑到公路边寻找食物和水。遇到疾驰的车辆或者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下，袋鼠由于受到惊吓，加上智力较低、反应迟钝，要不就一动不动地傻站在那里，要不就跳跃乱跑，经常是司机来不及刹车，可怜的袋鼠葬身轮下。这种局面即使是技术高超的驾驶者都无法避免，虽然经常有路标提醒驾驶者要小心袋鼠，但猛然冲过来的袋鼠还是那么让人猝不及防。如果开车时速达到70公里，汽车在高速行驶时同袋鼠相撞，甚至会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

一个下午，我和艾伦、荣思几个朋友从沃伦岗开车回堪培拉。一路上绿树掩映，浓荫覆盖，道路随着山势起伏，快进入堪培拉市时，艾伦一个急刹车，我们瞪大眼睛，原来前方有四只袋鼠从林间蹿出正准备穿越公路。四只袋鼠中两只是成年袋鼠，另两只是年幼袋鼠，看起来像一家人。大概是

被我们的车吓蒙了，袋鼠们进不进退不退，站在路中央发愣，也挡住了我们的道路。按了若干下喇叭，不起作用，艾伦示意我们下车去驱赶袋鼠。下了车，我们好几个人大呼小叫：“袋鼠，快跑！”并挥手驱逐，还是不见成效。荣思是湖南人的急性子，想接近袋鼠赶走它们，我一把拽住他的左臂说：“不能靠近袋鼠，危险，袋鼠会踢人的。”我们一块儿回到车上，等了几分钟，袋鼠们慢慢从惊吓中回过神，然后一蹦一跳地跑开，闪进一侧的密林里。那次是我最近距离地观察袋鼠，它们不属于性灵的动物，确实太笨拙了，而且视力低下，不过倒也笨得可爱、笨得憨态可掬。

正是由于很多成年袋鼠因车祸或疾病死去，堪培拉的树林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袋鼠遗孤。很多小袋鼠出生一两个月就失去了妈妈，无法独立生存下去，于是堪培拉出现了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和个体志愿者，担当起抚养袋鼠遗孤的职责。堪培拉居民都知道，堪培拉大学的校园是袋鼠群居的地方，在干旱的堪培拉，每当一阵难得的降雨之后，校园里总是跳跃着大大小小的袋鼠，畅快地呼吸着雨后湿润、清新的空气，贪食着刚被雨水浸湿的青草。有一次，在堪培拉大学文科学院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女员工凯切尔正在用从宠物店里买来的新鲜牛奶喂养一只袋鼠幼仔，还往安置小袋鼠的纸箱里放进一些新摘的嫩草。两星期后，我再次来她的办公室办事时，看到那只袋鼠宝宝已经长大了好多。凯切尔兴奋地告诉我，她很快就将把长大的袋鼠放回树林。

尽管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但由于它们数量的繁多和繁殖的快速，澳洲政府是允许居民捕猎袋鼠的。袋鼠也成了盘中餐，不过不属于主流食物，很少有人吃。我一向害怕食用奇怪动物，所以每当澳大利亚本地人或华人朋友怂恿我吃袋鼠肉时，我总是拒绝。有一回，天津人鲁杉等几位华人约我在沃尔登一带的餐馆吃饭，席间，他们殷勤地怂恿我吃一种“牛肉”，还谎称是产自堪培拉南部农场的特优种肉牛。那“牛肉”的光泽和纹理，连同朋友们诡秘的笑容都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再三鉴别后，断定那是袋鼠肉，再次拒绝了大伙儿让我尝新鲜的好意。大家一致批评我不愿尝试新鲜事物。为了平息众怒，我被罚讲了一个关于袋鼠的故事，其实那故事就是当天上午刚从一位堪培拉老妇人玛格丽特那里听来的，此刻现学现用地倒卖过去。

故事说的是，200多年前，当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第一次登临这片新大陆，看见袋鼠这种前腿短、后腿长的怪兽时感到非常惊异，就问当地的土著居民该怎样称呼这种动物，土著人回答：“堪格鲁（kangaroo）。”于是，“堪格鲁”便成了袋鼠的英文名字，并沿用至今。可是人们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堪格鲁”在当地土语中是“我听不懂”的意思。

3 堪培拉的葡萄熟了

四月正值澳洲的金秋，葡萄成熟丰收，美酒四处飘香，居住在堪培拉一定不能错过拜访酒庄和葡萄园的机会。即使不能去体验和参与收获葡萄的乐趣，至少也可以去品尝葡萄那醉人的香醇和甜美，许多葡萄园都有丰收聚会、村庄集市和现场音乐会，包括参观葡萄酒酿造作坊和品尝活动。

周末早晨，彼得带我来到堪培拉葡萄酒展示中心，这里可以免费品尝到全澳洲30多个品种的酒。展厅一边的资料架上，摆满了各种有关堪培拉葡萄酒的杂志、画册、资料，无一例外全都印刷精美，内页附有详细的葡萄园和酒窖分布图。我和彼得花10分钟研究了一下路线图，用红笔圈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葡萄园和酒庄，然后便开车前往。

堪培拉的葡萄园散布在城市的周边，整个葡萄园地带像一片绿油油的毛毡铺在山坡上，不时可见大片大片清新的紫色小花，到处都有黑色的牛群、白色的羊群，为这个酿酒区的风情锦上添花，乡土情调在春天里尽情展示着。葡萄园的种植方式很特别，每株葡萄都缠绕在木棍上，修剪得如小树苗一样，一行一行排列得像小树林。一片翠绿的葡萄园，旁边就是葡萄酒加工作坊，每个葡萄园里也都有自己的葡萄酒展厅，有的甚至有自己的餐厅和旅馆。

堪培拉一带的所有酒庄均属小规模，大多由对葡萄种植或葡萄酒酿造有特别喜好的专家学者以及公务员所创立，全部倚靠以本地人及游客为对象的酒窖门市生意，经营情况非常稳定。我和彼德一共走访了三个酒庄，其中一个酒庄最让人难忘，它的主人乔治是一个干瘦、严谨的老人，一说话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葡萄种植专家。乔治家族是葡萄酒世家，酒庄属于祖传产业。他的妻子扎着两条辫子，穿着苏格兰风格的裙子，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他们夫妇生了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打算继承父业种植葡萄、经营酒庄。女主人笑意恬淡地向我展示着全家福的照片，还有他们的祖辈酒庄创始人的老照片，看上去就是那种满脸风霜的澳洲早期移民，从穿戴衣装可以判断他的苏格兰乡村出身。

夫妇俩领我走进古旧的作坊，是一间很大的老屋，摆放着一排排酒桶，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乔治用手指点每一件酿酒的器具，向我讲述着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流程，还介绍着酒的品种，他说，堪培拉的葡萄品种主要源自欧洲，酿出的白葡萄酒有雷司令、霞多丽、赛美容，红葡萄酒有黑皮诺、赤霞珠等品种。堪培拉比澳洲其他任何产酒区都具有更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常年受春霜威胁，葡萄发蕾时间迟，晚间寒冷，夏日干燥而温热，收割季节则清凉。此地气候极端，所出产的酒也就相当有特点。这里的葡萄酒清爽、芳香，而且价格合理，客人可用划算的价格买到陈年佳酿。

品酒是来到这里的一大要事。这种酒品几口，那种酒来一点，到了这座酒庄，痛饮一杯，到了那个葡萄园，又忍不住尝一尝。这样，到下午回去

时，已然微醺。幸好我不需要开车，有彼得为我开车，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澳大利亚人，不过不是酒鬼，他只是不遗余力地把堪培拉的美酒推荐给客人，生怕别人不知道堪培拉葡萄酒的好处，也许他太爱澳洲这片土地了，也许他太爱酒了。对于澳大利亚葡萄酒，人们只知道南澳阿德莱得和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的葡萄酒声名显赫，却很少有人知道堪培拉的葡萄酒。不过，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今天，我还是找来了。

4 慢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慢》中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了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的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身居喧闹的现代巴黎，昆德拉怀想着儿时的捷克乡村，他感叹着现代世界追风逐日的速度对古典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哀伤着在坚硬的物质文明中被速度挤压得无处容身的内心和自我。在堪培拉，我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慢的感觉，慢得漫不经心，慢得时光凝滞，慢得鸦雀无声。

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外表壮观的政府机构和各国大使馆，这里跟乡村有什么区别呢？虽说是首都，可是申请一个税号、申办一个保健卡，都得等上好多天，所需的周期很长，因为你急他不急。平时，那些工作人员会在办公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慢条斯理地处理事情，过了星期四，周薪打到信用卡上，有人就会停下手中的工作兴致勃勃地计划着周末的旅行。你如果有事需要打电话向一些机构或公司询问，听到的经常是一些留言录音，让你也在电话里留言，等你接到回话可能已是数日之后。从国外寄来的特快专递，一旦遇到节假日，就会被拖延下来变成慢件。有一次，我家人从中国国内寄了一份我急需的资料给我，按正常流程四五天应该送达，可当我收到邮件时已是第十天。在网上查询了一下快递公司的邮件进程跟踪服务，其实在寄出的第三天，邮件已经离开中国到达了悉尼。可抵达悉尼时刚巧是个星期五下午，邮件就在悉尼耽搁下来，直到下个星期一才重新递送，等到邮件到了堪培拉，又逢复活节假，邮递员休假，无人投递。不管你有多么紧急的邮件，邮递员的休假是雷打不动的，星期六下午一点以后，所有的邮局也是要准点关门的。也许澳洲人已经适应了这种缓慢，度假、休闲、享受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工作排在其次，而在快节奏的现代城市里习惯了高效办事、节奏快速的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焦虑和惶惑。

到了周末，生活更是慢得举步维艰，慢得地老天荒。我曾经住的一个区叫凯斯顿，那里几乎就是英格兰传统乡村生活的活化石，各种造型的房子掩埋在层次分明的绿树丛中。房子里的主人都很像是隐居多年的老者，黄昏时，老妇人在花园里一边打扫落在地上的樱桃果实，一边用扫帚赶跑花园

里吵闹不停的鸟雀。年老的男主人坐在另一片树荫下，慢慢地咀嚼一块甜点，细细地品尝一杯南澳葡萄酒。

每次我见到堪培拉的老朋友特尔斯夫妇，他们总是对我说，“Tony（托尼），别着急，我们是一个慢的国家，堪培拉是一个慢的城市”。是啊，光阴在这个国家、这座城市重又变得如此缓慢，人们喜欢畅篷车车窗打开后阳光下的暴晒，喜欢边吃比萨饼边看格里芬湖里那些悠然荡桨的划船少年，还有山坡上那些幸福闲懒的牛羊，喜欢那些午后时光近乎停止的住宅区，那些行动迟缓的长寿老人正牵着一条英格兰犬从小教堂的台阶上走下来。这种感觉让我们这样已习惯于在当今快节奏的中国大城市中生活的人想到，生活其实是可以变得缓慢的，可以边走边停留，而不必充满焦躁的追名逐利和殊死的社会竞争。缓慢告诉我们，如果你心中固守一种从容不迫，人生将因此意味深长。

5 我不是个糟老头

自从认识乔治以后，旅居堪培拉的生活从此有了向导。这个好客的澳洲老头，引领我走进堪培拉生活的方方面面。

乔治原先是堪培拉的一位著名律师，现已退休，但不甘寂寞的他又折腾了一家小规模的移民政策咨询公司。说是政策咨询，其实一年做不了几笔业务，却只看他整天忙得气喘吁吁、奔前奔后。乔治总是随身带着两件东西，无论见到谁，一定不忘显摆。一件是一张20多年前他与比尔·盖茨的合影，据说当年还未发迹也未成名的比尔·盖茨来到澳大利亚开拓软件市场时，曾经和乔治打过交道，并留下了那张合影。20多年过去了，比尔·盖茨已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人物，肯定已经不记得当年曾经有过短暂工作接洽的乔治，但乔治引以为豪地向每一个熟人炫耀着：“瞧，这是我和比尔·盖茨先生。”接着还会补充一句，“别看我现在是糟老头了，我那时候多年轻多帅啊。”乔治显摆的第二件东西是一块“劳力士”手表，他不管见谁，总是伸出胳膊让人猜那块“劳力士”的价钱，当别人说出一个巨大的数额时，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般放声大笑：“告诉你们吧，只值5澳元，是上海襄阳路的地摊上买的假货。”

乔治喜欢中国，所以对来自中国的朋友格外温情。我在堪培拉的日子，他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我住所卫生间的水管坏了，他会在几个小时内帮我请来水管工，这在办事节奏缓慢的澳洲是不可思议的。他甚至会专门抽出时间开车带我去旷野，教我学习英式的左道驾驶方式。由于早些年的职业生涯，加上他热情外向的性格，乔治如同社会活动家，活跃在堪培拉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每次跟他走在堪培拉市中心的那几条小街上，总见着他不停地跟各种人打招呼，同时向我一一介绍，这位是某某议员，那位

是联邦政府的某某部长，还有谁谁是一个画廊艺术家，谁谁又是一个能干的水管工，目睹他那人见人熟的名流状态，我心里就在盘算着该怎样把中国的那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翻译成英文。“My friend, who under heaven doesn’t know you？”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意境荡然无存。

关于乔治自己的生活，确实如他所说，一团糟。他结过四次婚，离过四次婚，和几位太太先后生下了七个孩子。这样，他很多年里都得负担着那些孩子的赡养费，即使后来孩子长大成人，如果前妻失业了，他也要出于道义考虑定期支付补贴。我好奇地问乔治：“前妻失业为什么要你来承担生活费用呢，不是有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吗？”乔治就叹气说：“救济金只够生活的日常开支呀，可这些奶奶们要飞到希腊度假，这样救济金就不够了。”又无奈地摇摇头说，“这回这个前妻失业了，我给她一笔钱，下回另一个前妻失业，我要是不给，她就会因为我分配不均而又哭又闹地吵到我门上。”

乔治可真辛苦啊，年轻时做律师挣的钱没能存下来多少，都用来给孩子和前妻埋单，我为他叹息道：“Mate（伙计），谁让你年轻时那么不省心呢，结婚离婚的？”他就哭丧着脸，从衣袋里掏出那张跟比尔·盖茨的合影照片说：“谁让我年轻时长得那么迷人呢？那会儿，我不是个糟老头。”

6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借杜丽娘之口说“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又说“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是汤显祖用爱、美、自由调和起来的心境，就像苏轼推崇“天成”、“自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是中国山水园林的哲学、美学基础，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由精神。在堪培拉，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无垠的天然。

我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不喜欢住在堪培拉，因为它是功能单一的城市，没有商业和人流。从充满活力和喧哗的热土来到这么安静的小城，会觉得日子真难熬。可堪培拉对我来说，始终是最明媚、最多变的画卷，就因为它健康、自然、毫无雕饰。这里到处洋溢着田园的气息，澳大利亚人那样完好地继承着他们的欧洲祖先田园栖居的传统，因此要体味澳大利亚文化与传统的精髓，没有一处比堪培拉更合适了。不管你是初次来到堪培拉，还是再次与之相会，你都会有新的惊喜，发现堪培拉浑然天成的田园气质。

桉树是澳大利亚的国树，我房间的窗外就是一排排整齐而挺拔的桉树，斑驳的树皮和高耸入云霄的气势让我笃信它们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堪培拉这座城市。我常常坐在窗前凝视落地窗外那些美

丽的树。我是一个对植物有特殊情感的人，仿佛前世是一只飞鸟，曾栖息并且眷恋过那些树，而那些树，怀着温柔的心意在阳光下沉默了很多年。

堪培拉被几座丘陵围绕，丘上皆有瞭望台，可以享受瞭望的乐趣。而安兹利山瞭望台的视野最好，是眺望澳大利亚首都全景的最理想之地，可在此俯瞰堪培拉全城，一片绿色海洋中，整座都市巧妙的设计也可一览无遗。而我常去的另一座山黑山的高度达812米，山上有一座箭杆形的白色高塔——电信塔，是这一带的最高建筑，已成为堪培拉的标志。它既是电视、电话和广播等电子通信发射转播中心，又是观赏堪培拉全景的好地方。上面一层是观景台，内有电梯定时升降。我站在可360度观景的环形平台上，处在眺望国会大厦的最佳位置，居高临下尽览林木幽深、郁郁葱葱的首都风光。

堪培拉市区有一半的土地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树林连着树林，绿地连着绿地。黑山东麓的国家植物公园，种植了许多澳洲特有的植物，包括桉树、合欢树、假山毛榉等100多种树木，还有数不胜数的奇花异草，千姿百态，清香宜人。蒂德宾比拉（Tidbinbilla）自然保护区位于堪培拉以南车程40分钟处，占地约5500公顷，有森林、草原、河溪、山丘等不同地貌。保护区内有车道和众多步行径，沿途可见许多小动物悠闲地走动，色彩斑斓的鸟雀在枝头清脆地鸣叫。

无论山上、河边，还是在校园、公园、街道两旁，都可以看到各种鸟儿在悠闲地飞舞、觅食，这里是鸟的天堂。堪培拉人常常说他们起床不用闹钟，因为家家户户房子四周都有树，树上都有鸟。我每一天都是由鸟儿叫醒的。

7 闻书香长大

面对阳光明媚的格里芬湖用午餐，胃口真好，不仅有美味佳肴，亦有秀色可餐。国家图书馆一侧的露台上，就是享用午餐的最佳场所。一到中午，这里就聚集着很多人，有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研究人员，有前来借阅图书的读者，还有专程来参观的游客。

在堪培拉，由于工作需要，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沿格里芬湖行走或坐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图书馆都是典雅迷人而又气宇轩昂的，介于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之间的四方形建筑物巍然挺立于湖上，呈现着知识与科学的厚重感。这个四方形建筑里有着亿万藏书，从印刷文本、电子文本到现代数码文本应有尽有。国家图书馆就像是一个内存巨大的芯片，镶嵌在迷人的格里芬湖畔。

那阵子，我来得次数多了，图书馆大厅存包处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我。一

个笑吟吟的胖姐，还有一个很绅士的憨叔，他们对每一位读者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对我这样的常客自然也关爱有加，总是主动问我需不需要免费咖啡，并把最新出版、印刷精美的图书馆刊物送给我。那刊物上面有国家图书馆最新的文史报道、书评书讯，还有图书馆组织的最新的论坛、讲座信息。

在这个图书馆我认识了一个叫史蒂芬的小学生，这个12岁的金发男孩每天下午4点钟都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的研究室。起先，我颇为好奇：研究室是专供高等院校或者社会上的研究人员使用的，这个小男孩在这儿干什么？他身影忙碌，一边通过目录、电脑搜索资料，一边用铅笔认真地在纸片上记录，然后询问信息台上的工作人员。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和他闲聊。那天傍晚，一个美国游记作家在图书馆演讲厅举办讲座，我和史蒂芬的座位挨在一块儿，他友好地向我微笑，我问出了心头的强烈好奇：他每天来图书馆是为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在做一项研究，并说将来要把研究成果写成论著。我吃了一惊，他继续向我解释，他正在从事一项全新的研究，研究的是太平洋小岛上岛民的生活。他已经用半年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接下来，他父亲已答应等假期来到，就带他到其中的一些小岛上实地考察。这个综合了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多种门类的跨学科论题，居然就由12岁的小学生来完成。我更加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他："是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吗？"他咧嘴一笑："当然不是，是我自己的兴趣。"

澳洲的孩子没有过重的学习负担，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和沉重的考试，下午3点钟就放学了，他们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叫史蒂芬的孩子，从童年时代就开启了探知世界和宇宙的梦想航程。太平洋小岛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岛民，他们保存着小岛原住民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那将是一个多么绚丽缤纷而富有生趣的世界。为了完成他雄心勃勃的研究，史蒂芬主要的课堂和初始的研究基地就设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他将在书香中长大，一天天，变得博学而俊朗。

人类所有最灿烂、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书香中成长起来的。

8 我想有一艘船

在堪培拉，澳洲男人总是惬意的，惬意的男人也有梦，澳洲男人的梦在心里、在手上、在船帆上。澳洲的男人梦不多，只有一个期盼，期盼有一艘游艇，这一辈子能有一条自己的船。为了这艘船，他们得付出更多的汗水和辛劳。

离堪培拉最近的海是贝特曼海湾，那一天，我上了一艘私人游艇。当我从

私人游艇俱乐部进入港口时，映入眼帘的全是一只只停泊着的游艇，桅帆林立。

这艘游艇的主人，是堪培拉的一个商人。整艘船是纯净的白色，停泊在蓝蓝的海上，是那么协调，几近完美。后舱地面深深凹陷下去，围着一圈沙发，沙发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固定在地面上的小茶桌。最慵懒的景象是主人套房里的那一张吊床，床灯柔柔地照射着，不知道颠覆了多少人生奋斗的梦想。床边的酒柜和冰箱带着欧陆的味道，豪华的洗手间内有好几种精致的男士香水。前舱的甲板上，有一大块四方的卧地沙发，可以舒适、安怡地坐着看岸上的景致。

这里是南太平洋的边缘，有最深邃迷人的蓝色海域，将整个人都沉浸在幽雅的深蓝海水中。说真的，我真羡慕那些潜水爱好者，屏住呼吸，让潜水运动带他们感受另一个非凡奇妙的海底世界：鱼的家园、珊瑚的故乡。在贝特曼海湾当地有一两家潜水学校，提供专业和业余的潜水课程，可以佩戴泳镜进行浮潜运动，或者背上氧气瓶体验真正的潜水。

在贝特曼海湾的一些海滩，随处可见运动者身穿色彩鲜艳的冲浪装，戴着太阳镜，脚踩滑水板在碧蓝的大海上像海燕般地穿行，时而涌上浪峰，时而跌入波谷。成群的水上运动爱好者聚集到海边竞技、嬉水，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在海滩上租借到冲浪板和帆板。对于堪培拉人来说，虽然他们的城市不直接临海，但他们愿意开一两小时车来到海湾亲近海洋。在所有的运动中，水上运动在当地就像跑步那样普及，帆船、赛艇、冲浪、帆板运动的参加者不计其数，堪培拉的孩子大多在10岁以前就学会了游泳、冲浪等水上运动。仅仅30万人口的堪培拉有公共游泳池近百个，私人游泳池更是难以计数。

堪培拉的格里芬湖总是因为其中那些迷人的帆船和划艇运动而格外富有生气和情趣。狭长的小艇在水中驶过，划艇人身着白色运动装奋力荡桨。独木舟和皮划艇轻巧地掠过湖面，掌船人有老者也有少年，他们相互竞赛、汗流浃背，还有穿着小丑戏装的青年坐着热气球飞越被阳光照射的、碧波荡漾的湖面。因为那些五色风帆的存在，格里芬湖四周充满生活的诗意，在水流经过的城市里投下了安详浪漫的帆影。

好几次我从格里芬湖畔经过，看到湖上有龙舟的身影。那是中国的船，让身在异乡的我感到尤其温暖的船。龙舟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华人移民潮进入澳大利亚的，热爱户外运动的澳大利亚人也发现了龙舟运动的精彩。龙舟和澳洲人喜欢的赛艇一样，船身狭长，需要多名桨手，但它的船身配有彩绘的龙头龙尾，船体也更长。和安静有序的赛艇不同，龙舟赛更热烈，也更刺激。

我也想有一艘船，驰骋在每一个关于海的梦境里。

9 樱桃园

契诃夫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樱桃园》，这部戏剧名著集中体现了契诃夫对消逝之美的复杂感情和对永恒之美的不懈追求。依托“樱桃园”之美，契诃夫天才般地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现代人类面对物质和精神不可兼得时的情理冲突。樱桃也曾经被中国古代文人赋予了最完美的情思，后梁宣帝、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和辛弃疾都用格外爱慕和怜惜的口吻赞美过这种玲珑剔透、味美形娇的水果。南宋末年的进士蒋捷在潇潇风雨中以酒浇愁，写下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句，虽说美不胜收，却让人无限怅惘。

生性乐观、心思单纯的澳大利亚人没有赋予樱桃那样复杂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趣，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把樱桃化作甜美生活的轻快插曲。在堪培拉郊外，每年11月份，就是樱桃成熟的时节，这时候，正是澳大利亚的暮春，堪培拉市民欢欣鼓舞地前往果园中踏青采摘。大大小小的樱桃园分布在一个叫作“漾”的地方。那是一片樱桃飘香的乡村，暮春的风把园子里的果香传遍四野，淘气的小鸟贪食地啄着樱桃树上的果实，吃进嘴的并不多，却落得满地都是。小孩子顽皮，跺脚踩碎那些晶莹剔透、鲜红欲滴的果子，常常被滑倒在地，哇哇大哭一通。

道路两旁有一片连一片的樱桃树林，采摘者们一人领到一个小桶后就快步向樱桃林冲去。诱人的串串红樱挂满枝头，熟透了的深红色的那种樱桃最甜，适合在现场吃；还没有熟透的是鲜红色，未到最甜的时候，适合拿回去存放。人人吃得满嘴鲜红，真是过瘾，自己挑拣着摘的还是比超市里买的新鲜好吃。这里可以随便吃，不用交钱，但采摘在桶里拿走的却是要付钱的。

直接在果园里采摘的樱桃价格要比在市区的瓜果市场或超市中买到的便宜一半，每公斤才三四澳元。自己动手，采摘一个上午，可以摘一大桶。在果园门口结算的柜台用磅秤称一称重量，付款装箱，如果买得多，果园主人还会赠送你一小瓶樱桃酱或樱桃酒。澳大利亚的樱桃品种优良，颜色一般是红得发紫的，而且个大、水多，味道清甜爽口。一筐樱桃回去可以吃半个月，再送一些给好友和邻居。堪培拉的主妇们会将樱桃做成酸甜交织的樱桃酱，红艳艳的樱桃果变成了亮晶晶、甜蜜蜜的果酱，那是一种诱人而美妙的魔法，让我心向往之。

穿过那一片片春天的樱桃园，一丛丛树影让呼吸清新，一颗颗果实让心灵饱满。回首不远处，胖胖的果园主人正笑吟吟地牵着看园子的英格兰犬向我招手，招呼一声：“Pick more.”（多多采撷。）

10 做客小农场

伊恩和玛丽夫妇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工作，老两口都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一群儿女也已长大去了别的城市定居。夫妇俩几年前在堪培拉远郊买了一处小农场，到了周末就去度假。

在伊恩夫妇的邀请下，某个星期六，我和乔夫妇去他们的农场做客。一大清早，在超市买好红酒和其他一些小礼品，我们就驱车前往。

伊恩夫妇的小农场其实就位于亚思（Yass）一带。在堪培拉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亚思是农牧业区，那里水草丰美、移步换景，穿越山谷和沟壑，广袤的牧场和幽静的森林相间，野花与溪流点缀其中，一阵阵鸟语花香，低远的天空下，牛羊布满山坡。堪培拉的农民很富有，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见停在农场和住宅边的私人飞机。不过在这广阔而寂寞的土地上，如果要寻个朋友聊聊天，驾驶直升机去附近的悉尼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只有某个星期六在悉尼玛格尼特大街的酒吧里，你才能感觉到喧腾的活力。而在亚思农场，在这永远寂静的乡村里，只有倾听蜜蜂采蜜的嗡嗡细语、牛羊咀嚼青草的轻柔响动，还有自己的心跳声。

西方人做菜一向简单利索，没有繁复琐碎的加工和烟熏油污的烹饪，在我还没留意的工夫，美味佳肴已经全部上了餐桌。我们边吃边聊，他们在谈论堪培拉地区的灌溉水源问题，我并不很感兴趣，因为有点饿，我吃得很专注。这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常菜，融汇了英格兰美食和意大利餐饮的风味，酥炸鱼、蘑菇忌廉汤、樱桃蛋糕、烤牛肉、炸虾薯条、火腿，配上窖藏十多年的葡萄酒，在澳洲三月的阳光下，能不酒足饭饱、酣畅淋漓吗？

伸了个懒腰，默不作声地离席走动，玛丽悄悄跟上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酒喝多了，我摆摆手，笑着告诉她“吃得正舒服”。她带我参观了他们这座专门用来度假的乡间别墅，这栋两层楼的白色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空旷的牧野上，周围景色宜人，绿树、繁花、草场与起伏的地形一道叠映成错落有致的图画。房子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回廊环绕着主屋，走廊顶部是精致的雕花木檐，造型典雅的窗棂和镶嵌在墙上的壁灯互相衬托，闪烁出古老欧式的华彩。屋里，大幅的欧洲壁画昭显着华贵与厚重的文化记忆。听玛丽介绍，那些油画都是伊恩的祖先从英格兰带来的。她领着我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厅，打开吊灯。这时我看到，在这间房里，四壁挂满了她和伊恩祖先们的老照片，有家庭合影，也有单人头像。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些外表陈旧但造型别致的烛台、瓷器和木盒，整个房间布置得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陈列厅。澳大利亚建国时间虽短，但人人都珍爱自己的历史，包括祖先和家族的历史。

伊恩夫妇的家和他们的农场之间只有一圈栅栏隔开，栅栏里面就是温馨的

庭院。在这旷远的地带，这间庭院虽然有些寂寥，但庭院主人是那般热情好客，除了用最好的午餐、甜点、美酒和咖啡款待客人，还带我们看他们的牛栏、羊圈以及剪羊毛的设备，临走时再送给我一瓶野花蜜。看着这瓶野花蜜，我突然想起吃午餐前，我在屋后的花丛里散步，蜜蜂忙碌地飞舞，玛丽走上来小心地提醒我说："当心别被蜜蜂蜇着，要是蜜蜂蜇着你，你会疼，它会死。"这个细心的澳洲主妇，像所有的澳大利亚人一样，热爱一切活着的生命。

11 贝特曼海湾的海鲜

都说堪培拉是个内陆城市，可往东开车两小时就是贝特曼海湾。

从堪培拉到贝特曼海湾的路忽上忽下，爬坡穿林，一路上时而林海茫茫，时而碧海蓝天。抵达海湾，蔚蓝不绝于眼，在视线里与漫长的海岸线一道伸展，金色的海滩也似悠长的画卷，在日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辉。谁说只有悉尼的海滨最是风情如画，谁说仅有昆士兰的海滩才最为温暖宜人，贝特曼海湾一样是气象万千、美不胜收的。这是一片山海相拥的辽阔地带，海边壁立千仞，岩石矗立，陡峭无比，惊涛拍击着两岸的裸岩。从悬崖峭壁上看新南威尔士的海，白色的、弯弯曲曲的、不规则但平坦的弧线无尽地延伸着，在光滑透明的、绸缎般的大海边勾勒出一道耀眼的海岸线。

贝特曼海湾附近有一些宁静的小镇，有临海的，也有离海稍远的，但处处都能嗅到南太平洋潮湿的海风和水汽。若是在港湾，可以看到停泊成片的私人游艇，海鸥在桅杆四周盘旋，那些翱翔或者俯冲的身影让寂静的港湾变得富有生机。在海湾附近有许多美食可供选择，要想体验真正的贝特曼海湾美味之旅，就应该到海边品尝鱼和龙虾。我和鲍伯尔在一家海鲜餐馆里就餐，餐馆的旁边就有一处海鲜批发市场，据说堪培拉超级市场里的海鲜很多都来自这个批发市场。每天早上4点开始，首都的商人就来到这里开始进货，这里的澳洲龙虾、生蚝、帝王蟹都是非常有名的。由于靠近批发市场，我们就餐的这家餐馆的海鲜特别新鲜，价格也极其便宜。我们点了一些三文鱼、生蚝、龙虾，吃海鲜竟然把自己给吃撑了，旁边好多海鸟走来走去或飞来飞去，一点都不惧怕我们，还会勇敢地和我们抢食。

贝特曼海湾有许多专门的鱼市，就在渔港附近，出售各种刚从渔船上卸下来的生猛海鲜，从堪培拉开车来的顾客常常买回家自己烹制，或买上一些用最新鲜食材制作好了的海鲜食品，就地品尝。美滋美味，流连忘返，可见身居"内陆城市"的堪培拉人在吃海鲜这个问题上一点也没吃亏。贝特曼海湾水域所产的海鲜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堪培拉的各个餐厅，堪培拉市内的餐馆以只选用最新鲜的当地海鲜作烹饪原料为骄傲。在堪培拉可以找到各种海鲜，从石龙虾、大虾、沙丁鱼到大钳龙虾、鲑鱼和澳洲肺鱼，还有一

些见也没见过的种类。

很可惜，我并不特别喜爱吃海鲜，到海中游泳又不堪日光暴晒，对于海景，我虽然也为那片美轮美奂的天堂盛景陶醉，但我心里对山的迷恋一直超过对海的喜爱。比起波涛汹涌、难以捉摸的海，我更喜欢内陆的山林，特别是有流泉飞瀑和苍松翠竹的中国山林。所以，在堪培拉的日子里，我只去过一次贝特曼海湾，也只吃过那一次海鲜。

12 野花与蜥蜴的世界

从堪培拉南下不多远就是柯玛雪山区，山腰里有著名的柯玛小镇。这个小镇其实每到冬天都会相当热闹，因为从澳洲各地来的来滑雪者都会在这个地方下榻休整后奔赴雪山地区的切德堡或简达巴尼享受冬日运动的乐趣。柯玛是通往雪山的必经之径，也是东西南北几条国家高速路的交叉口，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里常常比首都堪培拉的市区还要热闹。

我们拜访小镇的季节不是冬天，而恰恰是盛夏，这个季节，有许多野营爱好者纷至沓来，他们开着越野车，车顶捆绑着自行车和帐篷，一路欢歌笑语地开向柯玛来度假。我和吉米、安东尼奥都只是匆匆的访客，只想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地领略一下盛夏的清凉，能看一眼山顶的积雪就算不枉此行了。

车不断地爬坡，盘山而上，一路峰回路转，迂回曲折，穿过大片原始森林。山涧里分布着平坦的草场，和青山一道连绵不绝，成群牛羊埋头吃草。开了近三小时，到了山腰里的柯玛，果真是个精致的小镇，小溪奔流，绿水环绕，有几排奶黄的房子，就像积木搭出来的童话世界，其实这些都是小餐馆、小旅馆或者小店铺。

用完餐，我和吉米、安东尼奥就忙着去山顶，可以先乘一段缆车。缆车不是有车厢的那种，而是需要露天坐在吊椅上的那种，唯一的保护就是一根挡在身体前的栏杆。人悬空而上，脚下千山万壑、苍茫林海，那是一种绝对能激发出心理恐高症的情景，那种惊悸比在美国的“Six Flag”游乐场[注]坐过山车好不了多少。我不敢有大幅度动作，大多数时候闭着双眼。不远处的吊椅上，那些澳洲少年又唱又笑，有的还肩扛自行车和运动器材。他们没有惊惧，他们是在攀岩、蹦极、冲浪等种种冒险活动中长大的一代，而我们不是。

下了缆车，离山顶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开始攀登。在国外登山，不像在中国，名山总有石阶可以方便地供游人攀登；在澳大利亚登山，路基上只架了一条长长的铁桥，铁桥伸向天边，一直沿着它行进，就能到达切德堡峰

的山巅。一路走着，天空渐渐升高了，浓云化成缕缕流云，灿烂的阳光照着我的眼睛，让人有些眩晕。就在前方，云层尽头是无边的蓝天，阳光毫无遮挡地尽情倾泻在一大片蓝色的积雪上。

积雪融化了不少，支离破碎地分布在山顶，有冷峭的风吹来，寒气逼人。我们三人不约而同有了轻微的山地反应，头胀耳痛，也不好停留休息，因为哪里都一样冷。山巅是空旷、荒凉的，只是一座巨大的荒山。路面遍布着圆石，除了野花和蜥蜴，再也看不到别的更明显的生命了。蜥蜴是一种神秘、奇异的爬行动物，澳大利亚以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独特的蜥蜴而著称。一只长着八只脚的大蜥蜴攀爬到铁桥上，挡了我们的路。安东尼奥蹲下身把它捉到手上，它竟然一点也不畏惧人。它起码有15厘米长，浑身的鳞甲呈现黄、绿、棕三色。一丛丛野花点缀在荒山和岩石之间，尤其是在那一片片晶莹、冰冷的积雪周边，洁白、幽蓝、粉红的野花朵朵怒放，原始而茁壮地存活于雪原。

这样的山峰，是与中国奇松怪石的黄山或者缥缈秀色的峨眉山完全不一样的山峰，没有云雾缭绕、雨丝霏霏的闲适诗情，没有人神共融、天人合一的安详与空灵。俯瞰这片壮阔、巍峨的群山与荒原，映入脑海的只能是古希腊式的人对自然的挑战与征服，以及普罗米修斯被锁山崖经受长年磨难的悲壮故事。而当年的陶潜，如果面对着这样的山峦，是断然写不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13 拆除一切围墙

“花园城市”的概念脱胎于1817年由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率先提出的“和谐村庄”(Village of Harmony)。随即而来的工业化浪潮在给经济带来跳跃式大发展的同时，城市恶性膨胀，自然遭受前所未有的毁坏，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于1898年针对于此提出了“花园城市”的理论，宗旨是使城市既有活力与效能，又有洁净美丽的景色。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念是人类对城市模式的美好畅想，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把“花园城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1908年堪培拉被选为澳大利亚首都后，政府向国内外征集新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案，美国建筑师W·B·格里芬竞得设计权。他把城市设计成特有的环圈形，由市中心向四周放射。整个堪培拉市以国会山（Capital Hill）为中心，建造放射状的城市街道，高耸的国会大厦象征权力中心，又代表全国的心脏。这一设计赢得了澳大利亚举国一致的赞许，并获得了新首都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一等奖。

格里芬结合堪培拉的地形，把城市建设和园林建设融为一体，以国会山、黑山、城市山、安斯利山为最高点来布局整个城市且互为借景。其中最华

美壮观的一条轴线在国会山与安斯利山之间，顺序排列了新国会大厦、旧国会大厦、金斯公园、战争纪念馆等标志性建筑，气势恢宏。格里芬湖是全市布局的中心坐标，它为堪培拉优美的环境奠定了基调，使山与城市生动起来。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均绕湖而建，其中包括国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最高法院、首都展览馆、国立大学、澳洲科学院等，它们像珍珠散落在青山绿水间。

堪培拉是世界上园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从飞机上俯瞰，除格里芬湖晶莹发亮外，楼房和街道也全部淹没在绿色海洋之中。宽大的街路两旁是三排并列的观赏林木，地毯般的草坪严密地遮盖着每一块空地。在住宅区，每个小区都有一个小小的园林体系，其中包括一个1公顷以上的园林式儿童游乐场。居民区内只设绿荫蔽天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被称为“健身小道”，不许机动车辆进入。郊区是大片的森林，是市民假日野餐、露营的佳地。

堪培拉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首都。“不设围墙”的法令，早在1927年迁都时就开始实行，任何机关、个人以及外国使馆都不得违反。代替围墙的是以花草树木结成的绿篱：参天的合欢树、桉树等高大树种，是政府机关的屏障；兰桂等奇花异木围绕在富豪人家的庭院；梨树、蔷薇则多植于平民百姓家的房前屋后；各国使馆则从世界各地带来了本国的花木结篱为障，来到使馆区，就像走进了世界植物园。

在万树丛中点缀着一幢幢造型各异的居民住宅，这是堪培拉市的又一特色。这里的住宅基本上是单层和双层的别墅，这些房屋的设计新颖别致，每幢都有自己的特色，绝少雷同，难怪有人称这里是一个大型的露天住宅博物馆。

14 运动王国

从堪培拉市中心驱车到各个住宅区，沿路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场，高尔夫、网球、板球、赛马、橄榄球、滚球场等，透过车窗，我沉醉在运动王国的这幅体育文化长卷里。

这是一个酷爱运动和健身的民族，当他们的祖先来到这片辽阔的水草丰美的土地时，就开始把维护这里洁净无染的自然环境和锻炼自己健康的体魄看作坚定的使命。健康的天与地、健康的人、健康的生活和工作、健康的心灵与情感，澳大利亚人发现，亲近自然的户外运动是获得这一切健康的最好途径。运动在这个国家已不仅是指参与体育项目，它已成为蔚然成风的文化现象，成为社交和娱乐的良好方式。

艾维特这座宁静、优雅的小区，和堪培拉的大多数住宅区一样，郁郁葱

葱、古木参天。我的两位朋友莫妮卡和迈克都居住在这里，他们每天下班回家后都要相约到附近小教堂后面的网球场打一个小时的网球。我在这里停留时，总能看到每一片草地上都有不同年纪的人在参与不同的运动。滚球是老人们颇有兴趣的一项运动，玩法就是要把碗状的球滚到草坪另一头的目标——一只小球的附近，并要尽可能地接近目标。玩球的老人们照规矩穿上白衣服，帽子上围一圈彩色丝带。渥伦是一支滚球队的队长，他是一名职业审计师。他向我愉快地介绍起艾维特附近的所有体育资源，他相信这里的高尔夫球场门票价格比任何国家都低。渥伦递给我几本运动类杂志，让我先在这里翻阅，他得继续上场了，滚球队的伙伴们在等着他。

在堪培拉，到处可以见到身穿运动服的自行车骑手。在那里，骑自行车成为青年人中最普遍的休闲方式。他们沿着漫长的海岸线骑行，有时在城市的公园里栖息。那些色彩鲜艳的运动装和造型多样的跑车遍布城市和乡村，年轻骑手们披着清朗的秋光，勃发出矫健而英俊的光芒。在乘坐古老的蒸汽机火车穿越贝利森林时，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骑着车和我们的火车赛跑。

澳式橄榄球是澳大利亚的国球，发源于英国，实际上是一种英式足球。现在澳大利亚全国约有50万人参加这项运动，橄榄球俱乐部有数十个。每年澳大利亚都要举行全国及各大州的橄榄球大赛。

一天傍晚，堪培拉刚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克莱斯和乔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赛。从前排包厢往四周看，那种狂热的氛围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每一个险情和入门都会引发巨大的呼喊或狂喜。照明灯闪烁下的绿茵球场和越来越大的暴雨融为一体，奔跑的勇士们进行着精彩的技艺和体能的较量。堪培拉的球迷们在竭尽全力地为球队助威，呼唤着他们喜爱的球员的名字。和我同在一个包厢里的两位球迷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这里看球，他们告诉我，对于堪培拉人来说，观看橄榄球比赛就像过节一样，而他们总有过不完的节日。现在比赛结束了，他们的球队赢了，他们就要到运动场旁边的酒吧去通宵狂欢，球迷们将聚集在那里豪饮啤酒来庆祝胜利。

15 多元文化

虽然常住人口只有30万，堪培拉却是国际化都市。这里是首都，自然有各个国家的外交派驻机构、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办事人员，还有众多国际组织的办公室。巍巍耸立的国会大厦后面，便是风景迷人、建筑别致的使馆区。使馆区位于国会大厦的西面，是各国大使馆的集聚地。这里几乎云集了澳大利亚所有建交国家的使领馆，有超过上百个国家的海外使节驻扎于此。整个使馆区的使馆以其国家所在的洲为单位聚集，分为不同的区域，

在使馆区里面开车转悠一圈，就仿佛置身于万国建筑文化长廊，可欣赏到不同国家各类风格的建筑。中国大使馆洋溢着东方文明的幽雅高贵、富丽堂皇；泰国大使馆金屋彩瓦，屋顶四角上弯；希腊大使馆则采用大理石廊柱，令人想起了古希腊典雅的艺术。

灌木林漫山遍野，袋鼠在通往校区的公路上不时出没，花丛里的琴鸟发出柔美的鸣叫。我们穿越堪培拉大学广阔的校园，这里是一个全世界多种文化彼此交融、对话的地方，在这个象牙塔中，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师生和平相处。

堪培拉大学国际学生处顾问劳拉·弗丽曼的办公室有点像一个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商店，又像一个展示世界多种文化的小型博物馆。四周的墙壁上和装饰柜里满是各种工艺品，都是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毕业前赠送给学校的纪念品，它们富有民族特色，代表着不同国家的审美精神和文化特质。印度的挂毯、中国江南的丝绸、意大利的浮雕、法国的印象派油画、日本的民族服装、德国的水晶球、泰国的檀木大象、缅甸的佛像和非洲国家的牛角乐器，它们展现着完成学业的学子们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激之情，也体现着有着不同文化风俗的人们在这里实现了文化的相互认同。劳拉为此感到骄傲，她用耐心的工作帮助四海学子创造最完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而堪培拉用宽广的胸襟包容着每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堪培拉文化的多元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学术教育中集中体现为平等和宽容的理念，而在具体的生机勃勃的民间生活中，多元化成为一种人性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包含着自由精神又富有道德准则。堪培拉的许多主题酒吧，总是埋藏在树林深处。星期六下午，走进这些多姿多彩的酒吧，能结识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民族、文化和宗教，但是他们共享春天的午后，在阳光普照的露台上，品酒饮茶、谈天说地，不管是评述时政，还是分析一场球赛的胜负，气氛都友善而愉快；不管你属于哪个阶层和群体——英格兰老移民、越南留学生、新一代印度技术移民、南美洲商业移民、俄罗斯运动员、意大利厨师……都在这些酒吧愉快地聚集，逾越文化的差异、避开狭隘的偏见，没有歧视和冲突，更多的是理解和尊重。

同一个社区里居住着拥有不同母语的居民，国立图书馆里的读者群也是丰富多样，不同的人群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这里有充实全面的文化矿藏。来自西班牙的访问学者贡扎拉向我描述了他的堪培拉生活，然后总结出他的感受：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中的平等观念和友善精神是实现多元化的关键。澳洲人绝大多数属于英国和欧陆人的后裔，生活风俗大致与西欧和北美人相似，但这里其他非欧洲民族的移民又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团，造就了丰富的多元民族文化，创造发展了独特的澳大利亚文明。这种文明和她的土地一样温

厚，和她的人民一样纯朴。

16 寂静的小镇

和大都市相比，堪培拉本身就安静得像个小镇，可堪培拉周边还有一些更加寂静的小镇，总共也只有几千户甚至几百户居民，到了傍晚以后路上就阒无人迹，只见飞鸟的踪影。

每个小镇都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比如从堪培拉往北去悉尼途经的小镇卡拉，由于盛产羊毛，街头有尊巨大的羊的雕像；在漾的镇街上，到处都张贴着与樱桃有关的食品广告；昆比德尔小镇深藏山谷之中，奶酪的香味四处飘散，镇中心的集市上摆放着各种奶酪制品。小镇几千人，许多家庭好几代人以制作奶酪为生。班雅塔、亚思，都是百年老镇，在澳大利亚这个年轻的国度，也算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镇了。英格兰式的古建筑色彩斑驳，渗透着一派古朴的欧陆情调。高耸的尖塔、红色的百叶窗以及可爱的自鸣钟，一切色彩和造型都搭配得那样和谐。镇街上完好地保存着一些年代悠久的手工艺品老店，前店后坊，做出来的蜡烛、肥皂、巧克力、饼干、糖果千姿百态、色彩诱人。一些花卉店更是色彩缤纷，满院子盆栽植物，货架上陈列着近百样植物的种子，每一袋种子都孕育着一片春光或秋色，让人遐想无限。

往沃伦岗的方向，有一个凯林镇，小镇的入口是一家爱尔兰风格的小旅馆和散落在两旁的一些不起眼的住家。小镇只有一条街，两边是一些小餐馆和一些当地人经营的礼品店，偶尔有一些本镇居民进进出出。就在这座小镇上，我曾光顾过一家叫“老船长”的小餐馆，推门进去，走下窄窄的楼梯，找了靠窗的座位坐下，我开始打量这个不大的地方。屋角泛黑的壁炉似乎在暗示着房屋的古老，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小镇各种历史时期的黑白相片。其中一个角落摆满了出自店主人之手的陶器，还有满满一柜微微发黄的旧书。在阳光渐弱的冬日午后，在这样一个暖暖的乡间小屋，我和朋友尽情享受着主人亲手烹制的食物带来的欢愉。

奥布雷是堪培拉往墨尔本方向沿途的一座小镇。小镇的核心是一条主街，主要的商店都集中在这条街周围，建筑外观的色彩非常明艳，被澳洲的阳光映照得格外耀眼。在这条街上有几家中国餐馆，报摊上也能买到几种不同的中文报纸，看来华人真是无处不在。最有趣的是，我还在一家似乎是古董店的房子里看到了中国清代皇帝乾隆的画像。小镇西侧的山上有个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正好和小镇的主街相对。战争纪念碑是在“一战”后建成的，但“二战”以及后来各次战争的信息也在此后都被记录于此。战争对澳洲的历史影响本来不是很大，因战争而亡命的人不多，但是澳洲的很多地方都尤其重视对战争的纪念和反思。小镇的街道中就能看到不少鸟类，其

中最吸引人的是黄玫瑰鹦鹉、小吮蜜鸟。

我时常畅想，我若是居住在这样的小镇该有多好，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可事实上，习惯现代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在那样寂寞、单调的小镇上是停留不了多久的。一条小街，几家商铺，一览无余，别无念想，绝对需要一种老僧入定的修炼。所以他们每次经过，喝完一杯咖啡，立刻驱车离去。

---

1. “六旗”（Six Flag）游乐场是世界最大的连锁主题公园，内有“全世界最恐怖的过山车”。——编者注

沿着必然的轨迹

是梦和自由，让我们愿意忘记身后熟悉的世界，一路向往陌生的那方。

一

中学时代，看过德国导演文德斯的一部著名电影《德州巴黎》，后来就一直畅想，有机会要实现一次在美国公路上的旅行，无须目的性和计划性，如片中主人公一样，漫无目的地行走、穿越和寻找。

这个凉爽的初夏终于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和好朋友进东，在康涅狄格州一位外国朋友的帮助下，租了辆车，从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黑文出发，开始了冒冒失失的北方公路之旅。

耶鲁的校园还像从前来访时一样宁静而庄肃。漂亮的哥特式建筑、乔治亚风格注建筑与现代化的校舍交相辉映，把整个校园衬托得十分古典和高贵。

毕业季，有几个中国学子穿着宽大的学士服，拍完照，准备离校。在纽黑文结束了世界上最高端的教育，有个叫Fang的中国年轻人感叹："终于要回家了，北京永远是我的家，但是耶鲁大学的校园将让我一生想念。"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所谓的"精英"，但是他们更喜欢叫自己"怪人"。真的，这里就像一个怪人的集会。他们爱冒险，有人喜欢爬到房顶上，有人喜欢在大街上卖唱，有人把头发染成蓝色。他们喜欢与怪人交朋友，一起体验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们开着一辆旧车，沿着康涅狄格州，驶进纽约州、新泽西州。新英格兰地区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山丘，曲折的海岸线优美地往前延展。这一路上都有豪萨托尼克河的陪伴，石桥流水，虽然并不奇特，但温文尔雅，身处其中，有如享受绅士的礼遇。行驶在这条路上，觉得自己跟旁边豪萨托尼克河的河水一样，顺着道路旁的河床流淌。不知不觉，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眼前尽是一望无际的森林，林间栖息着各种飞禽，野鹿成群地奔走。在阿巴拉契亚山的宽大峡谷里，青山环抱，山势绵亘，遍布着云杉、铁杉和雪松等名贵树种，构成了一片翠绿的家园。一道道山峦横亘在面前，溪涧河川崎岖陡峭，公路就在山间盘旋，在幽谷中忽上忽下。200多年前，就是在这片沃土之上，于费城签订的《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宾州的另一座城市匹兹堡，在美国老工业基地中曾经是个枢纽城市，是东部纽约和中部芝加哥的中点站。这个美国钢铁工业一度之命脉，如今看上去和欧洲的衰败旧城一样，破落无力，但从山城的气势和城市的格局中，依然可以辨别昔日的辉煌神采。

第三天晚上，我们抵达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来自家乡的年轻朋友和他新婚的妻子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他们读博的校园。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市的校园，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大学校园之一。天空下着小雨，校园池塘边聚集着成群被称作“加拿大鹅”的大雁，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笨拙憨厚，据说是从加拿大飞来的。

这两个单纯的中国孩子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学术生活，令人羡慕。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最大的便利是，可以一边专注学术，一边沉迷体育活动。这个大学的体育设施之完备，俱乐部之发达，在全美是领先的，光是面积堪比外星陨石坑的十万人体育场就让人叹为观止，学校的橄榄球、篮球、棒球、冰球，每个项目都是全美领先。俄亥俄州立大学是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和十大联盟[注]的成员，参赛的运动队被称为Buckeyes，意思是“七叶树”。大学的进行曲乐队也历史悠久、非常著名，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管乐队。我们路过体育馆门口时，恰巧遇见一支乐队在排练。我们边行走边回头欣赏，高亢的演奏声响淹没了我们的谈话。

美国大学对体育事业的热情，可以上溯到古老的常青藤联盟创立之时。实际上和大部分中国人的想法相左，所谓“常青藤联盟”并不是一个学术联盟，而是一个体育联盟，准确地说是一个橄榄球联盟。更可笑的是，美国其他的许多体育联盟也常被误解为学术联盟，比如十大联盟、太平洋十二校联盟等，成为各种留学机构用来拔高某些学校学术水平的依据。

二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西赶路。印第安纳州完全是一片农田世界，田里的大豆绿压压地一片连一片。连续几年美国气候状况良好，农场主们都迎来了好收成。车行驶在农村公路上，两边田地和天际一样开阔。我们还被导航引导，离开了高速公路的主干道，拐进乡间小道，深入荒僻无人的村庄。那里有整齐的农舍，现代化的配电房，简陋的工具屋，还有寂静无声的牛圈，这一切场景，都集聚在美国中部六月的热辣阳光之下。

接下来，从印第安纳州到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全都地势平坦，覆盖着肥沃深厚的原黑土和黑钙土。进入密西西比河流域，旷野的风光令人陶醉，风和日丽的平原上，伸展着大面积的草场，和地平线相连。密西西比河的中上游从这里不断接纳丰富的支流和充足的水源，宛如碧玉长带，顺

流向南。日出日落，河面始终一片宁静。河水清凉，清澈见底，静悄悄蜿蜒于有着众多湖泊和沼泽的乡间低地。

在有谷歌导航的时代，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寻路已经没有多少技术难度，但即使导航指挥清晰，步骤明确，驾车者也难免有出错的时候。在道路交叉口，一个迟疑或一个疏忽，就会开错道。好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出口入口密集，上下都非常方便，因此出错之后，很容易重回正途。进东车技好，开得也狂野，我们开错过好多次，这让我们进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小镇，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体验，基本上将错就错、随遇而安，在那些开错的小镇上吃饭、加油或休息。一路宁静的乡村公路曲折而来，线条优美，弧度有力。空旷无人的平原上，一条条小溪汇成大河，流淌在四面八方，让随处都是玉米地和大豆田的土地显得更加灵动多彩。雨后的天空蓝宝石一样透彻，我们下车休息，活动一下筋骨，呼吸着野地里的空气，四周弥漫着植被的甜蜜和清香，充满着大地的温柔。

加油站、汽车旅馆、麦当劳、小酒吧、咖啡馆、面包店，是美国公路文化里的驿站。在这些憩息之所，南来北往，过客匆匆，也就为吃一个汉堡、喝一杯咖啡、加几加仑汽油，或者睡一宿。路边有赌场的广告，也有情色夜店的招牌，为的是吸引疲惫的司机，慰藉他们枯燥的旅途。也可以换一种心态，带着怀旧情绪在汽车旅馆留宿一夜。我们落脚的是一家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老式汽车旅馆，其标志性的霓虹灯招牌50多年如一日地欢迎着公路上的旅客，而店主Bob（鲍勃）和Ramona（拉蒙娜）带回了传统夫妻店的温暖和友好。客人可以自行参观公路博物馆，寻找逝去的时光，这里有古董车以及重新修建复原的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加油站和餐馆。

车速飞快，但还是会有人忍不住超车，仿佛人人都是赛车手，风驰电掣。我有些惧怕这速度，几乎一路不敢开，都是我的同行朋友进东驾驶。当他以200公里的时速在美国公路上惊心动魄时，突然有一辆车“唰”地超过我们，转瞬不见了踪影——不要吃惊，在美国的有些公路上，即使是著名赛车手，都未必竞争得过狂飙的司机们。美国人喜欢开快车，但又怕死，因此严格遵守着交通规则。于是你就可以在这里放松地享受高速驰骋的快感，不用担心突然有车不开转向灯并线或者突然蹿出一个行人。

一路上各式风景俱全，沿路既有景致美妙的林荫大道，也有曲折起伏、需要忙不迭左右扭转方向盘的山间窄路，还有两侧布满老式建筑令人追忆往日时光的平坦公路。无论钟爱何种风光，这条路上都能找到相应的景致。可以左右不断转动方向盘蛇形前进，在山路中起伏；可以惬意地在现代化的城市大道巡航，浏览两旁的时尚店铺；可以几个小时都一直环绕着五大湖行驶；还可以敞开车窗穿越农场，任田野或牲口的味道浸入车里，尽情享受宁静的空旷。

三

条条大路，畅通无阻，在这些高度现代化、标准化、工业化的道路两旁，还会有记忆中的民谣吗？还会有民谣里反复歌唱的生活吗？一位疯狂超车手的车窗打开着，也或者是敞篷，有点儿不记得了，只记得那辆车的音响被调到最大，播放的是一首美国乡村歌曲。“那里的生命年代久远，比树木古老，比群山年轻，像和风一样慢慢生长。乡村路，带我回家，到我生长的地方，西弗吉尼亚，山峦妈妈……”是我曾经熟悉的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我并没看清那辆车的主人，只能猜想他是一位至少比我年长的大叔或者白发老爷爷，因为这首歌的年代实在太久远，记忆恍若隔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乡村路带我回家），这率真的音乐多么久违啊，我们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中学时初次听过。那时候，美国乡村歌曲例如《单程车票》《棉花田》《邮差先生》通过收音机磁带被我们接受和喜爱。其实早在20世纪初，美国乡村民谣就以唯美动听的旋律、积极热情的态度跻身于各类流行音乐前列，成为时代的宠儿，经历岁月的洗礼。那些歌曲咏唱了爱情、失恋、牛仔式幽默和乡村生活方式，也歌唱了上帝与国家。许多演唱者亦是享誉全球的超级民谣巨星，他们的乐音和艺术风采富有魅力，低吟浅唱犹如天籁，质朴韵律直触人心。如今，在钢筋水泥的世界上，忙碌和淡漠已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每个人的心里都渴望那份相当放松的率真。乡村民谣那清新质朴的曲调，真切直率的歌词，冲刷着我们心灵上沉积已久的尘埃。

密歇根湖逐渐映入我们的眼帘。碧蓝的密歇根湖浩瀚如海，却没有海的惊涛骇浪。它比所有的海都安静，但比所有的海都蓝得纯正。它呈现给我们的基本景致，与千年万年以前的可能没有太大变化。这是芝加哥的原色，格外值得珍爱。热烈的阳光下，我们在湖畔享用午餐，朋友请我们吃三明治。餐馆旁边的湖面上，左右两侧的远处各有一座精致的白色灯塔，成为湖上的明珠。一条白色仿古海盗船在蓝天下缓缓前行，一排桅杆，挂满白帆。面对此景此情，真有点不知今夕为何年。

正盯着这蓝色的湖水出神，身边不远处，是芝加哥少年在玩极限轮滑，他们一次次跑上台阶，一次次从铁栏杆上滑下，有时滑到一半跌落在地，就爬起来又跑上台阶。这时，一群大雁扇动双翼，伸长头颈，呼啸着飞过林立的游艇桅杆，近距离从我们头顶掠过，那份惊喜真是难以言表。大雁在中国人心中是美好、忠诚的象征，鸿雁传书，恋人相思；大雁南飞，归心似箭；雁行天空，以喻超然物外的境界。

这蓝色的密歇根湖，成为我们此行这部“公路片”的快乐终点。开着这辆承

载着梦和自由的车，并不指望找到真正的美国。我同行的朋友进东，是聪明机智而勇敢无畏的人，虽然有点冒进和鲁莽，但辨识道路、对照地图、把控方向、维护汽车，就全程靠他了。正因为如此，我可以度过一段心神安闲，能够细致观察、随时沉思的旅程，并在这段旅程中，一遍遍想起《德州巴黎》。

一生中，难得有随心所欲的征程。停留还是上路？是在钢筋水泥的人类丛林中为竞争而流汗，还是踏遍千山万水去寻觅生命的意义？面对选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公路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解决困惑的途径。出现一条路时，你愿意忘记身后熟悉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冒险之旅。无论是怎样的一段旅途，我们都期望能够到达内心向往的彼岸。

---

1. 乔治亚风格流行于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统治时的英国及欧洲，讲究和谐对称、比例均衡，代表建筑有美国独立纪念馆。——编者注
2. 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创立于1896年，是以体育为中心的美国大学联盟。——编者注

后记
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

1 离乡和还乡成为一个深刻的悖论

《荷马史诗》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伊利亚特》的主题是离乡征战，《奥德赛》的主题是漂泊还乡。从《荷马史诗》开始，离乡和还乡，战争与和平，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不朽的母题。

无家可归感恰恰是当今人类的普遍感受，并成为被反复吟唱的主题。正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信息文明的不断扩张，伴随着突飞猛进的全球化进程，技术、资本、功利、实用主义把人引离故土，上天入海，东奔西忙，冥思被遗弃，幸福被剥离，内在安全感和归宿感的丧失使人不再能感受到故乡的温情。对生存的焦虑和功利心，将会抽掉整个人生命的根基，抽掉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人不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而流落异乡，而且会因为精神上的虚无而陷入深重的荒谬感。

现代人都是悲壮的“离乡者”，在匆忙找寻、追逐和奔走的空隙，蓦然惊觉：乡关何处？家园何在？故土永远是梦萦魂牵的地方，故国故乡故园故人，都是生命的渊源和根系所在。对于异国的华人来说，乡愁往往分外浓厚。然而，人们却又不得不选择离乡，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强势袭来，移民潮、留学热、出国风，风起云涌，驱使着人们去远方追索，仿佛生活的目标总是在别处，理想和利益的磁场吸引人们情不自禁地接近异乡和异国。之后，人们又不断地回头，渴望着还乡，渴望返回到自然的乡土，疗治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疾患和爱的伤痛，并从中汲取情感和精神的源泉。可严酷的现实是，曾经淳朴的故园早已不复如斯，故乡成了回不去的伤心之地，他乡成不了故乡，故乡成了他乡。于是，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离乡与还乡便成为一个深刻的悖论，在追寻中渐行渐远，沧海桑田，灵魂永远在路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流浪。

这些离乡的过程和还乡的渴望，因缘而起，各有缘由，既有时势的推助、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开放、世界的变局、资本的流动、人口的迁徙，也有生命的内在驱动和文化的自觉力量。沧海横流之间，众生漂移，此起彼伏，虽有成败得失，却无是非对错。毕竟，一个人道的、宽容的、悲悯的世界，就会对这些芸芸众生的生活意愿理解和尊重。不激励、不鼓动、不支持、不反对、不苛求、不责怪、不抱怨、不羡慕、不赞赏、不嘲笑，只

有安静的接受和深沉的观照。

一位华人老者，在生命的临终之时，于病痛中遗憾，在美国吃不上地道的烧饼油条。对于终老异邦的结局，老人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惦念江东父老，忧虑雾霾沙尘，始终关注北京大白菜多少钱一斤，而从不理会新泽西的汽油价格一加仑涨了多少。

“引领人类还乡，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这句诗，因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而广为流传。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作为个体的人却不过是匆匆过客。

故乡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母亲的子宫、成长的襁褓，是哺育我们的摇篮。哲学意义上的故乡就是生命的本源，接近故乡就是接近欢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是每个人命中注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接近本源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离乡者许久以来一直在异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和人文的异质。也许有朝一日又归根返本，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已经获得足够丰富的阅历。

那漂移而去的，其实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也不是时代的风尚，而是所有芸芸众生在星辰大海中的泅渡与挣扎。我们讲这些故事，把全世界融入同一个历史中。故事里，没有孰是孰非的价值立场，只有被命运和历史无情裹挟的艰难不易的生灵，让故事脱离了狭隘的民族地域之情，把人道主义的温柔抚摸带给流迁中的亿万苍生。

当我重新徜徉于自然和祖先赐予的这片辽阔大地，总有一种还乡的欣慰与感恩的热望。我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于是，便留下了笔底这一个个的故事。它们是我探寻真源的心灵印迹和设法走出有限生命的深深的感悟。

曾经，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是金。不管在哪里，在故乡还是在他乡，在故国还是在异国，最终，都要回归生命的常态，因为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不想入非非，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平缓负责地走下去，一边追忆，一边向往。珠穆朗玛峰的山顶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故乡和祖国。

2 异质文化下移民的身份认同

故事中这些飘移不定的人们，他们其实都热爱中国，热爱那里的山河大地

和传统文化，以及最美丽的母语。或多或少，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同时却又都是世界主义者。生活在中国的人，想出国；出国的人，想归来。归与不归，又何妨呢？去不得，留不得。万种因缘难舍难分。

时光流转，时代向前。出国移居和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多得像过江之鲫。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把目光投向海外留学、移民定居的生活，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优质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人。

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日益变得模糊，大规模的移民潮也使得身份认知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移民的双重属性使他们处于一种身份摇摆的特殊状态中，他们由自己的祖国迁移到其他国家，往来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飘移和流散状态。

后现代化世界太需要给予移居状态下的生命热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以其个人化而又社会化、生活化、哲理化的移居现实，书写叙述异质文化下，身处遗忘与记忆、回归与认同，以及自我身份纠葛等语境中的生命抗争，揭示和追问人类生命存在的多重维度和本质。

正是这种异质文化下的生存体验，使得这些“大地上的异乡者”向世界展示了“生存”和“身份”这两个值得深思的主题。他们在祖国和新国家之间摇摆不定，不断寻找自我身份，却陷入自我认知的困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

因为移民者、客居者跨越了两种或多种文化，他们不但要面对现实生活中尖锐的异质文化，同时又不能忽略自己血浓于水的母语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身既接受了新国家的文化、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同化，又无法从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中与自身的本土文化相分离，这种矛盾情结使得他们在心态心境上经历了困惑。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而当二者产生冲突和矛盾时，移民者就必然要经受孤独和痛苦。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微笑着书写人类苦难，他作品的主题只有一个字——“家”。作为一个亲历以色列建国并同她一起成长的希伯来语作家，奥兹的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祖国跌宕不宁的历史中，对人性的脆弱以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挖掘。他曾经这样论述移民问题：“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新国家。所以移民永远都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语文学差不多也是一种移民文学，里面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当下中国，有点钱，有点技能，有点门路，一不留神就出去了。华人挤满

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的社区。可我们真的从此就能享用西方世界的阳光雨露了吗？在大洋彼岸，其实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挣扎和奋斗都一样艰辛，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都有你想象不到的缺陷。

“多元化”和“融入”，谈何容易？更多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充满精神慰藉的美好愿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主流文化，有自己的宗教、传统、种族主体。即使是全世界第一大移民国家美国，白人也占总人口的82%，而亚裔占4.2%，华人仅占2.2%。

这样，以少数族群的身份融入主流社会，本质意义上，就是迎合主流，放弃自己的母语文化，放弃自我认同。而移民状态下的个体，偏偏又顽强地把追寻自我认同作为生命的本能，但认同的过程交织着强烈的复杂性和挫败感。一方面难以融入新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又不能够产生超越性的正面力量。这带来的后果就是置身于海外的华人在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化面前的自卑心理。这种劣势心理源于种种复杂的因素，既有1840年以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命运，也有近现代中国动荡曲折、贫困落后的社会历史记忆；有少数发达国家种族主义者的傲慢，还有新移民本身离家在外、孤独酸楚的游子心态。一些华人移民海外，本想留住文化根系、维护文化认同，然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没有自我、更加没有主体意识，这无疑增加了华人移民和西方主流群体平等交流的难度。

在移民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类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和身份认同的艰难，也正是这种不确定和艰难，映射和支撑着人类对自我后现代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这种认同的危机，仿佛是一种严酷的心障，成为美好人生的大敌，它可以成为让你自卑的包袱或心头的重石，但也可以成为你前进的催化剂或不屈不挠的毅力。这种心障，让迈克尔·杰克逊漂白了他黑色的皮肤，也同样是这种心障，让来自偏远的科西嘉岛、身材矮小的拿破仑名垂法兰西青史。

3 大时代之下时间与命运的无力感

故事里的众生，上下而求索，为梦想离乡，为目标争取，为理想追逐，为生计奔忙。就在上天入海找寻归宿之际，不知不觉，老之将至。夜空星光点点、大海浩瀚无垠，这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漂流，一场人生的旅行。天地之间，星光璀璨，生命的旅程从来不曾停下，人们一直在路上。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穿越30年岁月，流年似水，岁月流转。而所有那些追寻者，真切感受到的是命运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伴随着半生的飘移和时空的转换。出发的初衷原本不是这样，抵达的彼岸似乎也不是那样，或者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或者南辕北辙、渐行渐远，或者风雨仓皇、无

边沧桑。天地间，生命如蚁，思念如灰，人是裹挟在沧海横流中的沙砾，无力地随波逐流，无力地随浪翻转。人生大多数时刻，渺小到如灰如尘，被命运捉弄。新时代的“洋插队”，一波波的移民潮和留学热，成千上万的人飘移，成千上万的人迁徙。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在浩浩荡荡的大变动面前，每一个动荡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人口迁徙、资本流动、资源互换、文明重组的全球化时代都有一段饱含辛酸无奈的传奇。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这是时间的残忍和时间的无奈。时间是哲学中的永恒之谜。什么是时间？它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时间首先是与人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在变迁，生命在流逝，人生极其有限，生活何其短促，流光容易把人抛。那么，有没有可能，或有何种可能超越时间，去构造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佛教构筑了“涅槃”的真如世界，基督教营建了神性的天堂国度。所以，形而上学的产生就根源于人类精神企图超越时间的理想，形而上学的对象总是超越的，但由于我们自己毕竟是有限的，即生活在时间中的存在者，因而在“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形而上学便竭尽全力谋求为二者“搭桥”，寻求由此及彼的“通道”，这就引出海德格尔的主题：存在与时间。

人的根本存在是时间性的。时间不是真相不是命运，时间是记忆，是道德，时间还是理性。我们都有那种时间的无力感，是由于认识到，时间中没有对错，时间中的每一个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当时条件下必然的决定，最终，时间将解决一切问题。人从一生下来就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之上，身处于世界之中，沉沦于日常生活之内，所以，无力是必然的，命运的支配力也是显然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地和时间告别，曾经拥有的亲人、朋友、恋人、同伴一转身就会离你而去，然而最痛心的是，我们从没来得及与时间好好道别，甚至来不及说声谢谢或再见。

在大时代的变局中，各阶层的人不停为生存寻找，最终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以过客心态来到这里开始新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成了这里的第二代。就在飘移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方向，这就是大时代中人对命运无法预知的无力感。时间的旅程不是人所能够设计或者体验的，生命和死亡都使人个体化，使自己的生存整体地呈现出来。人的无力感意味着自身的生存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是终有一死的。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无可逃避。

唯有人能领会时间性，他在自身有限的必死的生存中发现了生存的时间性，这是一种使人的现实生存具有意义的时间性，也体现了人在形而上层面上的超越性。因此，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参悟说：“林中多歧路，殊途而同归。”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中写道：“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和死，哪一件事情，不是闲事？”

生活告诉我们，时光是一种苦难的力量，它赋予生命一种看不见的自然而

然的成长与凋谢。我们都一样，那些创伤甚至流血的过往，只好交给时光去原谅。时光里那些斑驳热烈的梦想，总会淡去无痕迹。关于流浪、关于理想、关于世界的狂想经历，总有一天会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在角落一片惨淡落红。世事林林总总，命运形形色色，我们要接纳的流逝太多。当秋日的阳光再一次照耀这个星球，唯愿瞬间的积淀不要轻易流逝，岁月的馈赠不要立即消磨，而是在时间的节点上，凝聚起沉潜的力量，唤起我们如灰的思念。

4 世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图景

所谓“全球化”，就是全世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上海、巴黎、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有一天会普天同庆，也会普天同悲。然而，全球化的“世界大同”，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必然趋势吗？世界真的会如此简单划一吗？历史真的会按照某种规律“终结”吗？

《圣经》里说，人类计划修一座高塔，塔顶要高耸入云，直达天庭，这样人们就可以传扬他们的名，避免分散各地。可上帝毁灭了巴别塔，使人类语言不通，导致了人类延续万年的隔阂和差异。世界就是这样，一面是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另一面是难以填平的沟壑，各个民族和种族至今处在巴别塔被毁之后的残垣中，人们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民族心智、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在最深的终极层面上，彼此难以沟通交流。

我想重提欧洲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观。在他那里，社会、宇宙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些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的理性主义“决定论”其实是“没有理论根据的非理性”。同样，“决定论”本身也是和“自由意志”相冲突的。

也许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冷静地思考全球化的命题？历史是开放的，历史需要包容、宽恕、怜悯、耐心和爱。整齐划一的普世大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过于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童年迥然相异（这不仅指生命意义上的童年，而且指哲学意义上的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的童年具有不同的经验历程，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就几乎注定不可能趋同，要在某一时代进行心急如焚的全球化推进也注定是一种徒劳。全球化推进绝对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且不说那样的价值趋同能否实现、是否正确，即便理性主义对未来世界的正义召唤是多么感人至深，为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主航向”，让世界在若干年的价值冲突中再一次经受冤冤相报、生灵涂炭，值得吗？

去年，一部电影在好莱坞诞生，叫作“天空之眼”，和当年著名的《拯救大

兵瑞恩》一样感人至深，一样煽情催泪。不同的是，《天空之眼》是在“反恐”的全球新秩序语境中展开。

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奉命执行一项指挥无人机的秘密任务，抓捕肯尼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即将在纽约或巴黎实施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正当美国军方准备炸毁恐怖分子窝点时，却发现一名9岁的平民女孩就在他们的射杀范围内。窝点位于肯尼亚首都。女孩来自一户普通的人家，母亲从早到晚做饼，女孩每天在饭点的时候，将饼拿到大街上叫卖。而她贩卖饼的时间和地点，就是美军发射炸弹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应发射炸弹，而不顾无辜平民的生命？军方和政府为此产生了激烈分歧。

应该拯救这个无辜的生命，还是将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影片中的小女孩，是导演故意放置的道德命题，代表着千千万万遭受战火摧残的平民，到底是当地的人民无辜，还是纽约、巴黎受炸弹威胁的居民更无辜？这个问题有点虚假。说到底，片中没有几个人在乎小女孩“真正”的生死，政客在乎的都是个人的利益。祖先和同胞的“前业”之罪，我们从来都是共同背负的，我们的前生今世和未来，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谁是绝对无辜的，也没有谁因为做了善事，就绝对会拿到颐养天年的免死金牌。无妄之灾，一代开始，永不停息，代代相传。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儿》在全球公映，吸引的是更年青一代的观众。影片传达的还是那样永恒不变的好莱坞主题，它微笑着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你一定要挺到最后，哪怕得了失忆症，从小和父母走散，一路上也都会有好人相助，一路上也都会有奇迹发生，送你寻找到回家团聚的路。鱼儿落到地上，干涸将死，但是没关系，废弃的喷泉这时候会突然出水，将鱼儿喷送到附近的河流里。戏剧夸张和艺术想象总是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忘记现实的严酷。

但是，无论是在早期的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那里，还是在后来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那里，欧洲的文艺电影绝对不允许这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和盲目的积极励志，那是一套sophisticated（复杂精致、微妙深奥）的话语体系，在欧洲大师的电影里，不相信生活是直线的，不相信世界是简单的，不相信人类历史真的会在美国式的无限自信中快乐定型。那些欧洲大师的电影作品，永远用凝重的画面、冷峻的故事、深沉的哲理、唯美的光影、非扁平化的人物，缓缓告诉你，世界是一个多么无解的难题，生活中有多少两难、无奈、曲折、迷茫、残缺、尴尬、误解、阴影和悲情。这种深刻而忧郁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荷马史诗》至今，历经千年不变，似乎注定要永久流淌在地中海文明艺术的血液里。

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白》里，基耶斯洛夫斯基绝对不会简单下结论，判定

波兰和法国哪里更平等。恰恰相反，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结果往往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而已，尊严从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简单的移民或者还乡所能够获得的。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把镜头对准了遭受战火摧残的、被撕裂的巴尔干半岛。上帝创造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旅行，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乡愁。在这样的深沉视角中，导演重现了对历史和人民的人道关怀，透过残破的风景和动荡不安的人心，将整个羁旅过程笼罩于凝重与悲凉之中。

这种精英化的思考模式，相对于今天观看电影的普通人，可能高深了一些，但它至少不会产生一元化的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经验信条，至少不会潜移默化地蛊惑出一个千篇一律、世界大同的乡愿式梦想，它至少可以思辨性地把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文化的多元化、人性的多义性、历史的开放性、生命的灰色地带当作一种生活的学问，在银幕上展现出来。用升华和超越的方式，用伦理、审美和哲学的视角，帮助人们阐释生命的无常，揭示历史的吊诡，质疑现实的秩序，批判主流的错误，缓解心灵的紧张，寻找人生的归宿。

而这一切，是只有一百余年历史的美国好莱坞永远做不到的。毕竟，好莱坞试图传递的那个带有强烈“全球化”和“美国梦”色彩的愿景，实际却在将全人类的文化“异乡化”、“异质化”。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脆弱的图景，也是背负着各自乡愁的人们所不愿等待的光景。